

THE HERO IN HISTORY

SIDNEY HOOK

历史中的英雄

[美]悉尼·胡克著 王清彬等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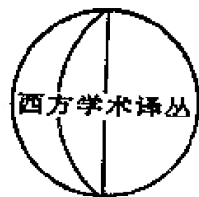


2 020 8080 8

XIFANG XUESHU YICONG

历史中的英雄

〔美〕悉尼·胡克著 王清彬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SIDNEY HOOK
THE HERO
IN HISTORY

A Study in Limitation and Possibility

The John Day Company, New York 1943

本书根据纽约约翰·戴伊公司 1943 年英文版译出

封面装帧 孙宝堂 邹纪华

·西方学术译丛·

历史中的英雄

〔美〕悉尼·胡克著

王清彬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 6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6 插页 2 字数 158,000

1984 年 9 月第 1 版 1985 年 10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 15,501—35,500

书号 2074·287 定价 1.35 元

西方学术译丛

出版絮语

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我社曾经翻译出版了近百种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著作。现在来看，其中一部分属于西方学术名著，反映了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在今天仍未失去它的思想价值和文化价值。因此，我们决定从中选择一部分进行重印，编辑这套《西方学术译丛》奉献给广大读者。当然，这套书并不以此为限，我们还将继续移译国内尚未介绍过的西方重要学术著作，争取在不长的时间内构成一个西方学术著作的译介系列。

欧洲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世界，在近代和现代自然科学迅速发展的同时，哲学社会科学不断出现学说纷呈、多维拓展和此消彼长的局面，特别是本世纪以来的学术研究态势更引人注目，其中也不乏学术宏著巨篇。这套《西方学术译丛》将把它的翻译视点主要放在二十世纪。颇具真知灼见的著作，哲学、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法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各科的有益学说，都将成为我们选择和译介的对象。

编辑出版这套译丛，我们存有一个素朴的愿望：既为了扩大

60288/45

读者的学术眼界,也为了促成国内学术界的创造。应该承认,西方学术著作,甚至是那些巨制,基本上都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成果。但是,正如马克思主义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学说一样,吸收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有利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所以,当我们着手编辑《西方学术译丛》时,却在翘首盼望我国学术界结出累累硕果的季节的到来。

组织出版一套学术翻译丛书,是一项要求高、费力大的工程。尽管有人把当今世界看作“地球村”,但是生活在地球这一端的我们,要全面了解另一端世界的学术状况,依然存在很多障碍和困难。为此,我们祈求海内外行家为这套丛书通信息、出主意、提建议,当然也欢迎给以批评与匡正。

一九八六年八月

“西方学术译丛”近期即出品种

《历史研究》(上、中、下)

[英] 汤因比

《哲学通信》

[法] 伏尔泰

《历史中的英雄》

[美] 悉尼·胡克

《人本主义研究》

[英] F.C.S.席勒

《人的问题》

[美] 约翰·杜威

《社会改造原理》

[英] 柏特兰·罗素

《科学世界图景中的自然界》

[奥] 欧特尔·霍利切尔

《指号、语言和行为》

[美] C. W. 莫里斯

《确定性的寻求》

[美] 约翰·杜威

《彻底的经验主义》

[美] 威廉·詹姆士

《开放自我》

[美] C. W. 莫里斯

《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

[美] 悉尼·胡克

《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

[比] 亨利·皮朗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作为事件和问题的英雄	4
1. 现代世界中的领导	
2. 英雄的养成	
3. 英雄作为危机的产儿	
4. 英雄和历史哲学家	
5. 对英雄感兴趣的心理根源	
第二章 思想界的英雄	19
1. 文学、音乐和绘画	
2. 哲学和科学	
3. 宗教	
4. 历史的英雄	
第三章 帝王的影响	29
1. 统治者的性格和历史条件	
2. 某些引人注意的相互关系	
3. 拿破仑的权力的三宝	
4. 对伍德的发现的解释	
第四章 社会决定论：黑格尔和斯宾塞	40
1. 黑格尔的“世界精神”	
2. 决定论的共同假定	
3. 斯宾塞的公式	
第五章 社会决定论：正统派马克思主义	52
1. 经验的因素	
2. 恩格斯和辩证法的神秘主义	

3. 普列汉诺夫和彭帕杜尔夫人	
4. 一元論和証据之間的冲突	
第六章 英雄活动的框架	72
1. 社会决定論的遺產	
2. 英雄行为和历史的選擇道路	
3. 英雄作为傀儡	
第七章 历史中的“如果”	85
1. 特魯埃的馬車和法兰西的隕落	
2. 对英国的入侵	
3. 波斯在馬拉敦的胜利	
4. 丘吉尔論李在葛的斯堡的胜利	
5. 幻想的“如果”和科学的“如果”	
6. 預言的偶然性	
第八章 偶然和意外	98
1. 历史配景法的种种差异	
2. 偶然性的意义	
3. 偶然性的限制	
4. 历史上丧失了的机会	
第九章 事变性人物和事变創造性人物	108
1. 为英雄下定义	
2. 事变性和事变創造性的人物	
3. 君士坦丁和杰斐逊	
4. 太平无事的年代	
5. 罗伯斯庇尔和查士丁尼	
6. 英雄、机关和社会阶级	
7. 事变性的幻想	
8. 几位事变性的妇女: 克里奥佩特刺, 提奥都拉, 叶卡特琳第二世	
第十章 俄国革命: 一件用来檢驗的事例	131
1. 十月革命的影响	
2. 十月革命是历史上不可避免的嗎	

3. 列宁作为一个事变性人物或历史的英雄

4. 一个没有列宁的世界

5. 列宁的政治画像

第十一章 英雄和民主 159

1. 一个民主社会能够信托英雄吗

2. 英雄作为一个煽动者

3. 英雄和受付托的权力

4. 关于英雄的民主主义哲学

5. 对民主的批评家: 辜斯加、帕雷塔和米雪尔斯

第十二章 规律、自由和人类行为 172

1. 历史规律的范围

2. 社会必然性的程度

3. 责任和自由

4. 我们面前可供选择的道路

导 言

本书的书名說明了它的主题，不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哲学。把它叫做《历史中英雄的局限》，或許同样适当。这个书名也能說明本书的内容，不过还不是我們关于历史英雄的想法。我們的想法，书里作了詳細的叙述。請讀者不要单从书名上去推測。

历史是由男男女女造成的，这一点，除了某些神学家和神秘的形而上学家，誰都不再否认了。即使是那些神学家和神秘的形而上学家們，也不得不間接承认这个平凡的真理，因为他們把历史人物說成是天意、正义、理性、辯証法、Zeitgeist^①，或者时代精神的“工具”。在历史上使用“工具”的后果，人們比較容易同意；至于“工具”果真为什么样的最后目的服务，被认为决定“工具”的原因又是什么，看法就不那么一致了。

后果是难以确定的；人們的意图尤其难以确定。不过，只要我們想認識真理，有关我們的意图問題，我們原則上总能明智地解答。但是关于抽象概念的意图，关于那些起因的决定作用，我們就无法取得科学性的一致意见了，因为关于它們的意义、証据和真相，我們无法做同样的臆測。

我們知道，阿提拉（Attila）^②的破坏行为加速了羅馬帝国的灭亡。我們不能象某些受害的教徒們，断定他是“上帝的鞭子”；也不能象某些现代学者，完全相信他是一連串原因的后果，而这原因的鏈条的第一个环节，是在中国气候的变化中鑄成的。

① 德文，即时代精神。——譯者

② 侵入羅馬帝国的匈奴首領。——譯者

我們知道，希特勒发出了信号，把全世界六大洲都投入了战争。我們怀疑，象一位自命发现上帝秘密的人最近所说的，希特勒和其他暴君們都是“天意的工具，是在惩罚离开正道的民族，”或者，象其他一些人所說，希特勒只不过是当代基本矛盾的結果，即社会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如果这个譬喻有意思，那就让人们充当工具吧。不过也要記住，工具可以用来达到各种各样的目的，有时是全然不同的目的。人也是一种工具，他对于这些目的应该是什么，会有些話要說。他所服务的那个目的，是可以从他自己规定下的、他自己理解的那些目的里面推測出来的。人們只有在抱着某些目的的时候，才能創造历史。

不管人們創造什么，一支枪或一本书，一次战争或革命，另外一个社会或另外一个人，他們的創造总是要受一定条件支配的。就連人們所設想的那些神，大都也是在当时存在的物质条件限制之下，进行創造的。任何别的創造，对于輕信的人來說，都是一种奥秘，而对于有批判精神的人來說，就是支离破碎的神話了。

凡是承认人們确实能够創造自己的历史的历史哲学，也都得把它本身跟当时的各种条件联系起来。它要广泛地估計到，某一时期，人們进行活动的各种条件的比重，他們的思想、計劃和目的的比重。这些思想、計劃、目的扎根在复杂的各种条件之中，但是它們从已經提了出来的改造条件，使其更符合人类愿望的計劃中，取得意义。科学的历史家的專門研究中有同样的問題。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如何发生的和为何发生的，要予以圓滿解释，就得在人們所扮演的角色和提供材料、有时又提供规律，但絕不提供人类历史戏剧細節的起决定条件作用的背景之間，結算出一笔似乎可信的双方比較的清賬，不然就有困难。对于这个問題，哲学家們从大处着手，历史学家們則从小处着手。前者通常为行动的綱領或得救的希望，提出全盘的解决办法。后者避开了大规模的概括，小心地逐項研究。对于历史上“伟人”或“英雄”的作用，这种方法显然也是适用的。

以后各章的分析，其目的主要是給这个迷惑人的問題构成一个

有成果的系統提法。我們要努力概括出各种类型的情境和条件，以便正确地承认或否认杰出人物对那些情境和条件的随时的影响。我們提供的不是一种历史理論，而是对历史理論的一点貢獻。要給人类历史作出适当的解释，这一点貢獻是應該受到注意的。

第一章 作为事件和问题的英雄

尽管我們的年龄已过了崇拜英雄的青年期，我們对于英雄还是始終感兴趣。这种兴趣的根源是多方面的、深远的。但是它們的强度和性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里各有不同。在我們这个时代里，人們对杰出人物的言行感到的兴趣高涨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我們所以热烈关切当代无冕英雄的思想和事业，它的特殊原因是十分明显的。在一个战争和革命的时期中，各国人民的命运好象显然系于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的决定。不錯，这些特殊原因反映了战争中間戏剧性的紧急問題，但是在不太动乱的年代里，也还有其他一些根源起着作用。这两方面我們都要加以討論。

1. 給这种英雄兴趣提供材料的基本事实，就是在所有的社会生活中，在每一个重要的社会組織形式中，都不能沒有領導。控制領導的方法，公开的或隱蔽的，各个社会，各不相同，但是領導人时刻都在眼前，不仅是国家的明显象征，并且是責任、决策和行动的中心。这样，就有一种自然傾向，要把領導人跟在他領導之下所取得的成果，联系起来，尽管那些或好或坏的成果，毋宁是不願他的領導而产生，而并不是由于他的領導而产生的。既然許多因素都在起着作用，那种“在此之后，所以因此之故”(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的謬誤論断，对于头脑單純、不善于鉴别的群众以及沒有耐心的行动中的人，就注定是有道理的。人們会要胡佛对于某次的經濟蕭条負責，其实那次經濟蕭条的种子，在他上台以前，早就种下了。如果在鮑尔温(Baldwin)执政期間，社会上沒有发生过大灾难，人們就会认为他穩健可靠，尽管他已經給欧洲火药庫点上了一根慢慢燃燒着的导火綫。

当前，領導对广大人民日常生活的普遍影响是用不着再推脫的。

这种影响，不論好坏，是公开宣布了的，集中組織起来的，并且不断增长着。世界上主要国家中，中央集权政府之下的各种組合經濟发展到了这么一种地步，我們可以毫不夸张地說，少数几个人，竟能对那么多的不同領域，同时发生影响，这样的事是前所未有的。政治、經濟、外交、陆海軍事、教育、住宅、公共工程、救济事业方面，还有——除英、美外——宗教、艺术、文学、音乐、建筑、科学方面的主要决定，都是由少数几个国家領袖作出的，而且常常是由一个人作出的，他的判断和嗜好，就成为国家的绝对法律。交通工具的大发展能够把种种决定象光一样快地传到各个角落去，保証一种空前的有效控制。

一个愷撒、一个克伦威尔、一个拿破仑确实能够向許多部門发号施令。但是那些部門，在行政和职能上，不象今天結合得那么严密。他們无法强迫人們普遍遵守他們的法令，甚至也无法压制批評。有些漏洞永远堵塞不了。有些精神避难所也不是他們的执法吏所能接近的。过去专制統治者在位期間，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宗教和哲学上，都有各种矛盾的傾向，这就証明了他們无法把文化限制在他們的教条和法令里面。他們的失敗并不是因为缺少嘗試。

今天，世界的面貌大不相同了！一个希特勒、一个斯大林、一个墨索里尼确实能够向各个方面，从軍事組織直到抽象的艺术与音乐，发号施令；这些独裁者百分之百地貫徹他們的法令。他們的决定不仅影响到謀生的可能性——这在集权国家，并不是稀罕事——并且影响所有的儿童教育和成人教育，影响到他們国家的文学、艺术和哲学的内容与方向。当然，在他們控制的部門中，不可能靠一道命令，搞出一批天才来，但是他們完全可以毁灭一切和他們不相一致的才能。通过各級学校（因为知識是一种武器），通过无綫电（如果声音够响的話，誰也逃避不了），通过书报和电影（人們自然而然地想从里面得到消息和消遣），他們把他們的教育灌輸到人民的“下意識”里去。

沉默寡言和隱姓埋名也不再保險了。精神上的一切避难所都被

消灭。蒙田(Montaigne)①对那些想逃避当时政治风暴的人们提出过的明哲保身和不关心世事的劝告，也就是一百年前引起圣贝夫(Saint-Beuve)②共鳴的那种劝告，今天肯定地会引起秘密警察的疑心。这种情况不仅标明欧洲从昨天的专制主义走过来，走了多远；同时也是一种标志，那就是說，除了領袖和他的左右，每个人既沒有得到一种公共的生活，却連私生活也喪失了。

象在英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国家——其所以民主，那是因为領導大体上仍向代議团体負責而且受到人民群众的严厉批評——行政当局的权限也大大地扩充了。这，一部份是由于它們的經濟有走向国家資本主义的趨勢；一部份由于在反对集权国家的侵略、爭取生存的斗争中，必須进行总体防禦。不管原因是什么，事实确是如此，而且越来越清楚了。最近几年，美国总统和英国閣員們的自由行动的权力，超过了他們前輩所能梦想的范围，除了外交政策方面可能还有例外。

既然那么少的几个人，显然能决定那么多的事情，那末对于杰出人物的历史意义感到强烈的兴趣，就不足为怪了。所以不需要高明的理論就可以知道，不管现有的領導如何，每个人跟它都有最具体的实际利害关系。最高政治指揮部里的个人意見和品质也許会給大家招致灾难，也許会給大家造福。老百姓先生③对于那些高高在上的人们所作的道德評價——只要他能把他的評價保持在街談巷議的水平之上——至少，有一次，是跟历史有联系，而且是合理的。

形势的基本邏輯（这一点对于我們目前感到兴趣的問題很有启发，我們以后还要常常提到）是这样：要么历史行动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向确实是无可逃避的，要么不是。如果是无可逃避的，现有的任何領導，在决定今天和明天的主要历史型式上，就完全成为一个次要

① 法国著名散文家。——譯者

② 法国文艺批評家。——譯者

③ 老百姓先生是十五世紀道德剧的主角。——譯者

因素。如果不是，那就要問：某一個領導的性格，對於我們歷史地位和前途，在因果關係上究竟應該負責到什麼程度，而且既然牽涉到人，又在道義上，應該負責到什麼程度？象我們將看到的，那些大談特定的歷史前途不可避免性的人們，要么用行動和另外一些言論表明他們的話是假的，要么就把兩種信念混淆起來，一種是對无可逃避的前途的信念，另一種是對特定領導（通常也就是他們自己的領導）的不可避免性的信念，這個領導會引導我們走向這種前途。有時候他們兩件事都干。我們還會看到，否認歷史行動的主要路線的不可避免性，並不一定就等於說，歷史的前途總是取決於領導的個性。歷史上有比“定命律”和“偉人”更多的花樣。就領導的歷史作用來說，這是程度和各種類型的形勢問題。我們的任務就是要約略指明，到什麼程度、在哪一類的形勢里，才應該說領導確實改變了當時的歷史方向，又在哪一種形勢里，才應該說它沒有改變。

2. 對英雄感到興趣的另一根源，要從教育青年的過程中所養成的態度里去尋找。每一個國家的歷史，都是用偉大人物——神話上的人物或現實生活里的人物——的勛績，向青年表現出來的。在某些古代文化里，人們推崇英雄為民族之父，象以色列人對亞伯拉罕那樣，或者推崇英雄為國家的締造者，象羅馬人對羅馬勒斯那樣。在現代文化中，初年級歷史教育的英雄內容並沒有因為教學方法的改變而受到什麼影響。這或許由於故事形式的戲劇效果，這種形式是在人們把歷史作為連續不斷的个人遭遇來處理時，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它或許也反映了倫理學者理解兒童心理的一種最簡單的入門方法。再加上民間故事和傳說的影響，這種五花八門的早年教育，在青年人的易于塑造的思想里留下了永久的印象。從個別的人物上升到社會制度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是從圖畫似的、具體的東西走向抽象。沒有經過適當的訓練，這個轉變是不容易得到的。許多人總想把“社會力量”、“經濟法則”和“文化風格”人格化，其原因無疑就在這裡。這些抽象概念，幾乎象古代英雄那樣，強迫着、命令着、統治着，並且面對着和克服着困難。在許多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的作品里，在這種譬

喻后面，你几乎能够看见資本和利潤已經給“生产力”套上了鍊铐，“生产力”正在拚命掙扎，而没有加入这一场拉鋸战的人們屏住气，看它們打出个分晓来。

就是在更高的教学水平上，“英雄”史观的方法也沒有放弃。結集在杰姆士·哈尔威·罗宾生(James Harvey Robinson)和《新史学》杂志周圍的美国历史学派，曾給过去的美国作过动人的现实主义的解釋。不过如果他們以为，他們已經撇开了英雄和伟人，走上了經濟和社会“力量”的明确道路，他們就是在欺騙自己了。他們从神龕里挪去了国王、政治家和將軍，又在原位上放上了工业和金融界的巨头、哲学和科学界的大思想家。这种更換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它的含意跟他們有計劃地貶低个別人物意义的历史方法論却不一致。聰明的学生常常从他們的著作中，得到这种印象，例如，“洛克菲勒(Rockefeller)、高尔德(Gould)和摩根(Morgan)是这个时代的真正伟人；如果把他們的才能利用到政治方面来，事情就会多么不同啊！”^①

今天，对待英雄和領袖的这种态度，不单是历史教育的偶然的副产品。在大多数国家里，特別是在集权国家里，他們千方百計地向儿童、学生和成年人宣扬英雄崇拜和領袖崇拜。进步的交通技术，灌輸、信仰的新的心理学方法更能鼓起群众热情和領袖崇拜，这种热情和崇拜在拜占庭也不多见。现代独裁者們可以在一个羅馬皇帝替他自己建立的一座雕象的地方，貼出一百万张石印像来。每一种工具都被用来增加他們的威信。他們把历史改写过，叫人毫不怀疑，历史要么就是英雄們、亦即領導者的前輩們的業績，要么就是惡棍們、亦即領導者的敌人的事迹。从領導者当权的那一天起，他就公开鼓吹他的活动，把它說成是每一桩成就的直接原因。如果收成好，他的功劳比气候的功劳还要大。同样，在他上台以前的历史局面就被說成是坏人阴谋破坏的結果，而不是社会原因和經濟原因的結果。

① 引自一个学生的論文。

今天，跟过去更不同，对“英雄”的信仰是一种人造的产物。誰控制扩音器和印刷机，誰就能在一天晚上造成或打消信仰。如果象某些輕率的作者所說，伟大这个字可以用群众的拥护來說明，那么，伟大是可以加在现代独裁者的身上的。即使沒有加在他的身上，他也很容易搞到手。然而，要认为某一个人能影响历史——就是說，对改变历史事件的方向起了协助作用——一定要得到人們的信仰或拥护，作为他的历史力量的一个条件，那就大錯而特錯了。彼得大帝和腓特烈二世都不曾得到过群众的拥护。只有在现代，人民有了知識，甚至在民主政治形式受到嘲弄的国家里，也在到处宣扬忠于民主精神的口头禅，这时，領袖才一定要人們信仰他，以便加强他的权力。还要注意，现代的領袖或独裁者是从一个群众运动的时代中涌现出来的。因此他一定要有一个支持他和信仰他的群众基础，好来对抗其他的群众运动。在他当政以前，群众信仰他，是出于生活的沒有出路，是由于漫无限制的謠言的誘惑。一旦独裁者掌握政权，他需要一些群众的支持来巩固他的权力。过此以后，他就可以随意制造公意，使大家相信他的使命是天授的或历史决定的了。

群众的拥护在过去并不是造成領袖发挥效力的一个必要条件，在目前也不是构成历史发挥效力的一个充分条件。一个傀儡元首，象意大利的国王，或者风流君主，象爱德华八世，也許在群众中很有名气，但是他什么事都决定不了。对于我们的目的來說，只有这样一种对历史人物的尊崇才是有关系的，即：这种尊崇使他得以做出一些有历史意义的事情，而如果他不出名或沒有得到群众拥护的話，这些事情本来可能就会做不成的。

3. 誰救了我們，誰就是一个英雄；在政治行动的紧急关头，人們总是期望有人来挽救他們。每逢社会上和政治上发生尖锐危机，必須有所行动，而且必須赶快行动的时候，对英雄的兴趣自然就更强烈了。不管一个人的政治面目如何，总希望解决危机和希望有个强有力的英明領導，来克服困难和避免危险，这两种希望又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危机越严重，希望有适当的人，来控制局势的愿望就越强烈，

不管表达这种愿望的形式是默默的祈祷还是公开的鼓吹。至于把这个人叫做什么，“救星”、“馬背上的战士”、“先知”、“社会工程师”、“敬爱的信徒”、还是“有科学头脑的革命家”，那就得看是要用什么教派或党派的词汇了。綱領固然也重要，但是在极端紧张的阶段里，当人們感到一筹莫展或大祸临头的时候，綱領是容易被忘記的。而且，綱領只不过是意图和諾言的公告罢了。作为公告来看，在那些意图实现以前，它們只有具体而微的可能性，因此需要有力的领导。作为諾言来看，它是可以违反或破坏的，得看是誰許下的諾言，又是由誰来履行的。

形形色色的社会决定論者，尽管在理論上說，个别的人，不論其地位若何，在历史浪潮里无足輕重，他們写起历史来，却不能不承认，至少某些人，在某些重要关头，在改变历史潮流的方向时，起了决定的作用。恩格斯讲到馬克思，托洛茨基讲到列宁，俄国官方讲到斯大林的时候，他們的態度跟他們所承認的意識形态就完全不一致了。就連神学的决定論者，象历代的教皇們，他們认为一切历史事件中都能找到上帝的指示，可是他們讲起宗教改革以来的西方文化来，就好象西方文化也是由躲在上帝背后的路德和加尔文創造出来似的。用来掩飾这些矛盾的紆回曲折的手法，我們以后还要加以考察。事实是尽管决定論者們大談其“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可避免的”不合他們的口味，他們絕不向它妥协。他們自己和別人都看得出来，他們的言論跟行动是抵触的。观其行而不听其言，我們終久会认出他們的真面目。

人事危机的广度和强度各不相同。但是，由各国人民（关于他們，我們有比較完整的紀錄的）的历史来判断，从来沒有哪一個时代，不曾被当时的某些人当作危机时代的。历史本身被描述为一个接着一个的危机，也并不是毫无道理的。各种社会力量和条件总在起着作用，不管起作用的是些什么样的社会力量和条件，而它們也总是永远在起作用的；只要采取行动的途径是打开着可供选择，甚至被认为打开着的，人們就会感到需要一个英雄出来推动、組織和领导。这种需要往往是感觉到了比清清楚楚地說出来了的时候多；也往往是說

出了比得到满足了的时候多。事实上要求历史救星或英明领导的呼声越频繁、越响亮，就越积起了一种表面的证据，证明竞争这个显要职位的候选者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一个民主的社会也有它的“英雄”和“伟人”。民主的社会和其他社会差不多，也免不了会发生尖锐的政治危机，也不缺少想当英雄的人。不过，它根据它自己的标准来选择他们。如果一个民主制度是明智的话，它就会全心全意地跟它的领导者合作，同时又得提防他们滥用权力，这是一件难办的差事，但是，如果不让民主制度，象过去常有的那样，成为一个培养暴君的学校，这个问题就总得解决才行。

4. 历史上伟人的作用不仅是个实际问题，而且是个最迷惑人的历史分析的理论问题。自从一百年前，卡莱尔在他的《英雄与英雄崇拜》一书中宣布说，“世界史，人类在世界上取得成就的历史，归根到底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有过作为的伟人的历史”，这个问题就引起了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们的兴趣。可惜，人们对这本书的估价不大实事求是，这个小册子对当时来说充满了激昂慷慨的精神力量，到处闪烁着精辟见解的光芒，但是它是矛盾的、夸张的、印象主义的。它被人们当作了一个义正辞严的辩护状，替“历史上的所有因素，除伟人外，都是不重要的”这个论点作了辩护。实在说起来，卡莱尔关于历史因果关系的意见，显然是错误的，纵使不错误的地方，也是含糊的、神秘的。论客们可以利用他说的某些话，以及推想他能够说的一些话，替任何一位集权主义的领袖作辩护，为那位领袖的专制行为披上一件天命所归的外衣，只要那些行为是够凶的，是成功的。另一方面，凡是向一个国王或一位独裁者开枪，而又没有失手的人，都可以引用卡莱尔歌颂革命的话，来证明他的行为是正当的。

斯宾塞派、黑格尔派和各种政治流派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提那些思考过这个问题的思想家——都和卡莱尔的论点交过锋。这些评论家驳斥了他的浮夸之处，给他之以另一种学说。这种学说虽然是用枯燥无味的语言说出来的，却同样浮夸。它把伟人们解释为社会进化的曲线上，彼此毫无联系的许多有色的小点点。更

重要的是，他們忽視了一個可能有的論點，這個論點介於過份簡單化而又相反的两个极端之間。不但如此，它還想把达尔文的一個重要概念，就是“變異”，運用到這個問題上來。按照這個看法，偉人們是在自然變異的過程中，由“時機”推上歷史舞台的，社會環境則起了選擇的作用，給他們提供了完成工作的機會。

有過那麼一種意見，由於受到科學的社會進化論高級宣傳員的批評，在歷史學家當中和讀書界里已不時行了。出來替這種意見作辯護的是美國實用主義者威廉·詹姆士。他熱心辯論，再加上他對經濟和歷史因果關係上的某些特殊問題不感興趣，這就使他過份強調了個人的作用。但是他的提法擺脫了卡萊爾式的空想——就是產生偉人和使他能發揮效力的那些條件要由偉人自己負責。詹姆士的論點聽來頗為偏激；然而他強調指出，在偉大成為事實以前，必須適應“時代的能接受性”——這種能接受性把一個利昂納德·納爾遜(Leonard Nelson)變得默默無聞，而把一個希特勒帶到權力的極峰——，強調了這一點，他就把問題的嚴重性大大減輕了。他承認在自然、社會和個人性格這幾個領域之內都有相對的自主性；再加上他相信歷史原因是多元的，這就使他接觸到了問題的核心。而這一點，並不因下面所說的事實而受影響，即：這些觀點是從關於人在世界中的地位の更廣的哲學態度引伸出來，而不是從特殊歷史問題的研究中得來的。

儘管如此，詹姆士的論點，象他留下來的那樣，是過於簡單而又站不住的。他告訴我們，“各種社會一代一代的演變，主要是直接或間接地由於個別人物的行為或榜樣，他們的天才和時代的能接受性配合得那麼好，他們偶爾取得的權威地位又那麼險要，於是他們就成為運動的倡導者、推動者、先例或風氣的開創者、腐化的中心，或者另外一些天才的摧殘者，如果任令那些天才自由發展，社會就會被引向另一方向。”①

① 《偉大人物和他們的环境》，《哲學論文選》，大眾出版社英文版，第174頁。

詹姆士說的是：沒有偉人們的工作，就不會發生有意義的社會變革，而使得那種工作成為可能的今天的“能接受性”，又都是昨天的杰出人物的行為或榜樣的結果。這種說法看來適宜於說明在我們眼前展開的大變化，乃是列寧按照新的社會路線努力改造世界的結果。這種說法也許給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努力從另一方向作了新的解釋，他們努力征服和奴役歐洲，不單是為了防止列寧的計劃得以實現，並且是為了防止歐洲社會的民主化。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給列寧造成機會的俄國的經濟崩潰，當然都不是任何偉大人物的行為或榜樣的結果。1914年爆發的社會衝突——政治的、經濟的、倫理的衝突——其大多數的先決條件也不能歸因於個人的行為或榜樣。

如果沒有某些人的活動或榜樣，資本主義的興起、工業革命、野蠻民族的西進、文藝復興，這一切，當然，都是不可能的。但是，不管指明哪些特殊的個人跟這些運動有關，都不能證明，他們是必不可少的，都不意味著：沒有他們，這些運動就不會出現。

要是有一個“偉人”出來，第一次世界大戰就絕對不會發生，這種輕率的議論是不能由任何已知的經驗加以証實的。這個人得是一個十分特別的“偉人”，那就是說，在相似的情況之下從來沒有出現過的一種人。強調偉人的影響，認為如果只要有了他，他就會起決定性的影響，這一類的議論往往在原則上是不能証實的^①。這就是說，那個假定的，能夠防止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偉人，不是由於某些獨立的特性，而是由於他的假定的成功，才得到証實的。這就等於提供了一個定義，說明在這些條件之下能構成一個偉人的是什麼。我們的論點並不是說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過去的偉人名單上，添上一個“偉人”，大概不會把事情改變到那里去。另外有些事件可以把事情改動一下，甚至可以防止戰爭的發生，這些事件我們也用不着到自然災害的領域里去找。比如，要是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實行了巴塞爾會議上所作的保證，即使宣戰了，仗也打不起來。但是就具體

① 這一點並不对一切“如果”問題都適用。參閱本書第七章。

問題來說，在1914年，不管由誰來當歐洲各國的總理，歷史性的商業競爭的結果、德國對英國海軍力量的挑戰、西歐的沙文主義的仇恨、巴爾干的層出不窮的陰謀，等等，大概都不會有什麼兩樣。

近百年來，各種解釋在歷史學家和歷史哲學家中間傳來傳去。一方面，我們有橫掃一切的社会決定論，按照這種理論，偉人就是歷史規律的一個符號、一個指數、一個表現、一個工具或者一個後果。不錯，一個偉人和其他人等之間的特徵是可以分辨出來的。但是象這一派的一位權威作家所說，“一個人的‘特徵’只不過更高一級的社会發展規律留下的幾條個別的痕迹罷了。”另一方面，又有這樣看法即：革新者們可能不斷地改造歷史，他們的存在、戰略性地位以及他們對群眾的有力影響是不能從當時的成群社会力量里推究出來的。介乎二者之間的意見也不是沒有。那些意見表示的不過是折衷的想法，就是控制歷史變化的方向的，有時是偉人，有時是環境的力量。但是它們並不對這些因素取得決定意義的一般條件，逐項作特殊的研究。

一旦牢牢地掌握住這個理論問題，想理解歷史的人就不能不提出某種答案來。對於這個問題採取各種各樣態度的歷史學家們，幾乎對於歷史上的任何一個偉大時代或任何一個傑出人物，都採取過不同的看法。二十世紀絕大多數的歷史學家有意無意都受到這一種或那一種社会決定論的束縛。這並沒有妨礙他們進行卓有成效的研究。他們對歷代社会生活的結構有所闡明，對逐漸積累起來的在革命時期突然爆發的社會緊張關係也有所闡明。我們不否認他們的發現有其確實的根據；他們對世界史上重要時代領袖人物的思想根源，也許發掘得很深，但是我們懷疑，他們對那些人物的活動是不是作了公平的評價。許許多多的歷史人物都受到文學家和職業傳記家的擺布，這些作家們選材時，一只眼老老實實盯住他們的早期畫象，另一只眼則帶着幻想看着好萊塢。

5. 對偉人發生興趣的心理根源，也許應該當作某些手段來看，偉人就是用它們來影響他們的群眾的。這些根源簡略地說就是：a. 心理安全的需要，b. 要求彌補個人和物質局限的傾向，c. 逃避責任，這

有时候表现在掌握简单的解决办法上，有时候表现在把政治利益交到职业政客的手里。这些根源显然是互有联系的，但是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分开来谈。

a. 伟人 or 领袖往往认为他自己是他的国家、党或事业的“父亲”，更往往被他的左右认为是他们的“父亲”。这个事实似乎为佛洛伊德的观点增了光。佛洛伊德认为，大多数的人经常在寻找父亲（或者母亲），因为在他们的幼年时代，父亲提供了安全感和情绪上的稳定性。这里表现了某种深刻的见解，这种见解，正如从佛洛伊德和他的学派那里流露出来的一切有价值的思想一样，一点都不夹杂佛洛伊德体系里那些荒唐无稽的神话。有很多人永远离不开他们的父母、老师，或者在他们成长起来的时候，在供应他们的需要、解除他们的恐惧、解答他们的問題方面，起主要作用的人。结果，信仰与服从以至初期行为的调节都成为一套既定的程式，这一套程式就在领导者的身上体现出来，他説起话来，做起事来，儼然象个家长，同时要求在社会之中，起一种类似父亲在家庭中所起的作用。

时代越混乱，教育越因循从俗，依赖性越强，领导者越容易上台。至于—开头他是否以他的工作证明他的才干，那倒是一件次要的事。引用桑塔亚纳的一句话：“对于那些有信仰的人，希望得到的东西的本质，就成为没有见到的东西的证据了。”当然，碰上不可抗拒的灾祸，领导者也不能幸免，但是他用不着加强他的信徒们的物质安全感，因为信仰本身一开头就已减轻了他们的恐惧，增加了他们的信心。

应该注意，心理上的安全需要并不常常有，也不常常是很强烈的。有那种需要的时候，决定要找什么精神庇护的是社会关系和压力，而不是天生的、本能的冲动。时代不太混乱，特别是教育又有利于启发成熟的批判能力，而不把人们的注意力固定在无条件服从的幼稚的反应上，在这种情况下，寻找父亲替身的需要就相应地减弱了。在另外的历史情况下，如果那时没有伟大的领袖和人物，象教会和党这样的机构就成为主要的权威角色。

b. 领袖对他的群众有一种号召力，这种号召力的一个更重要的

根源，也許就在于他能以他的被认为具有的特点和成就来代替满足他們的渴望。群众在想象中分沾了領袖的光彩、权力和热情。于是，那些精神生活貧乏的人們有了新的生活意义。由于注意力的集中，社会生活中經常感受到的歧視和不平，个人生活中有时感受到的貧困和无能为力都消失了。不費一点力，不花一个錢，自我就膨胀起来。特別是在目前民族主义时代，对待国家和民族这一类抽象概念的态度，已經成为一种偶像崇拜的时候，高明的领导者就有效地利用了这一点。领导者把他的爭取权力的斗争和这些抽象概念合而为一，就把群众原来对待历史传统、制度、象征和意識形态的感情轉移到他自己身上。这时，他就可以凭借旧有的、既定的事物的名义，来改变旧有的、既定的事物。

把个人的缺陷投进比較幸运的人們的光荣成就里，借以取得补偿，这种傾向也許是社会生活中一种常有的现象。这个现象甚至可以解釋人們所崇拜的神的性格——象路德維希·費尔巴哈巧妙地論証了的。但是應該看到，被挑选出来作为同一体的那些人和特性是随着历史而变化的。一般說来，可以反映出一种需要的，至少有两种可能有的理想。一个穷人也許会崇拜一个財神或者一个凶神；一个受到欺凌的民族也許会崇奉一位正直的統治者，但是也許会因为他們的暴君比其他一切暴君都更暴虐而自豪。为什么有些人以希特勒的武功为荣，而不以歌德的智慧为荣，以斯大林的残酷为荣，而不以托尔斯泰的善良为荣，不是用弥补局限以求满足，这么一种簡單說法就可以解釋的。他們追求的那种满足是从他們的文化价值中引伸出来的。

c. 要是每一个人，或者很多人都想当政治领导，社会生活就会更混乱。我們不必害怕这种混乱，如果选举的技术有了进步，就会給我們选出最能胜任的领导人，負責满足有知識的、政治上积极的全体选民的需要和愿望。不过这是很久以后的事，而我們現在討論的是已有的和目前的問題。检查一下政治史，我們就知道，愿意作政治领导的人，在每一个团体里，比較地說，总是少数。实际的情况似乎是，絕

大多數的人都不想担任有权有責的职务。^①

政治領導的条件，自然会变的，但是当作一种专业的政治向来是，而且永远是一种危险的把戏。有时候，人們对于作政治領導，很有反感，象在希腊城邦里那样，甚至用抽签的方式来进行选举。就是在现代，也常常从农村里、或車間里、或机关里“抽調”一些人去担任职务。問題倒不在于，愿意和急于担任領導的人，为数实在不多，而是在于，除非只有少数几个人对于竞争領導职位感到兴趣，他們就不可能从容自若地取得和保持权力，也不可能用各种方法扩大本来付托給他們的权力。只要允許他們发牢騷，大多数人都甘心情愿，找个什么人來替他們作杂事，不管是家庭杂事还是政治杂事。政治是件肮脏事，而人生又是短促的。我們容忍許多罪恶，就是因为要消除它們，就不免引起麻煩。

这种感情纵使不是明智的，却是自然的。政治領導，是个全部時間都得奉公的职业，既沒有休息的余暇，也沒有培养其他兴趣的机会。掌过大权的聪明人，回想起来，沒有不感到得不偿失的。据柏拉图的一个神話故事說，聪明能干的政治家奥德賽 (Odysseus) 第二次投生到世界上的时候，替他自己選擇的是离开政治漩渦、隱居在偏僻角落里的卑微生活。对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來說，事情是这样，对他的对手來說又何尝不是如此。在野党进行的严肃政治活动同样是一种須得付出全部精力的活儿。所以，在政治斗争中，具有多方面兴趣，而又不愿意把兴趣放在龌龊的政治祭坛上作牺牲的人，总处于不利的地位。敏感而清高的理想主义者也是如此，他怕承担严重的責任，不敢切切实实决定別人的命运，他怕作道义上的妥协，怕采取临时性的毒辣手腕，哪怕是高明的政治家有时也不得不采取那种手腕。再說，政治問題是很麻煩的。我們接受許許多多的决定，正是因为我們不敢确信自己知道哪一个决定是正确的，虽然我們的确知道有些决

① 參閱罗伯特·米雪尔斯 (Robert Michels) 的《政党》，1915 年紐約版英譯本，第 49 頁。

定是必要的。

然而，这是一个老故事了，当我们不愿意因为投入政治漩涡，打乱我们的“正常生活”，而把权力付托给别人的时候，我们有一天会发现，受我们之托的那些人，正在那里破坏我们深怕遭到干扰的“正常生活”。这不但是个老故事，而且是一个经常重演的故事。它会一直演下去，直到大家都认识到：政治决定无论如何非作不可；责任不是用消极和逃避的办法可以躲开的，因为消极和逃避都会产生后果：政治上的努力以及随之而来的危险和麻烦，即使从最起码的角度来考虑，也是一种社会保险的形式。

如果这些基本真理的知识普及到一定的程度，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照着实行，那末，在这个程度之内，对政治领导的兴趣就会成为批判性的了。那时，跟政治领导的一体化就成为一种自觉过程，而再也不是去寻求什么“父亲的替身”了。这时，我们就有权利为政治领导的成就而感到光荣，假使那种成就是我们父亲的劳绩，我们就会没有资格去承受那份光荣，因为我们是不能替他们负责的。反之，如果这些基本真理受到忽视，每一个想当领导的，就连想作独裁者的人，都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利用群众对于政治的漠不关心。等他成功之后，他们就会尊敬他。不管他们是否尊敬他，如果他愿意得到尊敬，他现在就有办法强迫他们向他致敬。

我们已经简略地考察了对“伟人”的事业发生兴趣的几种根源。别的根源当然还有。我们所强调的，只是能够说明伟人的影响和局限的一般问题及其时代重要性的那些根源。在上文里，“英雄”和“伟人”这两个名词，一直是按照俗话所说的广泛意义来使用的。我们会发现这两个名词实际上包含着许多不同的意义，因此，在我们讨论下去的时候，我们必须找出一个切合于我们的目的的定义。抱着英雄史观的人们使用“英雄”这个名词时，全都认为：不管英雄是什么，在他的活动领域里，他总标志着一种性质上独特的方式，是跟别人迥乎不同的，而且认为：在任何领域里，成绩的纪录也就是英雄们的事业和思想的历史。对这些前提，我们还得加以更细致的研究。

第二章 思想界的英雄

人在生物学上都是同种，然而他們之間的不同又那么显著，甚至在他們的指尖端上都看得出来。而且这些不同不仅是皮相而已。假如有所不同的話，那在有机結構中发现相当的不同之前，在人的行为中老早就能看出来了。这些和其他事实所証实的变异的重大意义，迄今还没有明智地反映于我們教育的和社会的实践中。一方面，表面上的形体方面的不同曾为了不平等的社会組織的利害关系而被夸大为造成神秘的种族区分的属差；另一方面，潜在的、大有讲究的个性之間的种种差异却在統一訓練的計劃当中一概被忽略了。但是，無論我們对于这些人与人之間的不同作怎样的評價，这些不同的存在，不論是与生俱来的，抑或是后天习得的，都是否定不了的。否定了这些不同的存在，結果会变成只是否定了某些不同跟某种特殊問題或特殊需求之間的关联。

人与人之間的許多变异可以化为数量程度上的不同，例如：身高、体重、体力的不同。沒有一个人会强壮到不能被一群一个一个地来看都是較弱的人所打倒。如果人們仅仅靠着体力强壮就能創造历史，那么我們时代的强壮者当是民族英雄而不是杂耍的精彩表演者了。

但是，其他种类的人与人之間的变异，不仅表明彼此大相逕庭，而且表明无法把一种性质还原为另一种性质。天才并不是把才能組合起来的結果。多少大队士兵相当于一个拿破仑^①呢？多少二三流詩

① 拿破仑在說下面这句话时，心目中大概指的是他自己，他說：“一支由獅子指揮的老鼠軍隊，比一支由老鼠指揮的獅子軍隊，要好得多。”

人可以构成一个莎士比亚呢？多少普通的科学家可以完成一个爱因斯坦的工作呢？这一类的问题的提出并非为了取得答案，它的用意不过使人确信天才的獨特无双而已。

那些相信历史上杰出人物的重要性的人，光是証实杰出人物底存在，无论如何，是远远不够的。他們必須提出証据，証明这些人不仅存在，而且在他們各自的活动范围内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更进一步，他們还得适当地答复这样的詰难：如果这些人并没有象他們那样地生活过和工作过，是否他們的事业十之八九也会被別人干出来呢？

初一看，这一論点似乎很容易証实。特別是在艺术和科学方面，各方紛至沓来的証据充分說明着：獨創的典范每每是由少数伟大的人物所創造，而由許多稍許有些才能的人所模仿着。随意考察一下某些重要的文化領域，便觉这一点很为明显。下面我們就来介紹某一种特定形式的英雄决定論的首倡者可能作出的这种考察。

支配文学史和戏剧史的宗师巨匠有埃斯庫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卢克萊修斯、維吉尔、但丁、莎士比亚、密尔頓、哥德、巴尔札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泼劳斯特(Proust)和乔埃斯(Joyce)。还有一些其他人的名字可以增入这一不完全的名单里，不用說，也可以增入相关文化領域中其他不完全的名单里。可是不論是誰去增入这些人，他将強調如下两件事：他們和已經列举出来的作家大体上总得有相同的才具；他們和那些成千上万的詩人、戏剧家和小說家之間有很大幅度的不同，对后面那些作家，我們欣賞他們一些細微的造詣，而并不感觉他們的作品当中有什么伟大气息。沒有任何两张名单会完全一样，这并不怎么重要。假如我們要把名单上西方文化中文学界的最伟大人物增加到一百位，我們只須把那些在所有各种名单中所共有的名字挑选出来便行了。沒有一个人会认真地否定这些出现在各张名单上的少数人物和那些沒有名单可上的許多人物之間的明显的区别。这一点也并不会因观察到下列事实而受影响，即：文学界的伟大人物，象其他文化領域中一样，經常是成群地出現的。某些历史时期无疑比其他时期更容易容納一些天才，即是說：更

鼓励天才的产生，或者说：对天才更敏感些。这些时期使天才有勃兴的可能，而对比较平庸的人也是一样给予鼓励。可是这些时期的产生这些天才，比起一块肥土上的滋长花朵来，情况并没有什么两样；肥土上既茁长名贵花朵，也同样滋生普通杂草，因此并不能把肥土看做花朵的创造源泉。

难以破除的爱好上的不同，影响着所有对于各个文化领域中卓越创作的考察。在十八世纪和二十世纪，对莎士比亚有不同的评价。但如果我们发生兴趣的是影响问题，而不是“真正的”成就问题，那末就可能获得更为客观的一致意见。比较一下最有影响的人物的名单和前一张并非根据影响去编排的名单，我们可以断定究竟有多少伟大人物同时也是最有影响的人物。我们将发现差不多每一位最有影响的人物都出现在第一张名单上，而许多第一张名单上的人物却没有出现在第二张名单上。换句话说：有几位伟大人物在他们生活的最近的时代里可能为人忽略过去，或被抹煞，而其后又被目为孤峰绝巘，很为人们叹赏，但很少为人学习。

在音乐界，成就的记录更加显著地是所有音乐创作者中比较少数几个人手中的新形式和其圆满体现的记录，也是他们乐曲设计中新旨趣和其巧妙发挥的记录。我们的音乐家名单里当包括：巴赫(Bach)、格鲁克(Gluck)、海顿(Haydn)、莫札尔特、贝多芬、柏辽兹(Berlioz)、李斯特、瓦格纳(Wagner)、穆索尔斯基(Moussorgsky)、德彪西(Debussy)、施特劳斯(Strauss)、勋伯格(Schoenberg)、辛蒂密斯(Hindemith)和音乐史家可能以之为实例的其他几个人。音乐的主题，有时候也同它的处理情况一起，都可能是迎合公众爱好，或迎合音乐家（象其他艺术家一样）设法取悦的艺术奖掖者们的爱好。但音乐家也同样经常地选用他们自己所喜爱的主题。无论怎样，他的艺术妙技和创见总不能用其同时代音乐家所共同感受的压力和诱导等说法去解释。

在文学和音乐界，即使我们把某些巨匠大师们的创作宝库都一起考虑在内，集体创作——史诗、圣歌、民谣等——的证据也比绘画

界更加明显。如在某些大油画和大壁画中，凡是提供了技术助手的地方，这种技术助手完全从属于负责该画的画家底设计和判断。如果我们编制一张现代绘画界中最有影响的画家名单，它将包括乔托(Giotto)、马萨乔(Masaccio)、望爱克(Van Eyck)、米开朗琪罗(Michaelangelo)、拉斐尔(Raphael)、提香(Titian)、柯勒乔(Correggio)、鲁本斯(Rubens)、普桑(Poussin)、委拉斯盖兹(Velasquez)、华托(Watteau)、大卫(David)、马奈(Monet)、塞尚(Cezanne)、凡·高(Van Gogh)、毕加索(Picasso)等^①。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不去注意绘画以外、从政治一直到物理学方面的许多事情，而能了解绘画的历史。关于这样几种与美术家有关系的影响，重要的是一个美术家对待它们的态度。随着不同时代而变化的材料和技术可以提供共同的、制约的条件；阶级和个人的社交可以提供选择主题的理想和献身方向；但是，标志出伟大美术家的独特成就的却是他个人的技巧，他的敏感性，洞察力，以及他促使我们用新颖眼光去观察事物的力量。

往往有人断言：在绘画界，象在音乐和文学界一样，伟大的美术家迎合着时代的需求或气氛，而在某种意义上，这些需求或气氛就通过他来说话，纵使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反对这一点。就算确实是这样，伟大的美术家也应在他如何对待需求方面表明自己，不仅仅去做这个需求的奴隶而已。伟大的创作家每每跟他周围的感觉与理解的方式背道而驰。他应该信赖自己的作品终将产生能够欣赏其立意与巧妙手法的鉴赏力和感受力。读者只须一读美术和音乐史上那些受震惊的批评家们向一反传统的新作品所宣布的破门令，就能领悟到那些从褻瀆公众爱好开始的人究竟在多大范围内逐渐转移了公共的爱好。

① 在这名单上，承迈耶·夏皮罗教授(Meyer Schapiro)建议了几个人名字，对此我表示感谢。在编制最有影响的音乐家名单时，我要感谢马丁·伯恩斯坦教授(Martin Bernstein)和B. H. 海琴先生(B. H. Haggin)。我和他们曾讨论过名单上某几个人。当然，对于这些名单所用以表明的观点，他们不能负责。

哲学史反映着政治、宗教和科学的历史，但如不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罗提诺、阿奎那、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兹、洛克、贝克莱、休谟、康德和黑格尔等姑且說到十九世紀早期为止的哲学家們的思想作为叙述的中心，誰都沒法把哲学史說得叫人可以理解。哲学的社会学解释已被过度忽視了，但是它所解释的是为什么某种思想在特定环境中被人接受，而不是为什么产生这些思想。真正能做到体系化了的有影响的哲学，远比所有提出来的哲学要少得多。

有时候，某些思想当时局限于某一学派的狹隘天地內，并没有多大的进展，而在后来的时代里却重新流行了，并且被人当作一种保卫社会权力的堡垒，或从金城湯池中撼动社会权力的手段。如果这几种情况从沒有发生过，这些思想就还不免秘藏在伟大的哲学著作之中，并且只成为在各式各样的思想气候中孤寂的、好探索的心灵永远发生兴趣的泉源。尽管这些思想蒙上了一地方的独特表现形式和强调方法，其中某些时常提到的关于人生、斗争和死亡等論题，对于一切发达的文明国家中的善于深思熟虑的人，都具有普遍的魅力。

即使某种哲学适合于被大家接受，但沒有一种哲学能够显示出它的特殊体系是社会需求或采用这哲学的社会統治阶级所唯一需要的。其他某些同类性质的哲学体系在理論上也一样是合用的。但在所有可以利用来达到把社会理想化或批判社会的目的的哲学体系中，贏得人們接受的那些体系往往以渊博、严密、切合实用和富于适应性见长，而这些长处，各哲学家并非等量具备的。

科学史表明了什么呢？科学发现的累积的特征，科学研究方法的統一性，前一輩研究者給科学提出的共同問題，以及科学、工业和战争之間的密切关系，——这种种似乎都使下述的假定成为看起来极端不合理：即科学发展中大部分成就应归功于它的领导人物的活动。再說，科学界有許多划时代的发现都是两个人各不相关地完成的业绩，例如：牛頓和莱布尼兹对于微积分，达尔文和华萊士(Wallace)对于进化問題，亚当士(Adams)和萊佛勒(Leverrier)对于后来

引起发现海王星的天王星轨道振动的研究；这些在今天已成为老生常谈了。即使一个革命性的发现也还可能依靠一个低微的摇着计算机的实验室助手的贡献。

所有这些考虑，归根到底，仍然不过是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科学中的伟大，与其说是创造了理论上与实践上的问题，还不如说是成功地迎合了这两方面的问题，这仍然不过是承认：科学，象人类其他各学科一样，接受着从社会生活的需求和压力方面产生的某种促进它发展的刺激因素。但是，同样很清楚，这并不否定一个事实：要去作牛顿或达尔文的工作，一个人必须在智力禀赋方面跟他们相等。假定没有十几个实验室助手，认为能另外找到某些摇计算机曲柄或绘制星象图的人来代替他们，这并不神秘；假定没有牛顿和莱布尼兹，或者没有任何可与那种善于掌握他们问题的能力相匹敌的才智（这里，能力是不受外力左右的），而认为其他某些个人必然会诞生出来去做他们的工作，那就确是神秘的了。现代物理学借重于现代工业和战争的，不如借重于下列诸人为多：哥白尼、伽利略、刻卜勒、牛顿、惠更斯、拉格朗日、拉不拉斯、法拉第（Faraday）、福利叶（Fourier）、克勒克-麦克斯威尔（Clerk-Maxwell）、赫尔兹（Hertz）、吉布斯（Gibbs）、普朗克（Planck）、爱因斯坦和其他一小群先知先觉者。甚至可以这样说：工业和战争借重于科学家研究的比科学家的研究借重于工业和战争的为多。真的，就某些最伟大的科学发明来说，例如，就相对论说，很难把它跟工业和战争问题建立起任何似乎有理性的联系。

虽然如此，比起对于艺术家和文学家的创作来，智力方面的传统，社会需求和科学团体的组织对于科学家的发明确是具有远为巨大的影响。在艺术和文学领域中，具有独特形式和风格的新创作的产生，在下述意义上很明显的是个人的业绩——尽管他的一切都有赖于他的文化，但相信假如个别的艺术家或作家没有生过，而他的业绩能被另外一个人干出来，那简直是荒谬。拉斐尔的西斯汀殿中圣母象而没有拉斐尔其人，贝多芬的奏鸣曲和交响乐而没有贝多芬其人，这是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在科学界，任何一个科学家的大部份成

就将被同行中其他个人获得，这是十分可能的。

但是，可能的程度則因成就而异。认为如果没有某一发明，其后的发明就不象会有，——这个論点，我們要設法証实它合法合理，那是极端困难的。不过，某些一般的想法还是适用。如果牛頓在力学和光学方面沒有作出他的发明，我們可以欣然相信不久之后別人也会作出来，因为这些科学領域里某些問題引起的兴趣是普遍的，并且第一流的才智之士設法解决这些問題的其他試图也已独立地作出来了。可是数学和物理学的某些其他分科却表明了个人循着一定方向曾作出了創造性的業績，在他之前沒有杰出的同行先輩，而所有这一方面接之而来的研究却正在产生。举例而言，我們並沒有明确的証据去保証这个論断：即別人也会发现康托尔的超限数理論和爱因斯坦的特殊相对論。虽然断言除了康托尔和爱因斯坦外沒有別人会提出这些理論，未免鹵莽些；但断言別人也会照样提出来，却更少根据。以上这些实例似乎是介于在化学元素周期表建立之后新化学元素的发现所說明的情况和《大弥撒合唱曲》的制作所說明的情况二者之間。

差不多在每一个創造領域中都会表现出創造活动的相同的一般样式。有一些例外，特別是宗教。看来这很奇怪：大多数伟大的宗教运动不仅它們的存在，而且連名称也都是从它們的創立者——琐罗亚斯德、释迦、孔子、摩尼、穆罕默德、路德、加尔文等那里来的。但认为这事实是有决定性作用，或者即使认为有十分重要性，也还未免鹵莽。关于一个宗教运动，有意义的事情是它的社会影响和它为什么繼續存在，而不是一个假定的創立者所宣布的宗教信仰的宣言。我們說“假定的”創立者，因为对于某几位古代宗教創立者的真实的史实性，考据学家正在提出怀疑。而且既然他們的教义有时是由后一代的信徒們确定下来的，我們更无可靠的办法去了解究竟有多少教条被忠实地抄传了下来，或者在解释过程中究竟有多少被改变了。但即使他們的史实性已証明无誤，这对于跟他們的名字連在一起的宗教运动所經受的实践上和信仰上的重大改变，关系也不大。早期教会的神父們在十三世紀欧洲基督教界会被目为异端而烧死。

假如我們用象在我們自己时代里引起宗教运动的同样的力量的看法去判断过去宗教运动的起源，我們一定要作出这样的結論：这些运动主要創造出它們自己的領袖，而这些領袖却成为他們追隨者的需求和愿望的戏剧性的象征。不同于神学的裝飾，而組成了宗教信仰的一部份的道德理想，是社会传统里永远存在的要素。人們在精神方面从試圖控制轉变为寻求救助，这标志着精神已經发生危机和垮台了。在精神发生深刻危机和垮台的时代里，这些道德理想是和一种恳切的希望联結在一起的，即是說，希望事情比外表看来要真正好一些。用超自然的信念加强起来的希望，就是宗教信仰的实质。宗教領袖把他号召信徒們的时候早已存在的一种感情凝結在他本身和他的生活方式的周围。群众中很少几个产生感应的人接受他个人的影响。榜样的感召力量，特別是一传、再传弟子的感召力量，往往只能感动这样一些人，这些人的个人需求和欲望早已驅使他們走上那个方向了。

* * *

虽然例外情况已經指出来了，讓我們暫時还听一听上述各文化領域中英雄决定論的首倡者的主张吧。我們甚至可以对大大夸张了的主张也不加爭論。真实情况是：除了一个从来没有被人认真地辯护过的极端的假定外，一切証据都和我們正在考查的理論完全无关。这个假定是：文学、音乐、繪画、哲学和科学方面的伟大人物也就是世界历史——政治、社会和經濟史方面起决定作用的人物。或者，换一个說法，这一假定也就是认为：一个莎士比亚，一个巴哈，一个拉斐尔，一个牛頓，一个康德，或者一个巴尔扎克的事业的后果，和种种主要的影响一起，形成了社会的发展，特別是形成了政治、經濟和社会組織范围以內的社会发展。

把这样一种原因性的意义归功于上述名单中那一类型的天才，那近乎是一种幻想；除了对于科学界人物是例外，因为在科学方面，这种提法远非幻想，可也不象更接近于事实。虽然这是不可爭辯的真理：技术世界曾受“科学界的英雄們”的发明重大影响，但它必須首

先証实：主要的政治、社会和历史上的变迁是技术发展的作用。即使一点也不否认首先是蒸汽、其次是动力对我们日常生活和生活中的问题所发生的影响，下面的说法也还是正确的：新工具和技术并不决定着社会的政策，而只是给它提供工具。坦克和飞机使现代战争发生了革命；如果人们以可与相比的精力用之于农业和运输部门的话，它们也真会同样地使这些部门发生革命。但是说它们造成了法西斯主义或第二次世界大战，却未免太愚蠢了。这是一定的：技术进步了，可能一夜之后接着便是普遍的失业和贫困，但是失业的更确切的原因，如果不是那么直接的原因，则是社会生产制度，它使这些人的继续工作对于雇用他们的人无利可图，即使对于社会还是有用的。现在的工人们比其前辈懂得更清楚了。前辈工人们只是试图捣毁机器，不去设法把机器置之于社会控制之下。

技术革新并不排除选择和行动的不同途径。技术革新可能因取消某些可能性而致选择的范围狭隘了，它可能被用去实现一旦选定了的决定。它并不造成战争、和平或社会革命——即使是内鬭的各种变动也与之无关。最后，不应该把这点看漏了：在科学巨匠的名册上有些个别的科学家，他们的科学理论并无重要的技术后果。技术的历史，比起可以跟它区别开来（但并不分离）的纯科学的历史来，是次等人物的历史，是一些福特之流和爱迪生之流的历史。他们因获得赛跑冠军（指科技研究的成功者——译者按）而卓然成家。在这次赛跑中，参加角逐的人多到看来没有一个人是非他不能完成这次竞赛的，可是某些人几乎总会获胜的。

摆在我们面前的争论点是在一个不同的领域中，那里，艺术和科学起着次要的作用。问题是标志着历史时期的巨大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变动，或那些成为历史发展中转折点的大事件，是否永远应归功于天赋无双，或境遇无双的人的业绩。假如有这样的天赋无双的人，或杰出的人物，那末在他们能够发挥影响之前，该有怎样的环境场合呢？或者问：他们是不是能随时起作用呢？循着这些方向而作出的专门的细致的研究工作是很少的，但也做了一些。我们接着就要把

話題轉到它們中間最耐性的和徹底的研究上去。這裡的問題比已經討論的領域中的問題要困難得多，因為在給“歷史上的英雄”下定義以別於藝術界和科學界的英雄的時候，所有各種應加考慮的因素都搞混亂了。歷史意義的評價被論爭的激情搞得大為困難。羅伯特·英格騷爾(Robert Ingersoll)和威爾士(H. G. Wells)拒不承認拿破侖是英雄，只因為他們不贊成他^①。道德判斷在歷史上誠然有其應占的地位，但在決定任何個人對於人間事務的實際影響時，它們是不發生作用的。我們可以痛恨希特勒，恰恰因為我們相信他革了二十世紀文明的命。

在我們討論的預期到達的進程里，將會當頭遇到定義問題。但我們首先須得考察的是：〔歷史學家〕對於歷史上杰出人物的影響所作的主要的經驗的說明究竟有哪些發現。這種說明之所以有趣不僅因為它告訴我們某些類型的人物創造了歷史，而且還告訴我們他們創造的歷史究竟有多少。這樣就把我們的話題引導到伍德(F. A. Wood)的著作上來了。

^① 這種態度的典型代表就是 H. G. 威爾士對於拿破侖特性的分析。

“失敗的（一個高貴的假想）拿破侖所能做的只是在機會的高山上舉步開步，正如一只小公雞在糞堆上一樣。他在歷史上樹立起來的形象是一個具有幾乎令人難以相信的自大狂的人，精神空虛，稟性貪婪，狡猾，對所有信任他的人表現出無情的輕蔑，並且夸大地摹仿着愷撒、亞歷山大和查理曼，這種摹仿，如果不是用人們的鮮血凝結成的，則純粹是滑稽可笑的行為。”（《世界史綱》，星出版社 1929 年紐約英文版，第 895—899 頁）

第三章 帝王的影响

卡莱尔(Carlyle)之后,英雄史观的最极端的主张者大概要算美国学者菲德烈·亚当·伍德(Frederick Adams Wood)了。在有关这个主题的文献里,伍德的贡献比较受人忽视。伍德所不同于卡莱尔和这位执拗的苏格兰先知的其他信徒们的,是他试图给予自己的论题以经验的基础,而这一论题将经受批判的、科学的审查。伍德的经验研究,同他的相当奇怪的“配子”(即精子和卵子)史观以及关于古代历朝兴起的先天构想并无关系。他的著作一般地表现为把锐利的眼光、耐性的列举和荒唐的夸张三者合而为一的奇妙的杂拌儿。在他经常表示的不受偏见影响的反复说明中自有其幽默的一面,虽然在有些地方他论证他的论题颇象一位律师为诉讼委托人进行辩护那样,如他在声明客观性时,把它说得多么纯粹,甚至“任何假定也没有,除非这假定是:一本书是一本书和一个印刷字是一个印刷字。”^①

伍德的论证程序很有趣;要给他的发现作出评价,必须先了解这一程序。他详细地研究了西欧从十一世纪到法国大革命时为止这一期间内三百八十六位君主。这些君主们是他从如下十四个国家的历史中抽引出来的:法兰西、英吉利、葡萄牙、尼德兰、俄罗斯、普鲁士、瑞典、奥地利、丹麦、苏格兰、土耳其、喀斯蒂尔(Castile)、阿拉冈(Aragon)、联合西班牙(United Spain)。他所考察的这段世界史是一段帝王们,当作一个集团看时,发挥着(就手头材料所示)比先后任何时期更加专制的权威的历史时期。同时,伍德还作出了一张各个帝王统治时期各国国内情况的对照表。接着他把统治者的个人品质和性

^① 《帝王的影响》,1913年纽约英文版,第8页。

格跟他們国家的情况作一比較，以便决定两者之間究竟有没有任何实在的相互作用。他把統治者分为三个品类——强有力的、軟弱的和普通的，并用“+”、“-”、“±”三个記号分別表示之。他們王国的情況同样地也分为三种样子：即表现出繁荣光景，或衰落光景，或两者都无明显征象。这些情况也各用“+”、“-”、“±”記号表示出来。

統治者的性格决定着他究竟应属于哪一品类，而他們的性格描写則根据于“标准的”史料，百科全书以及其他参考資料的广泛考察，而不为这些資料的写作观点所左右。性格描写主要根据智力特征，而不是德性，因此分为上智，“+”；下愚，“-”；或中庸，“±”。伍德把各种学派的史学家們对于一位帝王的“善”与“恶”，或他們究竟是人类的福星还是祸首的判断，同他們对于一位帝王的“才气纵横”、“昏愎愚妄”、“睿智”、“顛預”、“軍事与政治才能”的判断作了对比后，发现各家判断之間具有令人难忘的一致性。

一国的情况只是就它的物质方面的历史——几乎全部由“政治与經濟事务”組成——去判断。更明确地說，物质条件的分类，即分进步的、衰落的、或既不进步又不衰落的，是以历史学家对下列各項的叙述为依据：“財政、陆軍、海軍、商业、农业、制造业、公共建筑、領土变更、法律和守法状况、整个人民群众的一般情况、政治自由的增長与式微、以及国家的外交形势，或从国际間所看到的該国的威信。并不试图包括文学、教育、科学、或艺术活动在內。”^①最后这些題目所以省略掉，大概因为在权威历史中对这些問題的估計格外具有相对性。但伍德並沒有証明：这方面的判断比物质事务方面具有更大的相对性。

在这不厌其煩的論証过程的末尾，伍德得出一个非常触目的結論。他把帝王表和其王国情况表作了比較后，断言道：两者相互作用的系数“約0.60到0.70，而可能的誤差为0.05左右”。他粗略地計算了所有与他自己的假定相反的两可情况，作出最保守的估計，认为

① 《帝王的影响》，1913年紐約英文版，第10頁。

相互作用系数的值是 0.60。用百分比来表示，他闡明結論如下：“强有力的、普通的和軟弱的帝王分別处于强盛的，普通的和衰弱的时期占实例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强有力的帝王而处于衰弱的时期，和軟弱的帝王（包括非王室的摄政者們）而处于强盛的时期，約占实例的百分之十。另有实例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則为普通的帝王而处于强盛或衰弱的时期，或普通时期而有强有力或軟弱的帝王。”^①

这些相互作用的系数和百分比是极端高的，不能煞有介事地把它們解釋为只是事有凑巧而已。根据这些情况，可以把它們解釋为如下三种不同假設的証明：（一）历史条件产生强有力的、軟弱的或普通的帝王；（二）各类帝王給历史条件以决定性的影响；和（三）无论帝王或历史条件都是某种第三类因素的结果。伍德擴弃第一和第三，而单单采取第二个假設。他用一种在他著作中最为温和的說法断言道：“帝王們影响了历史；何况，从十一到十九世紀，帝王們影响欧洲的历史十分巨大，帝王們的性恪和其国家情况的相互作用至少大概 $r=0.60$ ”。^②

这一論点当然和英雄史观相符，但在伍德著作中，它跟其他两个主张有联系，而这一論点，在对它作任何評論之前，应当把它同伍德的其他两个主张区别开来：第一个主张是历史上的英雄首先是帝王；第二个主张是帝王在本质上与其說是社会的創造物，不如說是生物的創造物。的确，伍德把他的生物学上的想象充类至尽了，竟管王族叫做“人类的亚变种”。^③

伍德有計劃地輕視历史上杰出的非王族人物，即使他們当了摄政者，或国家的权貴。他并不否认黎塞留比路易十三强，或者，如果他的研究工作下及十九世紀，也不会否认俾斯麦比威廉第一强。他认为容許政治家、情妇或教士从自己手里夺去权力之繩的帝王是軟弱

① 《帝王的影响》，1913 年紐約英文版，第 246 頁。

② 同上书，第 85 頁。

③ 同上书，第 275 頁。

的。假定我們接受伍德所开英雄的帝王名单的表面价值，而在这名单上加上这些有权有势的非王室人物的話，那末主张英雄史观的論点当会加强。但如果我們排斥他的名单和他关于帝王作用的結論，这不足以駁倒含义更广的英雄史观，后者所认为的英雄是不管他出身于哪一个社会阶层的。除非用他固执的配子預定論的說法，一般很难理解为什么伍德并不去扩大他的考察，以决定所有有材料可查的身居要津的人物的性格跟他們本国国情之間的相互作用。

这个配子史观使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輕視了环境的因素，并且几乎绝对強調所謂遺传事实。照伍德的看法，“精神品质正如生理品质一样地遺传下去，并且遺传的程度也一样”，而在精神品质之中包括着所有特性，如智慧、軍事方面的英勇、野心，这些特性的有无对帝王的强和弱有重大的关系。“既然残酷与不残酷典型的区分，荒淫与正經，野心勃勃与慵懶痴頑等等的划分并不明显和绝对明确，那么现在所考察的区分趋向就只能希望在通常的遺传作用里去考察了”。^①伍德因而肯定說：“近代王族（从紀元一千年起），当作全体看时，在智能方面断然强于平常的欧洲人；我們可以毫沒有被反駁的危險，說：王族，作为一个单位看时，是优于任何一个家族，不管这一家族是貴族或是平民”。^②

談到伍德的配子史观，我們說，他的生物学理論很难自圓其說，其中論証是浅薄的和先驗的，所引的具体証据也并不适当，这并不算太苛刻。不管有什么理由去相信精神特质可以遺传轉移，这些精神特质必然不包括伍德在作帝王分类时所列举的那些特质。随手打开他的梗概表来，看一看他描写奧地利的約瑟夫第二的性格吧：“不知休息、勇敢、野心勃勃、机警和見聞广博……不实际、专愛空想、拙劣的將軍……仁慈、寬大、急于改良。严厉而厚道。以對内有美德而見善。其主要缺点是口是心非。”或者再看这段对俄罗斯的德米特里

① 《帝王的影响》，1913年紐約英文版，第270頁。

② 同上书，第257頁。

(Demetrius) 的描写：“野心勃勃、富有胆識、渊博、多才而輕率。好脾气、和蔼可亲、好心肠、庄严。” 再看这段对英国約翰王的描写：“并非不智或欠缺一股子猛劲，但优柔寡断且无深远眼光。十足墮落、卑鄙、有仇恨心、淫蕩、残酷和虛伪。”

就生物学理論言，硬說大部分这些特征在发生学角度上說是預先决定的，并无一点可資辯护的理由。一个人的精力可以靠他生来的生物学上所謂天賦，但是养成他“不知休息”或“野心勃勃”，熱中于战争或研究的，却断然不是靠天賦而来。性的力量可能在腺的遗传方面有其根源，但是认为“貞操”，即是說：丈夫的堅貞；或“荒淫”，即是說：追求有夫之妇——这是伍德使用这些名詞的方式——是系腺方面的天生素质，真是荒唐透頂了。毫无理由去假定圣奧古斯丁为了教会和独身生活的緣故而休去他的妻妇时，他的腺改变了。

即使关于尚有討論余地的“智力”問題，伍德的主张也并没有什么說服力。因为，大体上，他认为智力的标志是成功——“智力意味着实际上获得財富与权力”。他只是从获得权力方面的成功与失敗之处推断有还是没有遗传的智力。假如帝王与帝王之間和帝王与平民之間取得权力的机会是相等的，那末这个推論也可以說是正当的。但伍德并不敢这样冒险断言，除非就史前蒙昧时代而論，因为关于史前蒙昧时代，黑格尔曾經說过，我們最最可以肯定的，也就是我們最不了解的。

在評價遗传和环境——发展帝王的特性并产生發揮这些特性的机会的环境——的相对意义时，伍德根本貶低了环境的影响。他甚至否认帝王拥有較平民更好的机会去发展他們的才能，硬說：不管帝王享有多么优惠的条件，它們早被更大的不利因素抵銷掉了。他給自己的結論——王族的卓越与其說是社会的賜与，不如說是自然的賜与——想出的論証理由之一是帝王們，作为一个階級来看，在政府中較大臣們具有更大的成就。“……总计所謂伟大的政治家总比帝王的总数要少一些。机会可能曾（！）帮助帝王們为数比大臣們要多一些，但其他考查材料指出了机会之不同通常只具有一点点的成因价

值(!)，这完全不象是那样的不同，即足以说明那个在数字比率上表现出来的巨大差异——这些差异显得政治家出自皇族的机会千百倍地多于出自平常人家。”^①——

当人们想起伍德所讨论的是一个君主专制政体和世袭继承成为常例的时代；他所说的机会“可能曾”帮助帝王们为数比大臣们要多一些，似乎是一个笑话；而他提到平民也具有相当机会，则成为趋炎附势的笑话了。依据同样的逻辑，人们可以主张说，一个世袭教士在进行寺院仪式时所以表现出才能来，其原因当从他比俗人具有发生学上的优越性这一方面去找得。如若认为“其他考查材料指出了机会之不同通常只具有一点点的成因价值”一句话是既定事实，那人们就能引证大批考查材料，从教育一直排列到军事成就为止，证明机会之不同却经常具有巨大的成因价值。最伟大的将军们，如大家所熟知的，差不多总是受过专业训练的。

大概顶顶确实的证据——证明伍德过份卖弄他生物学上的拿手好戏的，可以在他自己引证的历史材料里找到，不用说，也可以在十九到二十世纪的君主政治史中找到。照他自己承认：从1603至1811年，没有一个具有杰出才能的统治者身登英国大宝，可能的例外就是威廉第三。可是这一漫长的时期，照他说，却是一段继续不断地进步的时期。苏格兰也有相同的情况。对于这一个在英吉利、苏格兰历史和欧洲其他国家历史之间的可惊的不同，并没有什么配子史观理论可予解释。整个十九世纪当中，几乎每一个国家里，帝王们比起国内政治家来总是相形见拙。在二十世纪，他们或被放逐，或成为装饰性的象征。拿破仑，就配子作用和社会地位说，是一个平民，而与欧洲戴皇冠的一起挥金如土。一百年之后，列宁、托洛茨基、墨索里尼、希特勒、阿泰托克(Ataturk)、梅泰克雪斯(Metaxes)以及追随独裁者们所树立的榜样之后的其他小信徒们，或是埋葬了他们的君主，或是把世界上“最优秀”家族的苗裔变成下贱的残物。对配子史观所要说的

① 《帝王的影响》，1913年纽约英文版，第261页。

就是这些！

现在，我們可以撇开伍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奇妙的狂想来考虑一下他的积极的发现了。即使我們接受了他对于帝王与国情以及二者相互作用的系数的评价，这评价本身还是不足以证实以下这种观点：即“世界上的事业是由少数几个极伟大的人所开创和指导的”。相互作用所提醒人們的是环境給予伟大人物的成因影响跟伟大人物給予环境的成因影响是一般大的——这个可能性，伍德因运用无效的論証和以假定情况为論据的巧辞論証而把它忽略了。益发重要的是，一直要到我們了解了在国家情况和其他可变因素（如技术发明、气候变化、新土地和资源的发现等，以及此外一些并不直接依靠帝王决定的其他因素）之間到底存在着什么相互作用时，然后才能确定相互作用的相对价值。理論上說，这些一連串东西之間的相互作用的系数可能高于 0.60。我們根据这样一系列的因素可能比根据統治者的遗传素质对于文化的特征做出更加正确的預言。

假如我們把話題轉到伍德所提出的逐項相互作用，我們第一个批評是这些起相互作用的各項含义太广泛，以致在评价历史上英雄的行为时它們无法十分說明問題。例如，“一国的形势”，在任何时候，或者即使指某一段时期，总是含义太多并且太不确定，难于把它归因为个人行动的结果。我們对于人的行为效果的自身經驗指出，只有当我们把〔人們〕所特有的作为与不作为之类的行动，通过一連串事件，跟一些特殊的事件与随之而来的种种后果联系起来的时候，才能断定这些特有的行动是否具有历史的因果作用。伍德沒有在一連串事变之中考虑事件，这使他整个治学方法搞糟了，因为他沒有办法去处理历史上的事变性行动和事变性人物。举个例說，假如某一帝王是个强有力的人物（+），而他的在位年代是动乱的（-），伍德便以为这是他在历史上沒有起重要作用的証明。但很明显的，他在位年代里的动乱局势也可能就是那位帝王的行为造成的結果，就是某种胜利或灾祸的結果，或某一与国运有关的政策的結果，这种政策的后果

是我們可以通过特定条件下一系列連續的事件而追索到的。同样，假如某一帝王是强有力的，而其国家又恰好是繁荣的，伍德就假定这是英雄史观的証据。但这样一种假定是毫无根据的，除非能够指出国家的繁荣（不管怎样去給它下定义、怎样去衡量它）是某种历史事件的结果，而此历史事件的原动力又正是这位君主，或某一其他伟大人物。

假定一代帝王和其在位时代之間具有因果联系，这正是伍德治学方法中的巨大缺陷。假定一国的“繁荣景象”，或其“衰落情况”一定是当朝帝王的特性或决策的结果，这有什么正当的根据呢？在某一特殊的重要方面，一国的形势可能是前朝帝王在推行一种政策时种种行为的后果，但这种政策的后果，不論好或坏，都要在他退出历史舞台以后才一一显露出来。法国（1731—1793年）的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是“軟弱”的皇帝，而他們的时代特征是社会、經濟情况悲慘不堪；但把这些悲慘景象归因于路易十四（1661—1715年）的政策和活动，則可能看起来更为合理些，而路易十四是一个“强有力”的皇帝，他的在位时代比起他的那些子孙的时代来要繁荣得多。大不列顛工业革命的种种后果在維多利亞女王时代，比乔治第三时代，要表现得更为透彻而明显。可是把貿易昌盛和商业繁荣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景况归功于她，或归功于迭斯萊列（Disraeli），或葛萊斯頓（Gladstone），那就大謬不然了。其实这也是駁斥所有英雄史观时必须考虑的一个严重問題：把工业革命归功于乔治第三，或工业革命开始时代的任何一个人物——这究竟有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呢？都市化給现代文明的非常革命性的影响，不管当时活跃着的是些什么头戴皇冠和列身朝堂的人物，还是会产生，这里說的仅仅是工业革命的后果之一而已。

从另一个立脚点去检查伍德的梗概表，我們发现“繁荣”这个名詞，即使只取它“唯物主义的”意义而言，也实在过于包罗万象了，簡直使我們无法充分肯定地据此断言一个时代的特征。依照伍德的看法，一国的繁荣是可以从历史学家們关于該国如下几种情况合在一

起的叙述中推論出来：“財政、陸軍、海軍、商業、農業、製造業、公共建築、領土變更、法律和守法狀況、整個人民群眾的一般情況、政治自由的增長和式微、以及國家的外交形勢，或從國際之間所看到的該國的威信。”他並沒有明白指出一個國家到底應該在一個方面顯示最巨大的進步，還是應該在所有這些方面都進步才能叫做繁榮。他明知一個國家難得會全面“進步”，但對於不同領域中取得進展的相對重要性，他卻沒有作出估價。一個具有偉大的公共建築、安定的法律和守法狀況，但賦稅過重，政治自由式微的時期是否應該看作“繁榮的”呢？或者採用伍德為查理第一時代的英國所舉示的種種特征的實際綜合為例：“商業和一般物質福利的擴大。國際威信衰落。公眾不滿。內戰時的災難。國會為自己的生存而奮鬥。”^①究竟根據什麼原則，伍德從這些情況的排列對比中得出“繁榮”(+)的結論來呢？當我們把這個結論同他對英國從1199年到1216年這一時期的特征描寫——為(±)，即根據下述原因定為既不繁榮又不衰落——作一对照，就顯得我們的問題格外提得恰當了：“動亂與不和終於形成大憲章。個人的權利明確了、加強了。立憲政治的成長這件事應看作非常重要”。英國立憲民主政治的成長，對於該國嗣後的发展來說，確乎非常重要。那末，為什麼它不比當日的一時混亂和局部失調反見重要呢？

那些現狀激烈變動的时代，不管它們的最終成果多么進步，在伍德的表上，這些时代在多數方面都顯示出相對的衰敗來。這很顯然，作者自以為自己完全不受那些並未表明出來的價值判斷的影響，而實際上這些判斷在他進行分類時却大起作用。當我們用這樣幾種包羅萬象的范畴，如“繁榮”和“衰落”等去處理題目，而不把它細分成表達比較有限的社會現象的名詞時，這種毛病就逃避不掉。

給伍德說句公平話，應該強調指出，他是了解某些困難的，雖然沒有認真重視它們。在研究之初，他承認對政治自由作出相應的評價很覺為難，因為“人們經常發現在強有力的國王統治之下，國家差

① 《帝王的影响》，1913年紐約英文版，第401頁。

不多在各方面都昌盛兴旺，只是人民受着压迫”。他快刀斩乱麻地干脆把国家的政治自由跟个人的勇敢和坚定一样对待，当作“中间属性”，一部分是物质的，一部分是精神的。他建议我们“二等分”之。这意思是说，我们或者在评价一国情况时不管有没有政治自由，或者有时候，在没有指明的情况下，我们应把免于压迫之自由看作繁荣的社会的要素，但有时候也不如此。不论是哪种情况吧，这种论证程序看来是随他高兴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实际上，伍德是这样：他不能无视于政治自由的状况，而同时，他又不知道应该把它怎么办。既是 he 相信着历史学家们对不同时代的一般评价，就应当看到历史学家们给政治自由所规定的重要性显然会因他们的立足点和历史哲学的不同而异其规定。一个蒙森(Mommsen)派史学家对某一时代的看法将不同于一个吉朋(Gibbon)派史学家；一个泰因(Taine)派史学家对之不寒而慄的政治事变恰正是一个米歇勒(Michelet)派史学家所夸说的。当这些历史学家们的判断混杂成一个假定算是某一时代的客观、全面的描绘时，这一描绘就掩盖了一种价值判断。

伍德把帝王分成优秀的、普通的和低劣的三种，其理由也不是常常明显的。为了使他的分类取得一定的科学价值，那些决定帝王属于哪个特殊品类的特质就一定要不受他在位年代的国家情况评价的影响，因为他相信国家的情况主要是那些特质的结果。从国家情况中推断帝王的特质，然后再引述这些特质作为造成这种国家情况的决定因素，这显然成为严重的以假定情况为论据的乖谬论证。可是还令人难免觉得伍德所给分类的帝王如果生活于不同的时代；伍德便会把他们的“与生俱来”的品质作出不同的划分。关于英国的查理士第一，伍德说，他的主要毛病是“口是心非和固执不化”。根据同样的材料，别人却可能说，查理士第一是“精明圆到而颇有原则性的”。大概伍德在抱着一种不同的政治与宗教偏见时，或者在估计那个国王和一个不很艰难的时代的关系时，就可能同意这种看法了。这里，同样的，道德的判断完全加入到对个人性格的全面评价中去了。

对伍德的论点的最大的反对理由大概是他出于自己的爱好而把

时代局限于法蘭西大革命之前。整个十九世紀給他提出了关于各国帝王的生活与命运的实际上一无穷无尽的材料。但他不去接触它。原因很清楚。甚至是一个最頑固的保皇党也不会认真地主张十九或二十世紀的帝王是英雄，除掉一个不是王家出身的篡夺者拿破仑之外。最近两世紀的帝王影响之衰落对伍德來說，是整个儿难于解释的問題。說明这一衰落的那些情况与事故不能把它們本身解释作为帝王行动的结果。因为照伍德的主张，遗传因素是比較恒定的。

总结我們研究伍德为他自己限定的那个历史时代的証据，我們不能不作这样的断言：他为王室的利益而作的殷勤的、饶有趣味的努力是失败了。假如他扩大专题研究到数十个杰出的人物，以便逐項地探索他們在决定帝国趋势和历史河流动向中所作出的贡献，他的論旨虽不至于这样极端，但可能健全得多。不論他的发现具有怎样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都能够被如下事实所充分說明——即，既然他研究的正是君主专制时代，統治者自然要比后来的时代拥有更大的無論作好事或作坏事的权力。話得說回来，如果这是历史时代的性质給君主政体的影响划定了范围，那末一个时代轉变为另一个时代又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

現在我們必須把話題轉到那些社会决定論者的相反的主张上，他們深信他們了解答案并且解决了問題。

第四章 社会决定論：黑格尔和斯宾塞

十九世紀期間被夸大了的卡萊尔“英雄主义”引起了一种相反的思想。这种思想并不否认历史上英雄人物和英雄活动的存在，甚至也不否认它的必要性。它所主张的是：英雄活动所造成的事变决定于历史规律，或者說决定于英雄人物出现时的社会需要。哲学家們对于这种强迫性的社会需要，說法各有不同：有的把它叫做“形而上学的”，有的把它叫做“理想的”、“文化的”、“政治的”、“經濟的”等等。而我們將統称之为“社会的”。这种社会力量，每当必要的时候，会从茫茫人海中召喚出一批英雄来。英雄人物的“使命”就是要完成当时的历史任务。而英雄人物的伟大程度則要看他对于这种被賦与的任务究竟了解得多少。

有的哲学家认为：根本不需要英雄人物来完成世間的工作。他們相信社会需要会通过群众的活动来“实现它自己”，而构成群众的单个的人，站在远处来看，是彼此不相上下，无法辨别的。对于他們來說，只有群众或階級才是英雄。这一派的若干后继者的著作，又把生产数字代替了群众的地位。

十九世紀中所有的社会决定論者有个共同信念：即认为不管英雄人物的活动造成的后果意义怎么重大，总可以从各个完全不同的考虑角度在事前加以推断。不过一般总是就事論事，也就是說：总是在英雄的事业已被人們观察到了之后，才加以推断。

即使他們主张某一位有着某种英雄气质的人确是在一个必然性的历史典型中构成其中必然性鏈环底必然的一环，也极少是在他作出了英雄之所以为英雄的業績以前就断言：有某一个具体人物符合了当时时勢的种种特殊要求。黑格尔曾称赞拿破仑这位英雄人物为：

“馬鞍上体现出来的世界灵魂。”但他也是在耶拿附近亲自瞻仰到了这位英雄之后才有这样信念的。可是他更加相信的是：即使拿破仑沒有降生，也一定会有另外一个什么人物出面来体现那“狡猾的理性”的使命——如果不是在馬鞍上，也許是在步行中吧。

不同意于英雄决定底一般观点的說法，不一定就是对这种学說和其倡議者作明确的駁复。例如，在所有的社会决定論当中，以黑格尔的学說为影响最大；而黑格尔的主张在卡莱尔的学說还未变成时髦以前老早就已构成体系了。黑格尔的学說乃是針對着十八世紀的唯理論者而发的——这些唯理論者用个人心理或是运气的好坏来解释历史。馬克思的主张則是做为一个包罗万象的历史哲学的系論而提出来的。斯宾塞虽然帶着輕蔑的眼光来批評卡莱尔〔正如巴克爾(Buckle)和騰(Taine)所做的一样〕，但他所写的东西沒有一句不是从他尊奉的社会进化鉄律的教条当中自然流露出来的。

我們现在来詳細探討一下这三派决定論者关于英雄的历史地位不同的論点，对于我們是会有所启发的。

黑格尔的看法（在这方面追随他的斯宾格勒也是一样）是认为：伟大人物并不是物质条件（也包括社会的或生物的）的产物。根本上說，却是他的时代“精神”的表现，或者說是他那个文化的“灵魂”。当文化向前发展，就有种种客观需要产生，而这些客观需要是要通过人們的主观决定体现出来的。人們滿足自己的多方面愿望，履行自己的迫切义务，并以他們自己的智慧和勇敢来克服自然界和社会界的种种障碍——但他們所造成的东西总是不同于他們所期望的。每一个人都只是在若有所知的朦朧状态中編造了命运之网的一股绳子。所謂命运之网也就是历史的“意义”或历史的“理性”。伟大人物就是一个了解到他的言行是表现事物的理性的人。他尽管騎在别人头上，或甚至騎在全体人民的头上，也还是具有历史的或神圣的根据，那些黎民百姓就老是只懂得些平常道理。

黑格尔认为每个时代都会有当之无愧的伟人，但所謂“当之无愧”不是决定于伟人怎样审慎选择自己的出处，而是决定于一种由上

天鑄定的模式。这些模式是由时代当中滋生出来的，而且还以一种神秘的方式渗透到时代的各方面事变中去。号召那伟人降生的，时代所面临的种种任务并不是从获得面包、和平与自由解放的日常問題之中产生出来的。而是含蕴在人的邏輯概念之中，含蕴在社会发展的种种有機的必然性之中。沒有这些必然性，人就不能成其为真正的人，也就是說不能成为自由的人。黑格尔自信他已認識到日耳曼民族注定要成为統一的国家，并且是最后一个举起自由火炬的民族。但他的認識并非根据于德国經濟史或政治史的特质，也不是根据他所效忠的奥地利皇帝或普魯士国王的个人英雄的种种性格。他的認識是以自由这个邏輯概念的辯証必然性为根据的。行动方面和思想方面的伟人就是掌握了这种必然性，而且也為这种必然性所掌握的。同样，斯宾格勒也認識到：每种文化都会有它自己的亚历山大、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但他認識到这点并非由于任何經驗証明，而是由于他对于那社会有机体的永恒生命循环有了一种形而上学的默认。沒有这种类型的伟人，社会有机体就不能体现“它的灵魂的风格”。

根据这种见解，任何个人的伟大只有等到事变之后，等到他的全部业绩变成尽人皆知，而且能够有把握对他加以品評的时候，才能显现出来。伟人并不創造历史，而是“伟大的时代”召唤出伟人来。“伟大的时代”就是指人类从自由与組織的一个水平上升到自由与組織的另一个更高的水平之过渡时期。所以，伟人是总会找到的，不过究竟在哪里找到——是在皇帝的宝座上，还是在乞丐的草棚中——却是料不到的偶然。

那末，由黑格尔来看，所謂伟人的伟大究竟在于什么地方呢？就在关于什么是世界秩序这一种朦朧的知觉当中。这种知觉最后会轉化成为政治行动，用来安定世界秩序。伟人黎愷撒、亚历山大和拿破仑等等都是被神圣的理性接触过的。在他們同时代人的清醒头脑中，这种神圣的理性看来好象是疯狂似的。

由此可见，这个东西不仅仅是他〔愷撒〕个人的胜利，而是一

种不自觉的本能；要来完成那时机已经成熟的事业。一切伟大的历史人物——这种人自己的特殊目的关联着“世界精神”意志所在的那些重大事件。他们可以称为英雄，因为他们不是从现行制度所认可的、沉静有常的事物进行中，取得他们的目的和他们的事业；而是取自一个泉源——它的内容是隐藏着、还没有达到现实的存在——取自那个内在的“精神”，这“精神”依然潜伏在地面之下，它冲击着外面的世界，仿佛冲击一个外壳，把它打成粉碎。因为他自己具有另外一个核心，而不是这一个外壳的核心。所以他们这种人在表面上象是从他们自身吸取了他们生命的冲动……

当这类人物追求着他们那些目的的时候，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展开的那个普遍的观念；相反地，他们是实践的政治的人物。不过，他们同时又是思想的人物，他们见到什么是需要的东西和正合时宜的东西。这个正是他们的时代和他们的世界的“真理”；可以说是排行在次一瞬間即将輪到的物种、已经孕育在时间的母胎之中了。……这样说来，我们应当把世界历史人物——一个时代的英雄——认做是这个时代眼光犀利的人物；他们的行动、他们的言词都是这个时代最卓越的行动、言词。^①

我们现在不难理解为什么黑格尔反对把一般俗人（原文是：世俗的有死者）的道德标尺应用在伟人的事业上，或是应用在他所属优秀民族的业绩上。这就因为英雄人物对于他们所成就的无情业绩是不能负任何责任的。他们都是未来的时代精神的工具，而且是一个倒霉的工具——只待他们的事业一旦成功，他们本身就将为历史所抛弃。“他们的一生都在辛劳和困苦之中渡过。……他们或者早亡，象亚历山大；或者被杀，象恺撒；或者被放逐到圣海里那岛，象拿破仑。”这就是伟大的代价。英雄可能死亡，也可能显得遭受失败，但“历史”总会为他们辩护。

① 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 1956 年版，第 69 页。

——但我們不会受黑格尔辯解的欺騙。他的全部哲学不外是处心积虑地要把个别人物的单个儿行为所应負的道德責任轉嫁到那非人格的自然与历史的“大全”身上去。他讓我們相信：他心目中的英雄都是身不由主的，正如他們的时代是必然的，他們的行為也是必然的——这都是受了同一邏輯的支配。他犯了双重的褻瀆罪：既說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又說现实的就是神圣命定的。那受天之选的少数英雄正如那非受天之选的多数群众一样——都不能創造出任何东西，而只是执行早已派定的任务。即使世界上所有的英雄都不存在，世界历史还是会照样进行的。

假如我們把以上引自黑格尔的那一段話加以仔細推敲，便不难明白：一旦剝掉它所披的唯灵論的外衣，其中原来包含着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决定論所具有的共同假設：

1. 沒有一个人能从新創造历史。他总要受到他那个时代和文化的限制。他的精力和聰明也許是盖世无双的，但他的种种愿望和他着手要做的事业都是如同黑格尔所說：早已植根于“客观精神”之中。而所謂“客观精神”也就是如今的人类学家所謂文化——那是指超乎个人之上的种种制度，如語言、家庭、宗教、法律、艺术和科学等等。在某种意义上說，我們必須这样来理解：他的行为决不是代表一个个人适应环境的活動，而是文化的一个方面和它的另一个方面交互作用的結果。伟人所能夠做的只是当时的文化环境容許做的，但文化只能容許向一个方向去发展——这一点却是关键所在。沒有真正可以选择的余地。

2. 人們（即便是伟人也罢）所想象他們自己正在做的事，和他們所做所为的客观意义或重要性——这其間是有着分別的。他們种种活动的意义，追根到底，必須从历史的趋势上来理解。而历史趋势是要：追索到过去，包含着现在，而且指向着未来的。在严肃的历史事續面前，人們很容易随便利用那道德上所謂正义的标尺，就因为他們往往只就一个一个的事件来品評是非。但那正是一种幻想，是人們的鼠目寸光所致的。

3. 那震撼世界的事功或思想，足以表征某些人物之伟大的，只有在当时的文化已经有了准备，或者说，已经对此成熟时才有其可能。英雄必须是在社会发展的某一个阶段上能够顺应时势的人物。正如一个婴儿的降生，虽然必须依靠助产婆的帮助，但只有胎儿已到成熟时才能生出来。尽管象普罗米修斯^①那样的呼风唤雨的本领和创造生命的热烈愿望，除非他所能创造的那个生物已在现有的种种条件下生出了胚芽，他的愿望还是要注定落空的。“那单只表现愿望的月桂树不过是从来没有变绿过的〔想象的〕一树枯叶而已。”^②

4. 因此，所谓伟人不过是历史力量或社会力量的一个“表现”，一个“代表”，一个“符号”或一个“工具”罢了。他必须顺应历史的潮流才能获得声望，或取得胜利。如果我们要想掌握他所以伟大的来源或理由，他的自传，或者，纯粹个人性格，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都仅具次要意义。我们必须转过面来考察他那个时代的社会与文化。因为只有当时的社会与文化才是那伟大的历史力量发生连续震撼的场所。而这正是我们迫切需要理解的。科学的历史或社会理论的目的正是要认识和掌握这些历史力量。也只有认识了这些，人们才能获得自由和控制社会的力量。社会决定论的各种变型之间的不同，就看他们是怎样来解释所谓“科学的”这个术语——究竟是经验论的，还是形而上学的。

斯宾塞和受他影响的那一群知名的作家达到了相似的结论，不过所用言语不同，所根据的形而上学的前提也不同罢了。斯宾塞所以相信伟人在历史上的重大作用，其所用的方法并不是依据经验来仔细研究世界历史，而是单纯地由他的社会进化论演绎出来的。社

① Prometheus：希腊神话中半神半人之神，曾盗天火，将其用法授予世人，因而获罪，被宙斯缚于高加索山上，每日命一鹰鸟来啄食他的肝脏，以折磨他。——译者

② 黑格尔：《法哲学》，拉松版，第 317 页。

会进化論的假設是：所有的社会都是以一种一致的、渐进的和进步的方式向前发展。如果有任何一位行險侥幸的天才或冒險家能够让社会发展軼出了它的既定的道路，那末，在发展中将找不到一致性，或者尤其可怕的是不能保証发展的渐进性。这时革命就会发生，只有革命的爆发能够来打断那緩慢而逐漸积累的演变进程。

虽然斯宾塞沒有讀过多少历史传记，但他却堅信：“如果你希望理解社会进化的种种现象，单靠閱讀历史上統治者传记（由那貪婪的拿破仑到那阴險的腓特烈），纵使你把眼睛讀瞎了也达不到目的。”^①斯宾塞还没有象巴克尔那样陷于荒謬的极端，因为巴克尔第一个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即认为国王、將軍、政治家等等人物只能阻碍文化的发展，从而把他們叫作“傀儡”——意即毫无历史意义。假如我們有兴趣来一一摹拟自古以来这样一些人物的生动图形，历史上伟人的数目的确是車載斗量的。但如果竟把任何划时代的大事归功于某一时期的某一个人，那就和走入死胡同一般，将会全无所见。一位科学的历史学家〔当他涉猎史册时〕，也許会把个人看做是某一决定性事变的切近的或直接的原因。但他还得进一步地深入研究：問題中的个人究竟是怎样产生的？个人的那些行动究竟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在他（伟人）重新創造社会以前，他先得被社会創造出来。”^②

① 斯宾塞：《社会学研究》，美国1912年版，第37頁。

② 在关于伟人及其环境这一問題上，斯宾塞的见解对于现代社会思想的影响是极为广泛的，——这样说，决非夸大其辞。例如，奥格本（W. F. Ogburn）所著《社会力量》第5卷（1926—7版）第225頁以下《論伟人和社会力量的对照》一节，可供参考。虽然著者对于生物变化的事实，比起斯宾塞来，給予了更多的注意，但論旨还是大体相闻。“假如有某人想把伟人林肯和他那个时代的社会力量加以对照的話，必須記牢：成年約林肯代表各种社会力量的一个部分（因为正是这些社会力量促使他的产生），所以必須和他做个对照。”因此，伟大人物乃是时代的产物，反过来也就可以說：是他們的成就影响了那个时代。所以，伟人不啻是社会变化的一个媒介。”研究的結論是說：“所以伟人和他的業績好象只是一个过程当中的某一个步驟，而那是大部分要决定于其他因素的。”这其間絕沒有留下一些余地可能容許步驟会重新决定进程的方向。一个人走錯了一步，还有可能致于死命。为什么时代的錯誤（或錯誤的步驟）就决定不会对于一种文化的成敗給予絕大的影响呢？

我們試來玩味一下斯賓塞的這一句話。這一句話似乎道出了一個平凡的真理。但正如社會理論和政治理論上的許多術語一樣，其中滲透了一種不自覺的，從而也是足以導致錯誤的類比推論。嚴格地說，個人是生物界的創制品。至少他必得先是降生下來，然後，他的社會環境或教育才能着手塑造他的個性。我們永遠不能把個人從他降生不久之後就已開始獲得的個性區分開來，但我們卻能夠分辨：縱使在相同的或相似的社會環境下，個人之間還是有着種種不同的能力或潛能的。我們都很熟悉：受支配於相似環境條件下的個人，往往會有極不相同的反應。正是那環境的影響，不能總是相似的，就因為個人對於環境會有種種不同的適應。往往兩個人從一生下來就有着相同或相似的機會，但是到了後來他們的成就却有着重大的歧異。究竟這個歧異是否由於某種強烈的生物學上的潛能之有無，或者由於某種不屬於環境文化的什麼〔因素〕之有無——這至少還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人類的種種特徵有的屬於天賦的本性，有的屬於獲得的文化。這其間的區別的確可以辨識，但是很難分解的。而斯賓塞所用的“創造”或“產生”等等術語則適足以妨礙我們對此做精密的辨識。

雖然斯賓塞所用術語足以導致錯誤，但他已充分地承認歷史上的英雄活動問題還須進一步地加以探討。即使承認在偉人能夠改造他的社會以前，他先得被社會“創造”出來，不管這是什麼意思，至少已經含蓄着承認：某些人能夠改造社會的可能性。所有的人都是社會創造出來的，但僅有少數人能夠“改造”社會。英雄決定論者向對方所提出的要求並不過這點，因為他們所要求的也只不过是公平地承認一件事或一個問題罷了。因此，斯賓塞還得做更進一步的努力。他所用以表達要把英雄一脚踢開的言辭却反而說明了英雄是一個必得加以估計的力量——或至少是說明他還沒有解脫掉這一難題。到此為止，斯賓塞告訴我們的話，充其量不過是說：在富蘭根斯坦^①的

① Frankenstein 是雪萊夫人所著《Frankenstein》小說里的人物。是一位生理學家，曾亲手製造一個怪物而賦以生命。後來，這個怪物竟至以怨報德，而加害于製造它的這位主人。——譯者

怪物能够杀人以前，必得先由富兰根斯坦亲手把它制造出来。但富兰根斯坦所亲手制造的只是这个怪物，至于后来这个怪物的头脑中怎样活动，却不是他所能创造的。我們若是說：“如果怪物杀了富兰根斯坦就等于是富兰根斯坦的自杀。”——这是难以說得通的。

斯宾塞对于生物学的兴趣使他理解到这一点：即伟人和其他人物之所以不同，不能单纯地化为社会机会上的不同。但当他面对面地来探討英雄理論时，他却又主张英雄人物仅只是“一长串复杂的因果联系中的一个結果——就是說：頗为复杂的层层因果联系产生了这个英雄人物所属的人种，以及这个人种在其中逐漸成长的社会环境。”根据这一理論（即把英雄人物看做种种因素的結果）斯宾塞又做了进一步的主张：千万不要因为某一个伟大人物似乎是某一决定性事变的原因，就把这一事变完全归属于这个伟人，我們宁可向那既产生了这一伟人又产生了这一事变的种种复杂条件的集合体当中去寻求那最后的解释（斯宾塞叫作“实在的”解释）。

把斯宾塞的主张化为最簡單的形式就是：不要以伟人来解释他的当时环境，或以当时环境来解释伟人，而宁可以当时以前的世界形势来做为解释伟人和当时环境这两方面的根据。在某种意义上，这个說法是頗为天真的。任何一个时期的世界形势都可以用与之紧相連接的前一时期的世界形势来加以解释。但就科学方法來說，这却不是什么有效的办法。正如威廉·詹姆士所給予斯宾塞的那个犀利的評語：这和用上帝意志来解释事件的发生没有什么不同。究竟麻雀儿是落下来，还是飞走了，都无妨說是上帝的意志所导致的结果。不管任何时期的历史局势是怎样的，或者有无伟人降生，都无妨把它看做前一时期世界局势的自然結果。

仅就历史的范围而論，斯宾塞是犯了：假定未決問題做为論据的〔邏輯謬誤〕。为了使这問題更加明确，我們把他的见解改作如下：假定用C代表任何英雄人物当时的文化环境，用P代表英雄本身的內在力量或潜力，用C₁代表历史上前期的文化环境，用P₁代表問題中这位英雄的祖先传袭下来的血統关系。那末，斯宾塞的主张可以

簡化为以下两点判断：(1)关于这位英雄人物的业绩或作用的任何問題都属于 $C+P$ 的問題；(2)任何时候， $C+P$ 都可以用 C_1+P_1 来解释。以上第二点判断显然缺乏邏輯根据。因为 $C+P$ 也許是 C_1+P_1+X 的結果。式中的 X 系指能发生历史影响的任何事件，但既不属于文化上的，也不属于生物学上的各种因素，如火灾、地震、疫病、或其他偶然事件。如果把这些偶然因素统统包括在斯宾塞所謂条件的集合体中，那末，他的见解正中詹姆士批判的攻击。他的全部主张不过等于說：今日由昨日产生，或者明日是今日发展出来的。在这当儿，斯宾塞不是犯了同語反复就是荒唐背理。

正是在上述的第一点判断上，斯宾塞犯了把未决問題当做論据的邏輯謬誤，因为他全盘否定了个性与文化之間的任何真正交互影响的可能（即 C 和 P 之間，或 C_1 和 P_1 之間）。在他早先所用的公式里，他曾断言：伟人是当时文化环境所造成的，而且认許伟人也能改造文化。可是在这里却又坚持要把伟人和他的文化环境放在一道，不过不是做为一个尚待分析的問題，而是做为要用早先的情境来加以解释的情境，而对于早先的情境也同样地不加分析。就这样把一个悬而未决的問題放过去了。但这問題是放不过去的。在我們的历史經驗里，它是每次都要露头的。

无疑地，那居于战略地位的伟人們也要受支配于种种压力。在这种种压力之下，他們有时畏縮不前而被压得粉碎；有时則安然穩渡而能够掌握它們。在解释某些发生重大影响的具体事变时，究竟是那领导人物还是那当时环境具有决定性作用——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問題。例如，德国納粹主义疯狂的反犹太运动对于納粹的欺騙世界和征服世界的国际性綱領不但沒有帮助反而是个阻碍——那末，这是否要由希特勒本人来負責呢？还是当时德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环境逼得希特勒不得不迫害犹太人呢？^①即使我們承认：除非先前已經有了张伯伦、斯托克尔(Stocker)和奥大利人卢格尔(Lueger)等等反犹太的早期“使徒”，希特勒是不可能把这种烧杀劫掠的癡狂变成一种国策的。可是为什么单单要把这样犹太人來当作牺牲品呢？

当时的确也还有其他集团，和犹太人一样无辜，而且在政治上更加活动，从而更适于做为这种牺牲品来达到希特勒的狡猾目的。没有反犹太运动作为陪衬的纳粹主义是我们可能想象的，纵使那还是一样的令人厌恶。

纳粹信仰的兴起，事实上确可追索到当时的社会条件。但逻辑上那并不意味着：纳粹的反犹太运动是由于这些或那些的社会条件而决非由于希特勒的歇斯底里的仇恨心理。德国纳粹主义的许多附和者们，起先还把反犹太运动做为一种偶然性或过渡性的事件来祈求加以避免——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仅仅把它当做一种吓人的堂皇大話，以便达到用威力取得有条件的投降而不致引起斗争。但这些附和者们既已把赌注押在希特勒身上，并在希特勒当政后都变成了自愿的人质，一旦希特勒表示出来对于犹太人问题的狂妄的不妥协态度，他们也只好乖乖地表示拥护和捍卫反犹太运动。一位忠实的斯宾塞信徒会叫我们相信：希特勒连同反犹太的迫害运动都能从十九世纪的德国文化状况以及从希特勒的世代祖先来加以预测。这个解释是不正确的，即令正确也是与此不相干的。

假如斯宾塞是在今天写书的话，无疑，他还会在那贪婪的拿破仑和那阴险的腓特烈之外，更以轻蔑的笔调来加上一个善性的希特勒，做为统治人物的另外一个例证来说明他们的生平事迹不足以解释当时的事变进程。这个见解很容易从斯宾塞的“综合哲学”的“第一原理”中推论出来，却不是从历史事实的批判研究中引导出来的。斯宾塞的这个单纯而不加任何限制的主张，用于拿破仑或腓特烈身上固然不正确，而用于希特勒身上也同样地不正确。例如，我们如想理

① 据1942年11月29日纽约时报记载：记者麦克唐纳(James G. Macdonald)谈：希特勒于1938年春季一次访问中对记者说：他(希特勒)打算“把反犹太运动做为支配世界的一个手段。”虽然希特勒的反犹太运动是唤醒世界舆论一致起而反对希特勒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希特勒希望他们暂时守中立的那些国家是如此。尽管如此，但希特勒还是一意孤行加强了对犹太人的迫害。除了几个原先就是他的同盟国而外，只有那受他军事力量镇压的附从国家才“采纳了”他的反犹太运动法令。

解：为什么拿破仑于 1812 年侵略俄国？（正如他自己后来宣布的，那是他生平最大的錯誤）或是如想理解：为什么他到达維尔那(Vilna)时，竟拒絕接受沙皇亚历山大的和議要求？而这种和議的結果是会把大陆封鎖的最后一个漏洞也加以堵塞起来的。即便拿破仑接受了和議，并且避免了由于侵俄失敗而发生的五百万法国部队的牺牲，欧洲的历史也可能还是一样的。（仅据初步印象而做出来的专题研究可以很容易导致相反的結論。）不过一旦承认了拿破仑的所做所为有可能和历史实录不同（而这正是事情的关键之点），那末，再来于事先否认拿破仑下决断的关键可能从拿破仑这个坏蛋的个性中来求得解释——便是地地道道的独断主义了。斯宾塞和黑格尔真正要使我们相信的不过是：不問是拿破仑还是其他的历史人物，在任何重要方面都不可能和历史不同的活动。这是一种足以导致历史宿命論的傾向。虽然他們还不愿明目张胆地来主张历史宿命論，并且有时也会加以反駁，但这种傾向却的确存在于他們的历史方法論的核心之中。正如一切其他的宿命論一样，那是找不到任何証据来加以支持的。但在与之相反的任何証据面前，竟还有人公然主张它。这种主张之所以不易駁倒，就因为它不冒任何具体預測的危險。它代表着历史研究中形而上学对于經驗方法的胜利。

第五章 社会决定論：正統派 馬克思主义

在最近时代里，能够給人以最深刻印象的社会决定論哲学体系，是由正統派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的。这一派的主要概念包含在恩格斯、普列汉諾夫、考茨基、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著作之中。这一派人的理論是否在所有重要方面都忠实于馬克思本人的意旨，它的历史意义并不重要。因为馬克思主义运动中占优势的理論传统就是由他們来奠定的。我們的解說和批判，目的并不在于广泛地无所不包，而是要集中地針对着这一派哲学对于历史上英雄活动的問題究竟怎样处理。

正統馬克思主义的主张所以能够給人以深刻印象，由于它具有两个特色，那也就是它所以別于黑格尔派和斯宾塞派的地方。对于后面这两派，进化論学說乃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原理，而且根据所主张的邏輯原則可以由此演繹出社会决定論的理論体系。而馬克思主义者则把决定論的理論建基于历史經驗之上，而且是方方正正地以此为其坚固的理論根据。他們把自己的主张（包括有关伟大人物的作用之种种結論）建筑在細致的历史研究的基础之上。而他們設想这种历史研究足以証实他們的基本假設：經濟生产方式，以及由此而发生的集团利益的冲突就是人类历史的决定性因素。他們认为黑格尔是神秘的，斯宾塞是折衷主义的，而只有馬克思主义本身才是科学的和一元論的。

人們很容易这样主张：正統派馬克思主义，渾身充滿了形而上学的因素，特别是当它乞灵于辯証的必然性和历史的不可避免性等等观念的时候，因而其可疑之处正不下于他們所要批判的其他见解。尽

管如此，但它是以大量的經驗材料做為推論基礎，而且對於我們理解過去的與現代的歷史給予了重大貢獻——這一點却是真的。就人類歷史的若干時期來說，也確是能夠合情合理地為他們的假設找出大量的証據。例如，封建制度的沒落，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各次大戰，以及英國、美國、法國和俄國的革命（二月革命）等等都是。作為一種幫助我們發現和探索的原理，歷史唯物主義確是擁有著豐富的果實，即使還顯然不夠完備。不少權威的歷史學家，儘管他們漠不關心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綱領（當其不是和它敵對的時候），但卻採納了歷史唯物主義，不過加以種種的修正罷了。

馬克思主義所以能夠給人以深刻印象，還由於它的第二特色，就是表面上也承認偉大人物在歷史上的作用。它既不否認偉大人物的存在，也不否認他們的歷史意義，並且還用這樣的語氣來應付各方面的批評：“當然，偉大人物是擁有著影響的，不過……”，即似乎是主張這一問題還有待於進一步研究似的。但使人失望的是他們這一認許卻和他們的基本理論互相抵觸——這一點下文還要說明。當他們對於歷史上偉大人物的業績給予適當的注意時，——例如對於他們自己的英雄人物如馬克思、列寧等——他們的歷史一元論就宣告破產了。當他們把亞歷山大、愷撒、克倫威爾、大彼得、拿破侖等等人物的歷史活動解釋做“社會壓力的聚合點”的表現，或僅僅做為階級利益的“工具”時，他們便往往放棄了自己的科學方法，而代之以神秘的先驗主義了，那是他們從黑格爾那兒繼承下來的一部分遺產。

既然恩格斯的著作是正統派馬克思主義當中這一論題的泉源，我們就先來討論他的見解吧。而馬恩的後繼者當中，沒有哪一位曾把這一學說加以發展以便給它增添若干新的內容或新的側重點，除了普列漢諾夫和托洛茨基可以算是例外。他二人對於他們這一派理論的虔誠雖然絲毫不減於其他諸人，但對於批評者所提出的辯難却比和他們并肩作戰的同志們更為敏感。關於普列漢諾夫的貢獻，我們將在討論了恩格斯的見解之後，再來加以討論；而有關托洛茨基的貢獻，則讓給後面一章。

依照恩格斯的看法，历史领域为一种必然性所支配，而这种必然性要通过人们日常经验中的大群偶然事件才能表现得出来。这种必然性，在根底上是一种经济必然性——而那是统治着整个宇宙的辩证必然性的一种特殊表现。历史既然受支配于一种经济必然性，而人类行为可能和它顺应，也可能和它相反；假如和它相反，那就注定了要失败，只有和它相适应时才能发生作用。社会经济的发展既以生产力的不断膨胀为其发动的泉源，它的进程是不会那么平滑的。而是要在两个矛盾面的对立和冲突当中向前发展：一面是生产力，另一面就是成为它的桎梏的生产关系（或者叫做所有权的基本法律形式）。

既然创造历史的是人，而不是毫无血肉的抽象体，因而拦在生产力之前而阻其继续膨胀的种种障碍也得由人来把它加以清除。这种清除工作越艰巨，则经验中感觉出来的变革的需要也就越大；变革的需要越大，则为了领导革命斗争而必然出现的人物也就越发显得伟大。思想方面的伟大人物，任务在于替人们筹画种种精神准备以便发动革命性的社会变革。虽然这种变革事实上已在进行，一般人还无从知晓。行动方面的伟大人物，任务在于组织阶级斗争，这些阶级由于革命的发生，有的获得利益，有的遭受损失。究竟谁是这个伟大人物，我们无从知晓；但如果为时势所需，则他迟早会要产生却是肯定不移的。他的特殊思想和行动怎样，我们也无法说明。但不管怎样，而其结果必将有助于生产力的解放，并且为它准备了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即各种社会关系的组成体）以应社会的需要，——这点却完全可以保证。用恩格斯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或好或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会出现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岛人做了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

个人，那末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这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即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現：如愷撒、奥古斯特、克伦威尔等等。（恩格斯致海·施塔尔根堡）^①

这个論点显然帶有种种困难，却竟能在那些以忠实于科学方法自豪的人們中間取得广泛的認可，这一点是难以解释的。恩格斯告訴我們：伟大人物是为了迎合社会需要而必然产生的，但我們究竟怎样知道社会对他确是有着一种需要呢？当然不会是在事变之后才知道的！因为那样就要陷于循环論証。而如果是在这个伟大人物出現以前，我們就能够認識到社会对他的需要，那末，就无妨說：面临着战争、革命、阶级斗争以及重大的社会问题的历史，对于伟人的需要总是会存在的——这样說决非言过其实。但我們究竟要到哪里去寻找他們呢？根据恩格斯的假設：伟大人物必然应社会需要而产生，那末，應該說他老是存在着。历史仍然属于經濟必然性的領域，但这种必然性的实现却又总得通过伟大人物。可是恩格斯却又认为：在历史舞台上，伟大人物的鞠躬送迎（譯者按即出現意）仅仅是百年一遇的事。

按照恩格斯的看法，社会需要不仅是伟大人物出現的必要条件，而且也是个充分条件。但他究竟怎样知道的：每当一个巨大而急切的社会需要存在时，便一定会有一个伟大人物出面来应付它？是誰和什么保証了这个幸运的事件？不是奥古斯丁和波緒亚的上天保佑，不是黑格尔的狡猾的理性，也不是斯宾塞的不可知者，而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間的辯証的矛盾作用。”

这种动力确乎是以一种非常引人注意的方式来发生作用的。但人們却不免怀疑：某个伟大人物所具有的种种特性，使他适逢其会地能够成就其伟大的，究竟是什么特殊的因果联系引导到他的〔父母双方〕的精虫和卵子結合在一起而使之产生出来的呢？假使一个伟大

^① 《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18頁。——譯者

人物既已降生，而又不幸夭亡，那末，在經濟生产上又須得有什么样的辯証程式好給他找到一个替身呢？在找到了替身以前又需要耽擱多久呢？而在還沒找到以前，那急切的社会需要和历史危机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它是否会采取殷勤恳切的态度来迎接这位替身的降临呢？恩格斯一方面在說：經濟矛盾的解决，那是历史上的必然，而另一方面又說：精虫和卵子的結合，那是历史上的偶然。那末，历史上的必然又是怎样把它自己轉变成成为生物学領域內的必然呢？也許有人会完全采取哈姆雷特向他父亲的阴魂呼喊的口吻說：“你干得真好，玄妙的老鼯鼠！你在土里能够干得这么快嗎？你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开路者！”或者还是恩格斯相信不管任何人都能够起来代替愷撒、奥古斯特和克伦威尔呢？

我們不妨選擇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来把恩格斯的論点加以考驗，并用具体的辞句来回答这些問題。假如我們这样提出来問：〔在那反法西斯战争发动的前夕〕为什么不曾降生一个伟大人物好来迎合时势的迫切需要把德国的一切反法西斯力量組成一个統一战綫呢？因为有了这个統一战綫，就能阻止希特勒的掌握政权（除非他不惜发动一个激烈而长期的內战），而且在某种条件下，也許就能解决当时的經濟困难。正是由于这种經濟困难，希特勒才得以把他的那班附和者和追随者号召起来的。誰能否认当时确有这种时势需要呢？誰又能否认当时在应付这种需要上的失敗呢？哪怕能找到一个替代的人也好！可是当时这样的人物竟然沒有降生，这是否說明：时势无此需要？抑或法西斯主义的胜利乃是不可避免的？如果答案是肯定前者，那末，为什么又会失敗？如果答案是肯定后者，那末，为什么又来反对这个“不可避免的”呢？即使是现在那些断定法西斯主义的胜利为不可避免的人，也还不得不承认：在許多不可避免的理由当中，确有一个乃是：当时沒有一位足够伟大的領袖人物起而动员千百万人一致反对法西斯主义。誠然，根据恩格斯的理論，只要稍加弯曲，我們便不难把希特勒描繪成为这样一个伟大人物，并說他就是由于辯証法的必然性而降生，以便起而应付时势需要的。对于这样一个結論，

恩格斯將只有大吃一驚。但是，除非他情願放棄他自己的論點，是很難拒絕用以導致這個結論的方法的。

威廉·詹姆士在1880年他所寫的著作中以嘲笑口吻質問斯賓塞說：假如莎士比亞不是於1564年4月26日降生在亞馮河邊的斯特拉得福，那末是否相信：社會的和經濟的各種力量綜錯聚合的結果將會使他降生他處？還有，假如莎士比亞不幸幼年夭折，是否一定會有另外一位母親在同時降生一個和他一模一樣的人物？他並且揶揄地繼續追問下去：還是會在波耳附近的斯特拉得福降生一個替身？十四年以後，恩格斯對於拿破侖以及其他偉大的歷史人物，在同樣問題上都做了肯定的答復。自然，在原則上，對於莎士比亞的問題，他也只有做肯定答復。他所堅持的唯一斟酌，只是這一替身可能較好或較壞，但決不會是完全相同的复制品。

最後，再提一句，我們就可以讓恩格斯去懸在關於他的論點的這個“歸謬法”上搖來擺去了。假如我們把所謂“社會需要”給予比較狹義的定義，那末，就很難說它真會在一切歷史時期都必然存在。這樣，我們也就很有理由來懷疑：是否某個偉大人物的降生，都會有一種社會需要為其必不可少的先兆？當底比斯和其他城市被亞歷山大蹂躪得幾乎成為廢墟時，這些城市的居民並不是一看到亞歷山大在城外出現，就會意識到什麼社會需要。群眾們很可能會感覺到他們的某種社會需要不是為英雄人物所滿足，反而是為他所破壞。他們也許是需要和平與社會主義，而他給他們的却是戰爭與獨裁——儘管那是以他們的某種“更深刻”需要為借口。他們也許是需要長壽百歲和幸福生活，而他偏偏要把他們一群群送入天堂——據說是為了拯救他們的靈魂。而當某種社會需要為一位卓越領袖人物的行動所迎合時，難道這種社會需要就不是這位領袖人物自己的早年業績所一手造成的嗎？〔解鈴還是系鈴人〕，也許要一個英雄人物起而解除他自己早年的惡作劇呢！

*

*

*

普列漢諾夫是他那一輩正統派馬克思主義者之中最有光輝成就

的哲学界智多星，这是这一派左右两翼的领袖人物——列宁和考茨基双方一致赠送给他的尊号。普列汉诺夫在他的许多著作当中讨论了历史上英雄人物问题。对于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而普列汉诺夫则是他们之中被公认的理论家首脑。说这个问题是尖锐的，这不仅是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来说，而且也是作为一个实践的或政治的问题来说的。俄国民粹派的政治纲领和哲学即以下面这种见解为其确定不移的基础：即历史能够受到伟大人物的影响，并且不问他是言论上的首倡者也好，或是业绩上的首创者也好，它的影响意义都非常重大。（业绩方面的人物影响更大）这个集团和它的公认继承者，即社会革命党排斥马克思主义有关决定论和社会进化论的见解。他们固然不否认物质因素（包括社会的和经济的）的影响，但却更加重视历史上人格的和道德的因素的决定作用。他们反对那种断然否定把个人恐怖作为抵抗压迫的一种策略的主张。他们要让居于战略地位的个人对社会上的灾祸和政治上的过激行为负责，而不是让产生个人的“制度”来负责。所以，不论是根据实践上或理论上的理由，普列汉诺夫总是和他们立于敌对地位。有关这一问题他所写的知名著作就是：《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①

在讨论过程当中，普列汉诺夫不仅排斥英雄史观一派的见解，而且也排斥那些决定论者的见解。他们和前一派正相反，而宣称个人是历史上不妨等闲视之的因素。普列汉诺夫认为双方都遗漏了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其为重大不仅是就马克思主义来说，而且也是就任何科学的历史研究来说。普列汉诺夫把他的学说作为一种“综合”而提出来，认为它是综合了以上两个单纯而矛盾的见解中的真理。他并且暗示：只有这种综合才是对于历史上个人作用的问题做了一个圆满而明确的解答。而这是基佐、米涅、梯耶里、莫诺(Monod)和兰浦瑞哈(Lamprecht)等等一切决定论者都无法解答的。他采用了圣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336—375页。

貝夫(St. Beuve)的若干論点来陪衬他的論辯——圣貝夫相信：在任何假定的時間，一个伟大人物意志上突然的决断会把历史进程重新加以决定。

我們將采用一系列的实例来檢驗一下普列汉諾夫的論点是否正确和前后一貫。而且为了使得問題的爭点更形尖銳，我們就照样采用了他所用的那一套实例。

1. 彭帕杜尔夫人(Pompadour)对于路易十五的影响是十分深重的。在七年战争时期，和奥国結成生死同盟也似乎是这位夫人的業績。这次战争中，法国的將軍們，尤其是苏俾茲(Soubise)屡次向她表示对于胜仗毫无把握，但彭帕杜尔夫人却一定要宠信他，以致給法国造成了悲慘結局。假如她不向大陆方向发动徒劳无益的战争，法国也許还能保持她的殖民地而不会受到英国的侵略。她为了个人的感情而向馬丽亚·特利莎(Maria Theresa)献媚，与奥国結成生死同盟，共其命运，因而不能发动一切力量来保卫法兰西帝国的主权。战争的失败以及丧失了最好的殖民地，对于法国后来的经济发展有着明确而重大的影响——这是普列汉諾夫所承认的。

2. 在同一战争时期，奥、俄两国的軍隊曾于斯垂根(Striegan)附近围困了腓特烈二世。当时，腓特烈的处境十分危急，只要对方輕易发动一次攻击，就会把他消灭。但由于俄国將軍布图林(Buturlin)失誤了戎机，随后又撤退了他所統率的部队，才使得腓特烈二世得以侥幸逃生。并且由于依利薩伯女皇的逝世，几个月以后，腓特烈得以挽回了他的命运。关于这个偶然事件，普列汉諾夫說：“但实际上我們却很可断言，只是由于布图林的优柔寡断才使腓特烈二世逃出了絕望的境地。如果当时被任为俄軍总司令的不是布图林而是苏沃洛夫，那末，普魯士的历史进程也許会成为另外一个样子。”而事实上俄軍統帥正是布图林而不是苏沃洛夫那样的人——这是历史上的偶然事件(他这样认为)。他承认七年战争中的种种偶然事件对于此后普魯士的历史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虽然他也断言：如果是在普魯士史上的另外一个发展阶段，它的影响将会完全两样。

3. 在法国革命时期，如果早亡的不是弥拉波（Mirabeau）而是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那末，当时的局势又会有什么变化？如果弥拉波果真不曾早亡，则立宪君主党掌握政权的时间可能更长些。但即便他还在人世，那也决抵抗不了共和主义的狂风巨浪。假如罗伯斯庇尔于1793年被杀的话，他的地位将为另一个人所代替。究竟这个代替者是好是坏，是长是短，我们无法预言。不过我们不妨说（普列汉诺夫向我们保证）：“事变进程将和罗伯斯庇尔在世时一模一样。”关于拿破仑也是如此。如果他被人打了一枪，就象他在都伦（Toulon）被围困时几乎遭到的命运，或者因得了坏血病而死亡，或者是象他于1795年在巴黎曾经打算过的，竟然自杀身死——不管怎样，“法兰西共和国毕竟还是会在当时各次战役中获得胜利的，因为法国兵士比当时欧洲其他国家兵士都要优良得不可比拟。”即使当时没有拿破仑，雾月18日政变的种种结果还是会发生出来的。如果不是拿破仑把他自己提名出来毅然佩带西哀耶斯（Sieyès）长老所铸的那柄用以镇压法国革命的“宝剑”，老天爷也会降生无数的别位将军来挥舞它。

普列汉诺夫在说明历史时，所举例证的一些细节，乃至他的历史判断是否正确，对于我们来说，都只有次等兴趣。而他所用的方法和论辩方式对于我们品评社会决定论的门道，则有着头等的重大意义。我们试来进一步考察他怎样处理问题中的历史偶然性。

1. 普列汉诺夫确凿地告诉我们：真正说起来路易十五朝代中法国军队的失败不应归罪于那位狐媚的彭帕杜尔夫人。失败老早已经决定于以下种种军事因素：如军队质量的恶化、军纪的废弛、将领的靠不住，而这些都来自那没落的贵族政治的残余作风：只顾享乐而不图事功。即便没有彭帕杜尔夫人，仅仅这些一般因素已经足够导致一场败仗。至于这位驰名的贵妇人玩弄嬖幸，并把不能胜任的苏俾兹将军置于统帅地位，那不过使得败坏的局势更加败坏罢了，不论是她还是另外一个人，都无法来挽救的。

所有这些已经足够简单明白，而普列汉诺夫却还要强调：彭帕杜

尔夫人并非以她自己的权势和名义来统治当时的法国王朝，而是要通过那位顺从她的意志的国王。但这位国王的性格显然不是必然地追随着当时法国经济发展的--般进程。即使是在同样的经济社会和历史局势之下，也很可能出现一位性格完全不同的国王，例如，是一个居家人，有妻室之累者，或者是一个女性憎恶者。不管是哪样吧，反正彭帕杜尔夫人都不再可能成为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即使她仍然置身于当时法国宫廷的话。普列汉诺夫的结论是说：假如我们承认有可能出现一位性格完全不同的国王；那末，由此推论，“这些暧昧的生理学上的因素”（即指导致一位好色的君主之降生，而不是一位心地纯洁或性欲比较淡薄的君主之降生的种种生理因素）“通过影响七年战争的进展和结果，也就从而能够影响到此后法国的发展前途。假如不是由于七年战争的结果夺去了她的大量殖民地，那是会完全不同的。”①

这也还是足够简单明白的，但却和上面所引他的论点刚刚相反。一个突然的大转弯，前面列举的军事因素已经不够当做战争失败的充足理由了。这些因素也许完全都还存在，而只要允许另一对配偶之子的降生，那末便能转败为胜，打败英国，保持了殖民地，并使以后的法国发展形势整个儿改观。〔我们由这些议论中所嗅到的〕，与其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气味，不如说是伍德的气味更浓厚些。在这里，普列汉诺夫也深深知道有些什么是须得加以解释的。他继续说道：“试问这个结论是否与社会发展规律的概念相抵触呢？不，丝毫不相抵触。个人的特性在上述场合发生过作用是没有疑问的；但这种作用只有在当时那种社会条件之下才能发生，也同样是沒有疑问的。”②

若是和普列汉诺夫（也包括其他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在内）原来想要加以论证的那种自命不凡的议论比较起来，这够多么垮台！当

① 参考《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358页改译。——译者

② 同上书，第358—359页。

然，任何一系列个人的特性或个人的怪癖，只有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才能发生那样的作用。如果换了另外一套完全不同的个人特性，以上所說是同样的正确。而他們的作用也同样要受到当时社会条件的限制。但是：它們的作用和路易十五的个性所发生的作用究竟是相同还是不相同？在一个段落里，普列汉諾夫告訴我們說：作用相同。在另外一个段落里，他却又說：作用不相同。而在第三个段落里，他又用下面的話来把其間的矛盾加以調和：不管是作用相同还是不相同，反正个人所发生的作用总得要受到社会条件的影响。

如果普列汉諾夫是主张：彭帕杜尔夫人的影响在当时的法国社会里是頗为自然的，也許他的理由反倒更加充足些。因为彭帕杜尔并非路易十五的头一位或末一位得宠的情妇，而路易十五也不是法国历史上喜欢宠信情妇让她得以掌握朝政的头一代或末一代国王。勿宁可說这种国王的情妇当政是从查理九世以来法国宫廷中一种頗为长久的制度。而法国资产阶级也决不会憎恨这种在他們自己圈子里并不陌生的制度。他們之所以反对仅仅是由于豢养着大群的嬖幸以及他們的远近亲属会增加租稅負担，尤其痛恨的是那班敢于干涉国家行政的任何嬖幸人物。我們只要看一看：彭帕杜尔夫人是怎样受她亲生母波亚孙夫人(Poisson)(她确乎是资产阶级出身)的鼓励，从幼年时代就已自认为国王将来的情妇——这一事实足够証明国王和他的嬖幸之間的关系是多么自然。由于她生得貌美，所以在她家族范围内，公开給她起了一个綽号叫作 *un morceau du roi* ——意思就是：“国王的口中食”，或“国王的一块肉”^①。但所有这些不过足以說明：路易十五可能受到掌权人情妇的影响，而不一定就是受到彭帕杜尔夫人的影响。也不一定要順着这位貴妇人爱好的方向而受其影响——她的爱好，就其身份来看，勿宁是非常聰明的。^②

普列汉諾夫所犯的方法論上的錯誤是重大的，而且也普遍影响到其他派系的历史哲学。但不管是普列汉諾夫也好，或者其他任何一位历史学家也好，都无法做这样象似有理的詭辯：就是說复杂的社会条件必然导致某人的种种特性的出现，而这些特性正是人們认为

足以“影响法国此后历史发展的”。充其量，人們所能主张的不过是某些个人的特性不可能影响到社会条件，而社会条件翻过来却可能阻碍或禁止历史上风云人物若干特性的发展。例如，一个白痴儿童不可能变成一个统治者，一个有着严重精神病的將軍不可能受到統率三軍的付托，一个好战的无神論者决不会变成一个天主教国家的总理，一个过于老实的人不可能获得一个外交官的地位，因为这个地位所需要的乃是一位善能纵横捭阖的塔力兰(Talleyrand)。尽管这样，统治者、政治家、外交家和革命領袖們还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全然不同的特性。而这些特性的不同組合就很可能对于当时的社会条件发生大不相同的历史影响。

普列汉諾夫的論点，就譬如說：小麦和毒菌所以和石头不同，是因为二者都能对于人身有机体发生影响，使它产生种种生理上的情况。話是很对的，因为并非任何东西都能影响人的身体。但在那些能影响到人身的东西当中，却有的給予它以营养，有的是以致其死命。同样，并非各种类型的个人都能影响当时的社会条件，而那些事实上发生影响的，必須是能够迎合这些社会条件的。但只要一旦承认个人能够影响历史发展，便不能再否认：在某些时候，不同的个人，通过他們的行动和思想上的不同会导致不同的历史发展。一个现代的阿甲克斯(Ajax)会被放在一个馬戏团里独占一个棚舍当作余兴来供人观赏；一位冉达克(John of Arc)，处在如今的科学昌明时代，当她闖入了总司令部里，造謠說什么听到了一些声音的話，会

① 參看：《彭帕杜尔夫人侍从女官奥塞夫人回忆录》符客特英譯本，1928年伦敦版，第8頁。

② 普列汉諾夫对于这位夫人全然沒有給予公正的品評。在她的血統关系中，她要算是一位不平凡的人物。假如不是象她那样聰明的話，对于国家大事也許会干涉得更少些。她除了裁決外交政策之外，还掌握大臣和將軍們的任免权。她解散了耶穌会，并把該会会员全部放逐国外——这是她唯一得人心的作为。创办了塞佛的武器工厂和軍事学校(后来拿破仑即在該校受訓)。援助和保获了伏尔泰、孟德斯鳩、克莱比福、梭內(她的私人医师)、狄德罗以及其他类似的天才人物。

被送入精神病人收容所来接受检查。他們都不会对事变发生什么影响。但是，依照普列汉諾夫自己的說明和认許，如果以苏沃洛夫代替布图林，以路易十八代替路易十五，以一位对于外交政策更加聪明，而不象彭帕杜尔夫人那样阴险可怕的妇人来代替彭帕杜尔夫人，則法兰西帝国的历史进程是会受到影响的^①。

2. 普列汉諾夫在这里耍的花招是当他最后重新陷入正統派的道路之前，先拿一种完全不同于恩格斯和其他正統派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理論来加以敷衍。他并没有肯定創造英雄的是他們所处的时势，也没有預言社会需要会使伟人产生。他并且不否认伟大人物，或甚至渺小人物都能够重新决定历史进程。他只是主张个人所能导致的变化，这变化发生的时间、地点和范围将决定于当时的經濟条件以及由于这些經濟条件而产生出来的阶级利益的交互作用。对于这样的主张，除了那神秘的极端主义者象卡莱尔之外，是不会有人加以反对的。不过許多的历史学家将会对于伟大人物的活动自由加以种种补充的限制罢了。假如普列汉諾夫是完全自觉而不是试图論証他的主张和經濟决定論的教条完全符合的話，他的独立思考是值得我們称贊的。就因为这种教条坚持否认在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会有任何真正选择的余地，并且以具有充分理由的姿态来強調：个人在任何时间都不能成为决定取舍的关键。

在討論腓特烈二世的命运时，普列汉諾夫又采用了一般的分析方法。是布图林挽救了腓特烈，免致他掉脑袋。要是苏沃洛夫就会把他消灭。但这两方面的作用都要取决于当时欧洲的社会經濟条件。尽管如此，他却又明白承认：如果三軍統帅不是布图林而是以苏沃洛夫来代替他，普魯士的历史是会完全不同的。事实上的三軍統帅

① 须知我們这里所討論的并非普列汉諾夫的例証是否合乎历史事实，而仅仅是他所用的方法。彭帕杜尔夫人对于法国历史的实际影响也許不如普列汉諾夫所信的那么大。但就他的思想的这一面而論，他必然相信：她是所謂一个反面的女英雄，而不仅仅是另外一位美丽、有头脑和具有野心的女人而已。

正是布图林而不是苏沃洛夫——这是一件偶然的事。因而，“由此推論，有时国家命运也会决定于偶然事件，我們无妨把它叫做次等的偶然事件”。^① 作为一个正統派的馬克思主义者竟然說出这样的話，真是勇敢极了！一个历史上的偶然事件并非沒有原因——普列汉諾夫也有看到这一点的功劳。正如庫尔諾(Cournot)老早指点出来的：这乃是两个系列或甚至更多于两个系列的事件綜錯变化的交叉点，而这些事件則又各自决定于本身的原因。从决定任何(或所有)系列事件的各种規律上来看，也无从預測出这个交叉点的所在。显然，誰要是严肃地承认历史上偶然事件的作用，誰就不是一个一元論者。但正統派馬克思主义却正是一元論的。因此，我們倒要看看普列汉諾夫究竟怎样摆脱这个矛盾——就是說怎样調和他所尊奉的理論教条和他对于历史的經驗研究之間的这个矛盾。

他在这里采用了移換問題的方法。偶然事件是要作数的——不管就表面上來說也好，还是就根底上来说也好。尽管如此，恩格斯所了解的历史决定論却是完全正确的。为什么？就为了偶然事件絲毫也不会妨碍历史的科学研究。我們姑且承认这一点，但人們却不免怀疑：这些偶然事件的不可预测是否在某些方面絲毫也不会妨碍历史的科学研究？而且即使我們承认了以上这一点，那又怎样来处理各种不同的历史理論之間的爭执呢？因为，偶然事件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障碍——这一点乃是任何一派历史理論的共同假設。而大家爭执的問題却是：在英雄决定論、历史唯物主义、气候条件变化論(亨丁頓 [Huntington])、心理决定論(麦克杜加尔 [McDougall]、塔尔德 [Tarde]、弗洛伊德 [Freud])等等的理論之間，究竟哪一派理論所設定的假設最能把有关社会和历史的现有知識加以一貫的系統化，并且最有把握来预测将来的历史事变的发展进程？或者，換句話說，姑且承认：历史領域是为种种規律所支配：那末，究竟是哪一种規律，或哪几种規律的組合使我們能够准确地(也就是說，能够达到

① 参考《普列汉諾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361頁改譯。——譯者

我們的研究主題所需要的那種準確程度)預測歷史的發展進程呢?普列漢諾夫在這裡相信他自己已經辯明了正統派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性,他舉出科學研究的可能性做為有力的證據。但科學解釋的可能是探求一切因果律以及任何規律的〔共同〕綱領。這綱領對於各種矛盾的科學解釋應該採取中立態度。而各種科學解釋則無不順從於證據的控制。

3. 如果說正統派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優點是:在一位天才(例如普列漢諾夫這樣的人)的手裡,便於用新的觀點來反復思考歷史資料;那末,它的缺點就是:把自己加以封鎖,拒絕對遺漏了的因素加以適當估價。正當我們想贊揚普列漢諾夫的革新精神,說他願意接受證據的指導時,他却再一次地墮落到經濟一元論的泥潭中去了。而這正是他在他的專題研究的討論當中曾加以全面駁斥的。他墮落的理由是因為錯把一種陳舊的方法論上的謬誤當作了正確的邏輯原理。而這種謬誤是在任何一派獨斷一元論者的著作當中隨時可以發現的。

普列漢諾夫指出:當時,彭帕杜爾夫人的罪惡影響,受到各方面的反對,但輿論力量卻不足以制服她。當時的法國社會不能執行對她的罪狀的宣判。為什麼?就因為法國的社會組織形式使得國君不受監督,不象英國那樣,錢袋口兒經常勒得緊緊的,就連皇室也无法插手。但為什麼正是這種組織形式存在於當時的法國呢?這就是由於各種社會力量之間的對比關係把它加以決定的。因而,他的結論是:“由此可見,社會力量的對比關係,也就是路易十五的性格及其情婦的癖性竟能對法國命運發生出這樣一種悲慘影響的根本原因。”

所有這些話似乎都足夠有理;但須是在下面這個問題沒有提出來以前:為什麼當時的法國,正好存在著那樣的社會力量對比關係呢?是什麼來決定的呢?而決定它的原因又是由什麼來決定的呢?我們既然要分析到最後,又為什麼停止在這裡呢?顯然,這個問題的辦法將會引出一連串無限多的和關係愈來愈疏遠的問題。而普列漢諾夫的做法卻是要武斷地停止在各種社會力量的對比關係上。到了

这里，他就不再向下追問了。但是各种社会力量对比关系却和彭帕杜尔夫人所以发生作用的特殊原因和結果——这一特殊問題并没有什么确定不移的关系。“可能有人要这样提出來問：难道当时的法国社会就絕對没有什么办法来消灭这位彭帕杜尔夫人嗎？譬如說利用那种并不陌生的暗杀手段。或者适逢其会地出现了这样一个才貌适足和她爭宠的海妖；这个海妖只是迷惑閨閣生活而不喜过問政治。①

但所有这些，若和普列汉諾夫的論辯所根据的主要假設来比較一下，就都显得是些瑣屑細節了。

他的主要假設乃是：一个事变的原因的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是这一事变本身的原因。把这話說得更加具体些就是：因为經濟生产方式是社会組織形式所以存在的原因，而当时法国的社会組織形式乃是无法制止宫廷宠幸干涉國家大事的原因，而这一点又是彭帕杜尔夫人所以敢于拒絕听从輿論的原因，而輿論的失教又是法国的历史所以发生悲慘結果的原因。从而，按照普列汉諾夫的邏輯，經濟生产方式乃是彭帕杜尔夫人給法国的历史造成了悲慘結局的原因。

普列汉諾夫的这个假設所以謬誤就因为他把最多只能看作这一事变的必要条件解释成这一事变的充分原因。当然，法国社会必得首先存在，然后任何一个人才有可能对它发生影响。当然，在某一个瞬間，法国社会的情况也必得正如它当时的面貌，然后，在下一个瞬間，任何一个人可能对它发生事实上确曾发生的特殊作用。但决

① 这两种办法似乎都不很困难。奥塞夫人在她的《回忆录》里叙述了彭帕杜尔夫人屡次遇刺的經過。她并且叙述了这位情妇怎样向一位知己女友勃兰朵夫人 (madame de Brancos) 坦白自己心情的奇聞。当时这位女友正在关于食物問題上給予她一些忠告。彭帕杜尔夫人說：“我常常因为担心不能得寵和穩住國王的心而苦惱。你應該知道，男人是喜欢某些葷几的；但不幸我的性情却是非常冷淡。我的意思是想采用某些刺激性的食物，好来补救我的这个缺点。而最近两天，这剂特效药确曾对我有些好处，至少我认为它是有些好处的。”引自《彭帕杜尔夫人侍从女官奥塞夫人回忆录》符客特英譯本 1928 年伦敦版第 52 頁。至于上文所說刺激性食品乃是“加配三种香草精，并調以龙脑、松露和糖菌等等香料的巧克力。”

不能由此推論：因为法国社会的存在和它所具有的那个情况，任何一个特殊人物必然会对它发生作用；或者是說：因为法国有着某种社会組織形式，事实上，对它发生作用的那个人物必然是好是坏，是有能为是愚蠢。普列汉諾夫的錯誤就是以下面这两个关键性的語句为其焦点：“为什么当时法国的命运竟会操在这样一个既无为社会服务的愿望，也无为社会服务的能力的妇人之手？这就因为当时法国社会的組織形式正是如此。”^① 这个“因为”完全缺乏邏輯根据。

普列汉諾夫的假設之所以謬誤还因为他忽略了他自己先前承认过的一件事，就是：在他所設定的因果系列当中，那最后一个事件，如果从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因果系列之中的某一事件来加以解释可能要更适当些。举个例子，就如：約翰斯密所以降生的原因在于他的父母，他的父母所以降生的原因在于他的祖父母，他的祖父母所以降生的原因在于他的曾祖父母——这些因果关系都是单就生物学的范围来說的。但約翰斯密被选充当某項官吏却應該归之于另外的一个因果系列(社会的因果系列)。而他和市府女秘书的私奔，那更加應該归之于其他的因果系列。现在，除非他的曾祖父母曾經存在的话，他是不可能降生的。但絕不可因此就把他所以降生的原因完全归于他曾祖父母的身上，即便他的生物学上的若干性格可以追索到他的曾祖父母来加以解释。除非他降生，他是不可能当选为官吏的，但他之所以当选还应从选举运动当中的政治原因来加以更适当的解释。除非他当选充任官吏，他不可能和那个市府女秘书相遇，但他俩的私奔却應該从他俩相遇以后的許多情况来加以圓滿的解释。普列汉諾夫則坚持要把他的曾祖父母，不仅作为他降生的原因，而且也作为他当选和他俩私奔的原因。

最后，普列汉諾夫的假設之所以謬誤还由于它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就是說有那玄一种“归根到底”或“根本的原因”——那是永远适当的，因而也是和任何特殊問題或上下文意全无連帶关系的。普列

① 参考《普列汉諾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360頁改譯。——譯者

汉諾夫既然相信“生产力的发展〔乃是〕历史事变的根本原因和最一般的原因，因而他觉得自己不得不用一种具体方式来表明：这个根本原因用来说明他勉力要想解释的问题本来就是非常适当的。但由于他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经验派的历史学家，因而也就不得不承认一个事件的切近的和决定的原因很可能与生产力和社会关系是风馬牛不相及的。可是他又必得忠实于他那套形而上学的教条，因而逼得他只好把正在研究当中的主题加以偷换，为的是想方设法来显示出引用这些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等等概念的似乎有理。因此，他就宣布：这些生产力和社会关系，“归根到底”乃是研究主题的“根本原因。”

这里用不着再来详细叙述普列汉諾夫在处理拿破仑问题时是怎样离开本题和彷徨不定，因为这和刚才所举的例子是属于同一类型的。普列汉諾夫向我们担保说，拿破仑在战场上所成就的战绩是其他的将军们也能赢得的。也许是这样吧。但这却很难抹煞以下的事实证据：即只要拿破仑每次把兵权付托给其他的统帅时，法国军队几乎总逃不了战败或调动不灵的命运。即就那次由莫斯科退却的经过来说，当时从维尔那(Vilna)行军不过两日的路程，而拿破仑竟错把他的军队交给了穆拉(Murat)和贝尔底埃(Berthier)，因此才造成了几乎全军覆没的惨败。普列汉諾夫为了不把他自己牵连到这些琐事中去，因而就假装对于拿破仑各次战役的纯军事结果不感兴趣。他告诉我们说：即使没有拿破仑的话，欧洲的历史本质上还会是相同的，因为生产力的不可制止的发展是从封建制度的桎梏当中爆发出来的。这就意味着：法国军队的胜败，就它们对于法国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影响来说，是比较地无关轻重的。

但这个含义却是无法加以证实的。普列汉諾夫自己也承认：随着法国的胜利入侵大陆而来的一系列政治变革，对于法国此后的发展给予了相当大的影响。假如波旁王室和教会，在雾月18日政变之后很快就恢复的话，一定不会轻易接受那些社会变革和财产没收等措施，而这些措施经过了一世代的执行已经取得了普遍的承认，到了路易十八恢复王位时，就已经习以为常了。试举拿破仑对于法国的

社会生活和經濟生活給予影响的一个方面來說，即使是恩格斯也不得不承认拿破仑的继承法曾經发生过非常大的作用。当时，长子继承法的废除以及对于遺囑处置财产自由的限制，使得小农所有制迅速发展以至很快地普及于全法国，并使得农业人口对于此后法国的生活情况給予了压倒优势的影响。人們往往引証这件事作为法律和政治对于經濟发展发生相互影响的实例。我們沒有理由来假設波旁王朝統治的提早复辟会导致采用一种精神实质上与拿破仑法典相类似的法典。但是，拿破仑法典連同法国革命的其他成就，只是經过了法国軍队的胜利以后，才对欧洲发生影响的。

因此，我們无妨假定：就問題中的历史时期來說，为了容許欧洲的生产力取得一次自由膨胀的机会，法国的軍事胜利是个必要条件。那末，这一軍事胜利是否不可避免的呢？如果是不可避免的，又是凭借什么力量呢？是否凭借法国生产力先前的发展情况呢？还是凭借拿破仑的軍事天才呢？普列汉諾夫沒有胆量来肯定前者。（譯者按：即指肯定凭借法国生产力先前的发展情况而取得軍事胜利。）但假如他的經濟一元論前后一貫的話，他势必做这样的肯定才行。他的論点可以还原为以下的这个信念：法国的軍事胜利对于她此后的經濟发展虽然是必要的，但拿破仑的軍事天才并不是法国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

那末，法国軍隊所以幸而造成那光榮的胜利紀錄到底是由于什么原因呢？依照普列汉諾夫自己的話：“法兰西共和国毕竟还是会在当时各次战争中获得胜利的，因为法国兵士比当时欧洲其他各国兵士都要优良得不可比拟。”^① 我們試来注意兩件事：第一，普列汉諾夫的解释还是軍事的，他並沒有主张法国士兵品质优良是法国生产力情况不可避免的结果。第二，这个同一无比优越的法国部队，当它的統帅是拿破仑时，就能够取得胜利，而每当統帅換了其他將領时，就一定会吃敗仗。足见当时各国軍事权威所以一致評判拿破仑是现

① 《普列汉諾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361頁。

代史上最大的軍事天才，这一点确有事实根据，决不仅是一种传说而已。

不管事实上我們对于拿破仑能够給予什么贊語，但普列汉諾夫却还是坚决相信：正如一切有天才的人一样，拿破仑也不过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天才的人物只能够影响到特殊事件的个别情况，但决不能影响事变的一般趋势，因为連“他們本身也还是这个一般趋势的产物。”这一点不仅就政治、战争以及社会关系来说，即就艺术、科学以及文学来说也是真的。因此，他下結論說：“即便在这里，归根到底，一切〔！〕都还是决定于社会发展进程和各种社会力量的对比关系。”①

普列汉諾夫是从教条到教条——由始至终地画了一个大圆圈——尽管此外他还以这个大圆圈的圆周为中軸，画了无数繞之而轉的小圆圈。

尽管社会决定論有着种种的缺点，但却給我們这个时代的种种思想类型留下了一笔永久的财产。在我們繼續向下討論之前，必須对这笔财产来加以适当評价。显然，只要学术研究还是自由的，而并非人云亦云千篇一律的話，那末，简单地把英雄人物贊頌为时势的創造者，早已不能再在今天这个时代占据任何学术上的地位。我們永远得把英雄人物联系到他的时代和他的种种問題上来加以考虑。但是否所有这些都得归功于社会决定論呢？还是，假如把它的种种极端說法加以淨化的話，則社会决定論的这笔财产将会是更加丰富而有用的呢？

① 参考《普列汉諾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369頁改譯。——譯者

第六章 英雄活动的框架

我們試來回顧一下社会决定論者的种种主张。凡是社会决定論者，不問属于唯心主义的，或者属于唯物主义的，似乎都曾建立了一个普遍性的概括：即一位伟人，除非到了时机成熟时，决不能影响历史。这和他們起初所要捍卫的論题比較起来，已离得很远了。因为，正如同成熟的果实，有的可能为园丁摘取，有的可能任其在枝上枯萎，时机的成熟也是一样，或者是白白地消磨掉而无所收获，或者可以被一位风云人物来加以利用。这些道理，就連卡莱尔也許都会同意，只不过他还要固执他的看法：今天时机的成熟乃是昨天的英雄人物活动的結果。

也許讀者們会私下議論道：这是把一个傲慢自大的主张降格为一种老生常談罢了。但当我们体会到这說法的涵意不仅要對英雄人物的活动加以明确限制，那末，就会明白这决不全是老生常談。它还提醒我們：为什么这些人物的活动能够迎合种种成熟条件的要求而获得成功。假如我們把它和卡莱尔的其他见解对比一下，就会更加清楚了。

就卡莱尔的一些語气來說，似乎他也同意社会决定論者的这一主张：英雄人物也得受他降生时代世界局势的限制。但即使就这点來說，他們之間也还有着不同。因为在卡莱尔的心目中，所謂当时世界局势的种种限制究竟具有什么性质是模糊不清的，而历史决定論者則至少对于这点十分了然。这些限制有的属于社会范围，有的属于政治和經濟范围。

和卡莱尔的这点模糊不清相照应的是他的另外一个观念：即天才者的能力并非固定不移，相反地，对于他所发现的世界却有着毫无

限制的創造性的适应力。卡萊尔說：“拿破仑的議論風生，舌鋒銳利，正如同他在奧斯特利茲諸戰役(Austerlitz battles)中所顯示的作戰本領不相上下。”并且又說：“英雄人物可能是先知者、詩人、國王或牧師，或者是适应于他降生當時的世界的任何一種人物。我坦白地承認：在我認為真正偉大人物的概念中，絕沒有一個這樣的人物不能是一切種類的人物的。”^①

社會決定論者對於天才或英才的特質則有着一種更冷靜的看法。他們認為社會條件對於天才來說並非老是任其所為，天才也許會被社會條件壓成粉碎。即使社會條件順利的話，也要對英雄人物活動的可能範圍加以種種限制。從社會傳統、風俗習慣、工具器材、技術、以及集團利益的衝突，這整個集合體上，我們不難推知這些限制是什麼。正是這些屬於文化方面的集合體，對於英雄人物的歷史發展和他們如何反應“成熟”的時勢條件給予了我們一些啟示。儘管它還沒有解釋天才所以存在的理由，卡萊尔可能會主張：如果牛頓降生在澳大利亞的原始社會的話，他也必然有些巨大的科學發現；拿破仑也可能降生成為一個偉大的蠻族酋長。反過來，普列漢諾夫以及其他社會決定論者則認識到了人是一種“有了文化的有機體”——我們姑且借用杜威愛用的一個措辭。人的智力不僅決定於他所具有的種種生物學上的機能，而且也決定於社會。因為正是社會給他建立起那個興趣和注意的框架。也只有在這個框架之內，他才能發生懷疑和進行探索。也正是社會供給他以所需的語言，而他頭腦中萌發的概念是要受到語言的限制，并由語言來給以鼓舞的。我們沒有什麼有力的理由來相信：那有着生物學上某種天賦的牛頓、拉斐爾或拿破仑，如果降生在史前期的話，他会重新發現用火，或者創制堂皇壯麗的裝飾品和繪畫，或者成為有聲望的戰士。

社會決定論者給現代思想界留下了一份豐富遺產，它的作用決

① 卡萊尔：《英雄、英雄崇拜和歷史上的英雄人物》，大眾出版社英文版，第312頁。

不限于使我们了解天才怎样受文化的种种限制，而且也使我们对于文化的各种不同表现之間相互发生的影响更加敏感，尽管他們荒謬地夸大了这种相互影响的范围。但其最大貢獻还是由于他們坚持历史具有决定趋势的看法，尽管其中帶着一些形而上学的神秘色彩，但的确体现着某种真理。

我們现在并不是要把社会决定論所帶的那一层形而上学的表膜来加以剝除，以便发现其中包含的真理内核，而是要把这一真理来独立地加以重述。

我們都晓得：在自然界和在历史上都是一样的——某些事件之間似乎有着比其他事件之間更为密切的联系。任何社会决定論者，只要他們一接触到具体事例，也会承认这一点。即使我們同意：在某种意义上，所有事件都是互相联系着的，但我們仍然不得不承认：有些事件似乎要比其他事件联系得更为紧密。人們常常把生物有机体指为有机体系的一个例証，它的各个部分是交互依賴着的。尽管如此，一个手指的丧失并不一定影响视觉，虽然視神經上的疾病可能影响到它。人体的許多部分或是机能可能发生变化，但未必显著地影响到人的思維能力。历史上事变的模式也是这样。我們都会相信：这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某些事变，例如說爱德华八世的浪漫婚姻对于大战的爆发并没有什么因果联系。没有人能够强辞夺理地做这样詭辯：正是爱德华的婚姻引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者是說：如果他抛弃了他的情妇而繼續做皇帝，大战就会打不起来。对于你所仰慕的英雄，不管他天赋着什么特性或气质，我們还是没有根据来相信：他能够预先阻止法西斯德国和民主英国之間的将近摊牌。这两个国家的摊牌，纵然字面上不能說是不可避免，但事实上却正在酝酿之中，或者用一句諺語，是正在“运筹謀画”之中。就因为双方面确乎有着某种重大的利害冲突，似乎迫使这些国家不得不加入战团。根据过去的观察：类似的利害冲突确曾导致西方国家发生战祸，不問它們的元首的个性如何。反之，如果这些利害冲突不存在的话，那就很少会发生什么大的战祸。社会决定論者之所以輕視个人在历史上所发生的显著作用，

正由于他們以这种形态的历史局势做为他們的着重点。而这一点确也有它的根据。

还有其他形态的历史局势,关于它們,我們不妨这样說也合理:当一系列的事件向前发展,最后演变成为一个巨大事变时——在这整个几事变过程的模式当中,虽然某一个人的活动确曾构成它的一部分,但即使这个人不存在的话,这一事件还是要发生的,不过不一定在同时罢了。例如,仅就对欧洲发展的影响來說,哥伦布是第一个发现美洲的。我們无不一致承认他所显示出来的勇敢和他在航海程途中所遭遇到的艰难困苦。尽管这样,大多数的历史学家还会毫不迟疑地承认:即使哥伦布的船中途沉沒,新世界还是一定会被发现的。而且,即使事实上沒有后来的亚美利哥·味斯蒲奇(Amerigo Vesputai)重新发现了新大陆,他們还是会坚持以上看过的。这犹由于:初期资本主义种种技术设备的扩张,对于东方市场更深一步开发的愿望,通至印度更近道路的寻求——哥伦布至死自信他确曾发现东亚——所有这些因素都使持有冒险进取心的航海家必然能够到达西半球,不过仅仅剩下了到达早晚的时间問題。历史纪录說明:整个儿那个时期特别具有进取和发现的特色。因而,在这里我們不妨又說:促成新世界发现的乃是欧洲的社会史和經濟史上存在着的种种“起決定作用的”趨勢,而那是和美洲土著印第安人的社会史和經濟史的情况有着鮮明对比的。哥伦布、味斯蒲奇、达伽馬、麦哲倫等人所造成的显赫功績都不是历史上的必然,而只有他們干的事业本身才是历史上的必然。在整个儿发展进程中,这些人物都仅是一些色彩鮮明的偶然事件——尽管他們有着什么样的天才,这个发展进程的结构还是不能用这些特殊人物的活动来加以說明的。就历史上的英雄作为事变性或事变創造性的人物这个意义來說,他們并不是这种英雄,因为对于那些与他們的姓名联結在一起的发现事业,这些个别人物并不是絕對必要的因素。②

上文所說的“起決定作用的趨勢”决不是什么迫使事变发生的、脫离了具体的人的各种力量(不管把它說为物理上的也好,还是帶有

神秘性的也好)。它們都可还原为生活于确定的历史条件和历史传统之下的许多个人所组成的集团的行为的范型。这就由于：这些人們对于当时环境的要求和胁迫所起的反应是充分类似的，足以讓我們来预测：面临着相似的要求和胁迫，他們将会怎样行动。当我们根据这些起决定作用的趋势来推测某一时期内事变如何轉化，或者是检查关于过去事件的某項判断是否正确时，我們的信心所根据的那个假设乃是：在試制某事可能发生或某事可能已然发生的图案时，不妨把琐屑細节的变化来加以忽略。社会决定論者的主张是认为历史上的一切英雄人物永远属于这类琐屑細节。而这一点却是錯誤的——我們已然把它揭露过。但是我們必須認識英雄人物有时确属琐屑細节之类的东西，而这种認識却是非常重要的，即使仅仅由于它可以使我們避免发生这样的幻想：即认为伟人或者領袖人物永远能够挽救一种失败局势，或者是把历史上的愚蠢行为所制造而积累起来的祸根加以排除。历史生活上的悲剧之一就是人們永远不能解脫一个本来可以不做的事件所遺留下来的种种后果。困难的問題就在于发现：英雄人物出现于历史，什么时候才是偶然的，什么时候才不是偶然的。

有一位具有真正的哲学眼光的美国戏剧作家写过一個剧本叫作《假如蒲斯(Booth)的行刺失敗了的話》。他写这剧本的构思是要用一种似乎有理的想象方式来得出这样一个結論：如果蒲斯行刺林肯确乎失敗了，总会有另外一个刺客不会失敗的。这位戏剧作家不过要

① 关于事变性和事变創造性的意义，可参看本书第九章。当然，确实还有另外一种意义的“英雄”。我們如果把这种意义上的“英雄”来称赞哥伦布，那是十分恰当的，即使我們承认：如果哥伦布在他的搖籃里夭亡，美洲还是会被发现的。例如，雅可布·布尔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虽然也承认：哥伦布并非对于发现美洲必不可少的人物，却还这样写道：“在远距离大陆的发现过程当中，只有哥伦布可算是伟大的，但其所以非常伟大，乃是因为他把他的生命和私愿完全賭在一桩理想事业上。而正是这个理想事业使他能够和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齐名。”参看《世界史研究》(«Weltgeschichtliche Betrachtungen»),《布尔克哈特全集》第7卷，德文版，第165頁。

用他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出这样一个意思：即是說：林肯的被刺并非不可避免，而只不过是以下这一事实的象征：即当时的南北战争使得北方的态度硬化到了无从取得进一步妥协的程度。历史上确乎有很好的证据来证实这一判断。处于当时四年激烈内战的背景之下，没有哪一位总统〔即使象和试图实现林肯政策的安德鲁·约翰逊(Andrew Johnson)完全不同的林肯本人〕能够抵得住当时居于胜利地位的许多州郡的愿望：即面对它们认为是造成一切灾难的祸首的南方，它们宁可加以严厉的对待，而不愿和它妥协调停。假如最终一幕的那天晚上，林肯因为得了感冒，呆在家里，之后还活着的话，他也决不会在约翰逊失败的那个事业上取得胜利。假如林肯企图改变急进共和党人劝他们深谋远虑走仁慈道路的意图竟告失败，并且经过一番毫无效果的努力而逝世的话，则后代子孙们对他的崇仰将会降低一格，仅和威尔逊一样。威尔逊的命运说明：由于领导了一次战争使之胜利结束而取得的威望，还不一定能够应付战后的重建问题。

从以上所说自然会得出如下结论：即只有当历史局势容许今后发展道路有重大选择的余地时，英雄人物的活动才会发生决定作用。正统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决定论者之所以否定英雄人物的活动能够对历史发生决定性影响往往是下面这个学说带来的必然结果：即现有的经济生产方式乃是决定它的上层建筑（即指文化）之唯一因素。依照他们的学说，从一种已知的经济制度只能发展出来一种（而且仅只一种）其他的经济制度。而在这样发展出来的经济制度的基础上，也只能繁荣起来一种（而且仅只一种）文化——所谓“文化”是指不属于经济范围的其他社会制度。即使在政治、艺术、宗教或哲学等领域之内，容许发生重大变化，分析到最后，那也还得以经济制度的发展过程为其据以解释的根据。而经济制度的发展则是由于它的内在矛盾力的推动。在这种观念支配之下，英雄人物只能到社会经济过程的所谓间隙之中（或接笋处）去寻找。英雄人物的出现和旧社会的消亡与新社会的产生毫无关系。

证据呢？至少只就伟大人物来说，除了普列汉诺夫和托洛茨基

的著作算是例外，他們甚至連提供証据的打算都沒有。关于普列汉諾夫，我們已經討論过了，现在輪到我們来談一談托洛茨基。他的撰著确乎有着显著的聪明技巧（尽管最后还是归于失敗），那对于历史的科学研究，可以說是一个永久的貢獻。关于这个题目明白无隱的論述见于他撰写的《俄国革命史》。

托洛茨基这本著作大意是說：俄国革命的发生、发展乃至达到高潮都是不可避免的。既然革命是为人們所創造的，他的問題之一就是研究一下：个别人物的个性和历史过程之間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很自然地，他所最为关心的就是居于战略地位（或領袖和权威地位）的个别人物的个性。他試圖表现：在决定性的历史活动上面显示出来的个性特征可以說是在“为社会条件的巨大力量所移植或更直接地强加在一个人身上的。”

在这里，他提出了一个簡短的实例做为証据。那就是描写尼古拉二世和他的皇后的个性以及他們怎样应付 1917 年 2 月里以他們为对象而爆发起来的革命情緒之高潮的。借助于宫廷侍从的日記和回忆录等資料，他把尼古拉二世的肖像作了这样的描繪（这是其他的历史分析家也认可的）：一个懦弱而沉默的人，当他的江山已經显然面临崩潰，却还整个儿浸沉在宫廷的日常瑣事之中，怀疑他自己身边的大臣，仇視諍諫的人。虽然是世界上最大国家的一位专制独裁的君主，却給每一个和他接触的人以一个完全无法挽救的印象。

然后，我們在这本书中又看到追溯回去对路易十六世和查理一世的形象作了描繪，这两位皇帝也都是面临革命危机的专制君主。尽管有些个夸大的地方，但托洛茨基确乎能够在这两位君主的个性的模式上，找到了一种可惊的类似点，特别是在那些終于使他們失去王位和生命的事变之中，他們如何应付时局所表现出来的一些事迹。甚至连馬利·安多涅特（Marie Antoinette）和亚历山大·斐多罗甫娜（Alexandra Feodorovna）两个人之間，在行动、語言和态度上也有着显然的类似之点。在这里，我們就遇到了具有伟大权威的重要人物，正是他們表演出来那似乎为他們安排好了的历史任务。

“一个反动的法国历史学家，关于路易的个性，曾經这样說：‘他不知道該抱怎样的希望——这就是他个性上的主要特征。’这些話可以同样地用来描写尼古拉：就因为他們两个人都不知怎样希望，而却知道怎样不抱希望。但是一个日暮途穷的历史上的失敗者最后的一个代表人物又真正能希望什么呢？他常常只是听別人讲话，面带微笑，而很少下什么断語。他的第一个口头禅往往是‘不’。这是描写的誰呢？还是这位加貝。^①但如果是这样，那末，尼古拉的面容簡直就是完全抄袭了。他們二人都是‘歪戴着王冠，冠簷几乎盖上了双目’——就以这样的姿态陷入深渊。但当你面临陷入深渊的危險而无可逃避时，睁开眼睛是否就会毕竟比較容易一些呢？”^②

托洛茨基是让人們注意这一事实：一个历史人物的个性不能仅从个人心理学家的见解来加以解釋。而他的性格、聰明和道德乃是他的天赋能力和社会条件之間不断相互影响的产物。在这一点上，他比普列汉諾夫具有更大的說服力。但这是否意味着：任何足以代替路易十六或尼古拉的国王或沙皇，都会有着一般无二的个性特征呢？托洛茨基还不敢这样輕率地加以肯定。他只不过承认：假如遗传性格上的历史偶然因素完全不同的話，則俄国革命将会是“一个极不相同的沙皇的創制品”。但历史結局还会是一样的。这个专制君主无论怎样也得垮台。即便是换上一个有为的沙皇，也决不可能长远地挽救这个局势。

这样就又轉移到了以下这个人皆熟悉的见解之上，就是說历史人物的个性只限于在比較不重要的变化上才有其意义，而历史过程的每一个重大发展都决定于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在这样的力量对比当中，英雄和伟人都成了一个无足輕重的因素，不妨把它忽略。历史上的事变越是巨大，积累起来的社会压力的解放越是强烈，則历史

① Capet，法国革命后給与路易十六世的徽号。——譯者。

②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1卷，麦克司·依斯特曼英譯本，1932年紐約西蒙·舍斯特尔公司版，第92頁。

人物的个性将会越发完全被扫除开去。托洛茨基以有力的和捉着要害的比喻，作了这样的結語：

“人們对于呵痒的反应将会是不同的，但对于赤紅的热鉄，則反应无不相同。正如一个蒸汽錘能把無論是方鉄或圓鉄压成了鋼板，在过分巨大而无可抵御的事变的打击之下，任何阻力都被压得粉碎，而个性之間的界限将完全消失。”①

托洛茨基給我們指明出来的就是：面临着某种历史局勢而被解放出来的各种其大无比的力量会把任何企图加以阻拦的人物一扫而光。至于这些力量是否單純属于社会的或經濟的范畴，还是都和民族的野心和沮丧，宗教信仰和政治野心等等因素交織在一起，那是无关重要的，只要我們承认：人物个性在其中并不占什么重要位置。

我們对于这个問題，試加以深思熟慮，便不难明白：托洛茨基的眼光尽管聰敏，但仅限于以下这种场合，它才能合乎实际：即当恐怖或希冀心理之爆发打动了千百万的群众，把他們号召起来反对那到昨天为止还是公认为权威象征的东西。也就是說：当时，沉淪在社会底层的各个阶级，他們的生存需要还没有得到滿足，而利害的冲突又那么尖銳，除非起来反抗那些掌权人物，攻垮他們的‘天賦’王权，問題就无法得到解决，而在位的人却又坚信他們的主权是由于神授，或是应享的社会权利。那时成为习惯的政治統治已經越来越显出它的愚昧和压制，那时馬上人物的道德說教在现实光耀之下响彻云霄——我們已然深深地感觉到社会不安的动蕩可能突然氾濫成为一场天翻地复的灾祸。我們能够說出是什么即将到来，我們也能够預见它的临近；纵然还不能指出是哪个特殊事件将引起它的爆发。換句話說，我們能够預測一场革命或一次战争的到来，但不能总是預言它的結局如何。那个結局有时可能决定于領袖人物的个性。

托洛茨基沒有看到这一点，而当他迟疑不决地瞥见了一些可能性时，也不知道究竟是應該放弃他的一元論的社会决定論，还是强把

①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93頁。

事实来加以牵强附会。他的方法所能解释的最多也不过是：一个旧制度的消亡，而不是代之而起的那个新制度；是一种旧文化的崩溃，而不是新文化的产生；是沙皇制度的衰亡，而不是克伦斯基的被推翻或布尔什维主义的兴起。这就好比是：当托洛茨基看到了一个老年人经过一阵愈来愈强烈的肌肉痉挛和衰弱的症状之后，断定他必然会死亡；却又把同样的情况做为是一个新生命必然降生的证据。不错，一切人都是会死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总是会有些人生存在人間。沙皇制度逃不了垮台的命运（这一点下文还要谈到）并不足以证明和这相距八千里的布尔什维主义胜利的必然性。

历史局势当中确实存在着可能加以选择的不同的发展道路乃是英雄人物的活动具有重大意义的前提。就我们的目标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了解是否存在这种可以加以选择的发展道路——以及它们的性质和期间如何。上文的论点使我们相信历史上确乎有着这种可以加以选择的发展道路，而且也正是这种可能导致相反结局的选择道路才有可能改变了已然发生的事变过程，或是有可能把今后的事变过程来重新加以决定。这个见解并不排斥科学的决定论者的种种假设，却是要反驳上文检查过的一元的有机的决定论。因为这个见解并不主张一切的选择道路都有可能实现。它承认这些可能性是受限制的，包括对于英雄活动的可能影响所加的限制，它所根据的就是承认社会行为的概括性的描述或社会规律。

根据已知的社会资料，我们有时能够预测究竟哪些道路是敞开着，哪些是关闭着，纵然我们还不能够确言要在这些敞开着的路之间怎样来加以选择。例如，希特勒当政以前的德国经济局势：失业的人数纪录早已增加到好几百万，而且从1928年到1932年之间还在逐年增加，便把当时可供选择的道路限制在以下两途之间：或者是为了社会福利而实践一种民主的计划经济的扩张政策（而这是当魏玛共和国时代就已见诸案卷的计划），或者是把全国的生产设备一举而转变成为全面战争的工具。这两条选择道路都是历史上有着可能的，并且不问选择哪条，都必然要深刻影响到此后德国乃至全欧洲的经济

经济发展，和引起多方面的社会影响。至于那种恢复德国初期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抽象理論上的可能性，則是历史上不可能实现的。因为等不到自由市场重新建立起来的时候，德国的群众老早就因饥饿而死亡了。

同时，根据我們对于德国經濟的已有了解，希特勒决策的胜利并非确定不移的結論。假如对于德国經濟还敞开着向外輸出的大門，假如不是她受了經濟危机那样严重的打击，希特勒的当政很可能早就失败了。但他之所以取得胜利，那不仅由于当时危机所造成的广大經濟灾难。在这里起着重要作用的，也还由于希特勒有着那种政治手腕来团結羽翼——从容克贵族、工业家直到那深受恐吓的中产阶級——和取得了兴登堡的支持。如果当时的德国能有一位善于团結左翼并且安撫中产阶級畏惧心理的人物，希特勒也許根本不会升任总理。

每当真正的選擇道路存在的时候，一个伟人的积极参預可能会发生决定性作用——这里只說可能会，因为此外还有其他因素插足进来决定道路選擇問題；而这些因素可能比个性因素在这上面具有更大的决定作用。

尽管我們的論旨在于主张(此点将见下文)^①：那具有事变創造性的人物对于历史阶段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但即在这里，我們也决不会放弃那有关因果联系的信心，或者是接受絕對偶然性的信念。我們所要断言的不过是：在这种局势之下，伟大人物的历史影响是个相对独立的因素——所謂独立是說独立于决定道路選擇的各种条件——而且在这时节，对于帮助我們来了解(或預測)究竟哪一个可能的道路竟会得到实现这一点上，其他一切有关因素都只具次要意义。在这种局势下，我們也就能夠說(而且能够提供这样說的事实根据)：如果那位伟大人物沒有降生的話，則事变进程在一切重要方面，以及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之下，都会完全改变方向。凡是否认：对于处在这种局势

① 參閱本書第十章。

下的伟大人物所起的历史作用應該給予这样評價的人，都得提供各种事实根据好來証明：事变进程在一切重要方面，以及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之下，都只有仍走老路。在上举任一场合，我們都得提供事实根据以便使人相信：如果某些人物沒有存在人間，或者，如果某些事件沒有演变出来，則历史紀錄将会是怎样怎样——这一点就足够說明：在历史的領域，正如在自然的領域一样，純粹的偶然性并非处于統治地位。历史上的偶然事件，无疑都是非常重要的，但只是（而且正是）因为并非所有事件都是偶然的，我們才有可能証明偶然事件之所以重要。

我們这一研究的整个答案恰恰决定于我們提出和解答以下这一問題是否合理（誠如每一个胜任的历史学家都得提出問題并作出答复那样）：如果这一事件沒有发生，或那位人物沒有降生，或那条道路沒有被選擇，則事情将会是怎样的。但这里却显得頗为奇怪，似乎人們都深深地厌恶严肃地对待历史上的“如果”問題。^① 这些“如果”問題往往被人当做“純粹的假設”而加以忽略，就好象只有非假設的問題才有意义这一点乃是自明之理。持这样看法的人似乎是抱这样的态度：将会怎样的就将会怎样，已經怎样的就已經怎样，我們完全用不着再向深处追求。不过在日常生活中却到处充滿了这样的口气，即似乎有意地追求或者是說明：假如某一已經实现的事件竟然沒有实现的話，事情又会是怎样的？如果有人問我們：“假如我沒有干扰你，你现在又将做什么呢？”我們总得回答他的。历史在这方面和日

① 严格的决定論者往往是把“如果”問題看作毫无意义而加以抛弃，而极端的非决定論者則承认它是有意义的，但又认为它是无用的。例如，法国的法哲学家都尔都隆(Tourtoulon)在討論历史上的可能性时，这样说：“如果有人問：假如某一特殊的假定事件竟然实现的話，或者是：假如某一现实的事件沒有实现的話，世界将会有什么变化？——这样提問題是絕對无用的。”他举出的理由是：在机会（或偶然性）的普遍統治之下，任何事情都是可能发生的。参閱《法律发展中的哲学》，1922年紐約英文版，第631頁。至于与此相反的见解，可参閱珂痕：《因果律及其在历史上的应用》，载《思想史杂志》（《Journal of History of Ideas》）第3卷，第12頁以下。

常經驗并没有什么不同，即使它有一些更崇高的題材时也是如此。

据说罗斯福总统每当紧急会议，应付不暇的时候，对于苦恼不堪的问题，往往是把它加以“试办”的标签而搁置在一边。但所谓“试办”的问题，正如其他任何问题，可能是明智的，也可能是不明智的，可能是适当的，也可能是不适当的。只要有人提出问题，不管他聪明也罢，愚笨也罢，我们总得给以回答，而不是仅只驳斥他提问题方式的不正确而不了了之。假如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1940年大选时，当选的总统是威尔基(Wilkie)而不是罗斯福，美国的外交政策将会是怎样的？要叫对方等待事变的演进来回答其是否相同，那不是是一个聪明的办法。

由于这一问题的性质和它的重要，以及人们对它采取的不同立场，值得我们深一层地来探讨一下“如果”问题在历史上的意义。

第七章 历史中的“如果”

几年以前出版了一本由斯魁尔(J. C. Squire)主編的有趣的书。这书包括若干篇著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所撰写的論文，內容是关于历史上若干重大事件可能演变的推测。^① 这书的立意是光輝的，如果發揮得当，或可对于历史进程的动力表现出多方面的見識。不幸作者的撰写方法非常使人失望。大部分文章仅只馳騁幻想，而并未能做到科学性的改写。主要的作者和文章內容有：葛达拉(Guedalla)——如果摩尔人在西班牙获胜，事情将会怎样？；斐歇尔(H. A. L. Fisher)——《如果拿破仑逃到了美洲》；哲斯脫敦(G. K. Chesterton)——奥地利的唐·約翰(Don John)和苏格兰的馬丽女皇的婚姻問題；尼科尔孙(Nicholson)——論拜伦如果做了希腊皇帝；柏洛克(Belloc)——論路易十六如果逃出了革命的巴黎；范·隆(Van Loon)——論荷兰如果繼續統治亚姆斯特丹；温斯敦·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如果李(Lee)在葛的斯堡(Gettysburg)获胜，結果将会怎样？

对于这类問題，究竟要在什么情况之下，我們才能得到科学上真正可靠的答案，而不是仅仅幻想上认为可靠的答案？为了解答这个問題，我們將于下文对一系列的假設情况加以考虑，因为我們相信根据这些假設，就能够得到可靠的結果。然后，再来考量一下：上举作家的文章布局作法——他們同意提出“如果”問題的合理，但显然只是作为一种幻想的练习；它的根据不是历史事实，而是类乎一篇文笔巧妙的故事所表演出来的看似有理的虚构。不过在这以前，我們还得討論一下那些否定“如果”問題的提出具有科学意义的論点。

^① 《假如我們的历史經過重写》，1931年紐約英文版。

某些历史哲学家主张历史事变的模式有如一个錯綜复杂的交叉结构,是由专门术语叫做“具有内在关系”的事件构成的。不过所有的实践历史学家没有一个贊成这样主张的。如果甲事件的发生必然导致乙事件的继起;或者反过来,乙事件的发生必然导致甲事件的继起,这甲乙两个事件就是具有“内在的关系”。結果,这一事件如果发生任何变化必然引起那一事件随之发生变化。如果甲事件不发生,乙事件也一定不可能发生,或者:乙事件发生,则甲事件也一定不可能不发生——那末,甲乙两个事件就是具有必然的关系。扼要地说,这甲乙两个事件在邏輯上互相蘊涵。现在,如果所有的事件之間,都有着这样相互蘊涵的关系,則只要我們一旦假設任何事件发生了和事实不同的变化——或甚至它的一个單純的細节发生了不同的变化——那末,任何其他事件也得跟着发生不同的变化。但在这个假定之下,每当我们提出“如果”問題时,再也不能明智地說出事情将会发生什么变化了,就因为任何事情都有发生的可能。这样一来,我們就再也不能凭借过去观察到的其他情况下曾經发生过的关系来預測今后也将随着发生什么事情了。因为一旦我們設定了一个与事实相反的假設,則这些关系本身早已自发地发生变化了。从这个观点来看,一切情况或事件都是相互依存的——也就是說:都是某一总情况或某一巨大事件的一个部分。而一个与事实相反的假設,是不能够摆脱掉自身矛盾来加以陈述的。而它既是一个自身矛盾的陈述,那末,任何事情,不管帶着怎样的幻想色彩,也都能和它連結起来。

这种历史哲学乃是一种形而上学世界观的一个特殊的应用。某些派别的神学决定論者偶尔会暴露出这种思想来,但更加清楚明白地把它发展起来的是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以及它的变种。它的基本假設即:一切事物必然是互相包含着的;从而,任何一个真的判断蘊涵着其他一切真的判断的全体——这是从来没有能始終一貫地發揮出来,也是绝对无法确立的。誠然,为什么任何两个历史陈述,譬如“威灵敦在滑铁卢打仗”(事实上这是真实的)和“黄金不是在加尔佛尼亚发现的”(事实上这是虛妄的)結合在一起,就一定不会产生矛盾?或者,

能有人严肃地相信：如果我的狗不叫“追踪者”而叫“老虎”的话，世界上任何其他事情都必然要受它的影响吗？详细地来批判关于这种封闭式的宇宙之形而上学理论，这里不是适当的处所。而对我们的目的来说它在历史上发生过的种种后果即已充分暴露出它的弱点了。因为它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历史上不存在客观的种种可能性——未来已经是现实的，只是还没有产生出来，人类的努力或不努力都是事有“前定”，理智从来不能丝毫改变历史的演变过程，而是“只有当夜幕拉下来的时候，米奈娃(Minerva)的猫头鹰才开始飞翔。”(黑格尔语)

历史事件之间相互关系的程度是个经验问题。当我们断言某些事件之间有着特殊的相关，那意味着：它们都是证实一些经验规律的一些实例，而这些经验规律的职能只不过做为我们所研究的特殊问题的若干假设。检验相关的范围或者规律的确实性的一个办法就是提出一个有关的“如果”问题来。当这个“如果”问题的答案告诉我们：即使问题中的某个特殊事件没有发生的话，事态的进程本质上将仍然和以前一样，那末，我们便无妨下结论说：在这一特殊事件和它出现于其中的那个群集之间没有什么非此不可的联系。例如，如果1928年当选总统的是斯密司(Alfred E. Smith)而不是胡佛，那末，在这位总统任职期间的美国经济情形将会是怎样的？这时，我们便能不必顾虑任何矛盾而坦然回答说：那是和胡佛当选以后的情况毫无二致的。这就因为：经济循环的各个方面并非决定于总统的政策。我们甚至可以这样地说：不管是谁住在白宫，1929年的经济危机和它的种种后果将会在任何可能上都和事实的经过大体相同。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在1933年到1938年间，假如由于某种机会，不是罗斯福而是约翰·南斯·嘉纳(John Nance Garner)出任总统的话，则与新政连带而来的社会福利立法以及对商业上的种种限制措施（它的作用是制止了相对地不受统制的巨大企业的发展）是否还会被采用？那末，我们就没有理由相信：在任何事情上这些措施还会完整无缺地被采用的。不过，这时我们也不难正确地断言：由于没能采取一系列的挽救性的经济措施，因而给本国

土生土长的法西斯情緒和运动造成了非常有利的发展机会，使得象休·朗(Huey Long)这样的人也能乘机把它当做巨大的政治資本。有时最須估計到的是时势，有时則是人。如在1929年，罗斯福将会和胡佛一样毫无办法。但在1933年，他却有了他的机会。罗斯福之所以放弃1932年的竞选綱領是因为当时时势給了他以活动的自由，正如威尔基如果当选，也将放弃1940年的竞选綱領，則因为当时时势沒有給他以活动的自由。

* * *

特魯埃(Drouet)公民是一个老实的法国乡下人，当他駕駛着双輪馬車越过发梭(Varennnes)桥附近的拱門时，粉碎了路易十六企图逃出巴黎的阴謀。当他的仪式馬車被阻停下来时，这位国王眼看着安全已沒有問題了。柏洛克提出了这样的問題：如果特魯埃的馬車耽擱住了而这位国王竟得逃脫，事情又会是怎样呢？他高兴地給予了这样的回答：欧洲的全部历史都将因而改变，最后到我們自己这个时期会形成一个“基督教国的黄金时代”。尽管貝劳克是为了反对宗教改革以后的欧洲，抱着长期的热烈复仇情緒而涉猎历史的，但这样一个判断还是缺乏清醒头脑的。他达到这个結論是从一个毫无根据的假設中引申出来的：即是說，如果路易十六竟得逃脫，这位国王将能鎮压了革命的武装，解除了拿破仑的兵权，阻擋了工业革命的种种后果，从而不仅改变了資本主义制度的斑斑点点，而是改变了資本主义发生作用的整个方式。他哀悼地說：“正是特魯埃的双輪馬車搞出来的詭計！”由于“这辆馬車而皇室淪落，革命得逞，以致于现代世界的机械化的发展和社会不安都由此而变为可能。”但好几个世代的历史学家所纂輯起来的〔历史〕証据，却以其全部力量来反証：无论是特魯埃，还是路易十六对于十八世紀末期的欧洲工业扩张以及它的多方面的社会影响都是螳臂当車无能为力的。柏洛克竟把历史上两个并无影响的枢要，一个皇室的和一个平民的，錯认为具有密切的历史内在关系，而把它过份地加以夸大了。

* * *

一个更适合当做话题的“如果”问题就是：当拿破仑准备渡过英格蘭海峡进击英国而正在悬而未决的情况。假如有那么一天，英国的舰队因风息而停驶，拿破仑正好乘机以汽輪渡过海峡而实现了他侵略英国的未圓好梦，事情又会是怎样的？这样，拿破仑是否就能免于滑铁卢之败？而英国是否会变成法国的一省？

以下从两封信札中的摘录証明：拿破仑的新式舰队渡越海峡的可能性并不是牵强附会近情理，而是千鈞一发地系于一种官僚主义的官样文章上的事。第一个文件是汽輪发明家罗伯·富尔頓（Robert Fulton）給拿破仑的信。信上說：“我能够扫除您的敌人用以保卫自己的两个障碍物——巨风和暴风雨——不用把他們的舰队放在眼里。无论何时都能从从容容地把您的军队在几小时之内运到敌人的領土上。”第二个文件是1804年7月21日拿破仑給他的內政部长的手令。日期是重要的，因为它足以說明：在那些年月里，拿破仑正有机会来利用富尔頓的发明为他自己服务。信中这样說：“我刚刚看过了工程师富尔頓呈給我的建議，这是个能够改变整个世界局势的文件，你送得太迟了。赶快把它交付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加以討論。”^①

让我们假定富尔頓的发明并没有搁置在委员会里而竟得到实现，法国果真装备起来一支以蒸汽为动力的舰队，拿破仑的军队得以渡越海峡。那末，他的侵略计划果然能够成功嗎？不管我们的答案怎样，那总得根据一些由双方局势的对比而建立起来的军事上作战的原理或规律。既然任何军队都得仰仗它的輜重、給养、和补充来生活，拿破仑就得耗尽他的一切財力来維持他的运输路綫。而只要英国舰队还存在的話，那将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绝对沒有把握来操纵那海上的风暴，好让英国舰队永远停駛在那里，以便輕而易举地加以破坏。当他有机会能够装备起来一支以蒸汽力推动的作战舰队，而

^① 两个文件的摘要引自卡罗拉·奧門：《拿破仑在海峡》，1942年紐約英女版，第155頁。

他的敌人，那个拥有更大的造船业和工业后备力的英国，至少也能够和他并驾齐驱。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断言：即使拿破仑能够在英格兰登陆的话，那也离胜利还相距十万八千里。当然，如果他只能倚靠他的帆船来抵达英国海岸，这个结论就将更无疑义。

最著名的一个“如果”问题，是由德国的历史学家爱德华·迈耶（Eduard Meyer）最初提出来的。德国的另外一位历史学家麦克斯·韦伯（Max Weber）就把它当做一个关键性的例证来讨论历史上的“客观可能性”。这问题就是：如果在馬拉敦（Marathon）、薩拉密斯（Salamis）和普拉梯亚（Platea）等等战役之中，波斯人竟得胜利，以后的欧洲历史又会是怎样的？迈耶很有理由地主张：希腊的政治史和种种文化价值以及欧洲的整个儿文明都将因此而与历史上传袭下来的完全不同。既然阿凱美尼（Achaemenian）帝国的既定不移的政策是要把它的专制独裁和宗教统治强加之于在它军队镇压下的整个土地，则希腊城邦，附带着它的自治传统和有限的民主制度都将在一切可能上从欧洲绝迹。那随同波斯人奴役恐怖的解除而来的希腊文明的大繁荣也将在其萌芽状态下很快地夭折。

大多数（但并非所有）的古代历史学家同意这个看法。詹姆士·布里斯德（James Breasted）在这一点上是追随着迈耶的，但英国历史学家斐歇尔却相信波斯人的胜利并不能损害真正的希腊传统，而这这是由于大流士（Darius）和泽尔士（Xerxes）准备利用希腊的叛徒来充当傀儡统治者。而在这些傀儡统治之下，希腊文化的卓越传统是会得保存下来的。

但以上这种见解却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并非所有的希腊人都效忠于希腊城邦，正如并非所有的法国人都接受法国大革命的遗产一样。有些希腊人却宁愿接受波斯专制政府下的安居乐业，而不喜欢希腊民主政治的扰攘不宁。还有，斐歇尔没有注意到波斯人镇压革命的爱奥尼亚诸城（以及一切敢于援助它的）所用的那些严刑峻法。如果波斯人的侵入冲破了希腊的防御线，则希腊的其他城邦也

将陷于同一命运。

迈耶所预料到的那种可能性是颇为可信和颇有可能的，因为他的设想是以阿凯美尼帝国的既定军事政策和政治政策为根据，并有一系列的其他历史事迹做为证明。当然，说这些政策都会保持不变只是一个假设。但我们确乎没有什么理由来相信：一个胜利的泽尔士竟会放弃这种政策，而勿宁有充分理由来相信：这种政策如果加强只会使波斯人的统治更加巩固。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根据来假定某种决定性的关系在任何历史局势下都是个相对不变，我们便不能在幻想和科学的重新构想之间划上一条显明界线。

就因为抹煞了幻想与科学的重新构想之间的这个界限，温斯敦·丘吉尔所写的那本假想美国历史上南部同盟一方在葛的斯堡获胜的故事，尽管说得很好，但在每个关键性的情节上却都搞得很糟。他这篇故事设想北方在葛的斯堡吃败仗会造成什么结果，其中几个高潮之点就是：(1)北方打败仗，在现在的合众国领土上建立起两个和平共处的国家；(2)紧跟着南方在葛的斯堡的获胜，李宣布解放黑奴，这便得北方愿意接受和平的调解，并且导致了英格兰和南方的联盟；(3)正当1905年左右危机发生的时节，组成了一个英语的联合国，即由英国、北方和南方三方面共同组织起来的“重建合众国”——这是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的大团结，每一方都是这个共同体的一部分，或同一份财产的继承者；(4)由于这个英语联邦宣布对于外来侵略的共同御侮，因而使得1914年的萨拉也沃（Sarajevo）事件得以和平解决。

1. 对于北方来说，葛的斯堡的败仗所导致的军事后果决不是一败涂地而是战事拖长。这就因为，北方的工业后备，它的压倒优势的人口，它对于海权的控制——更不必说维克斯堡的陷落使得北方能够控制整个密士失必河流域——所有这些早已注定了南方的终归败绩。至于华盛顿的被攻下以及它所加于北方各郡的威胁，那不过是使得这些区域的人民增强了团结情绪，更加勇敢地达成作战任务。甚至，这会使得林肯一变而成为急进的共和党。我们同意丘吉尔所说：

“一旦获得一次大胜仗……一连串的结果会随之而来，形势就如不可遏止。”但是南方的一次胜仗并不足以造成一连串的因果鏈环最后导致北方的失败。假使几次胜仗就足以保证南方在内战中获得最后胜利，那末，南方早已就打胜了，因为在大多数战役中都是南方占据优势，有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德意志帝国的军队一样。如果想象中北方几次败仗所招致的悲惨结局，果真严重到了成为最后战败的序幕，那末，今天就不会有不列颠帝国了。

2. 說南部同盟軍于葛的斯堡获胜之后，李氏将会宣布解放黑奴，这簡直是一位戏剧性的历史家的狂想。有好几次胜利的战役提醒他可以这样做，但他始終沒有这样做，就因为解放黑奴将使种植园经济为之破坏，而南方各州正是为了维护种植园才作战的。如果南方在葛的斯堡获胜，英格兰出面来积极干涉这件事似乎不大可能。至于劳动人民所关切的，他們的同情完全寄于北方一边。就掌握在統治阶级手中的外交政策可以不受这种情绪影响的范围内說，当时的外交策略路綫乃是：打击一方、拉攏一方以便削弱双方以謀漁人之利——不仅南北战争是如此，就是大陆上的每次战争也是一样。

3. 相信 1905 年时，北方的合众国和南方的同盟国——这两个在许多方面利害冲突、互相忌妒的主权国家，会放弃各自的主权而和第三国（即那至少被其中的一方看做世仇的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結成联盟——这与其說是出于一位历史学家的見識和學問，勿宁說是丘吉尔氏高尚的希冀和渴望。在人类历史上这是沒有先例的。它的失败或者更符合历史实录。誠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不可分割的合众国和大不列颠結成联盟或者更要容易些，因为那时这两方是比较接近的战时同盟。但在丘吉尔撰写那篇文章以前，事实上既毫无朕兆，也沒有人公开倡議过，或甚至是暗示过。不过，根据他这篇文章，我們必得把他算做这个新联盟綱領的最初发起人，尽管是間接的发起者。

說一件事在人类历史上沒有先例，那不一定是否认它的可能出現。否定了这一点，历史将成为不可能的事。不过这样一个事件的

可能发生却决定于足以促使它发生的时势如何。丘吉尔的故事所设想的那个联盟似乎没有可能，就因为无论是凭借一般的历史常識，或根据人类活动或利害关系来考虑，当时都没有促使它发生的条件。它乃是做为一个設計藍图的暗示提出来的。就因为目前的局势在这些方面已和当时有所不同，所以，他的理想纵使还没有見諸实际，但我們不妨把它看做一个历史上的可能。

4. 假如有一个英語系統的联盟国把它的最后通牒送达欧洲大陆的話，則第一次世界大战也許不会在1914年8月間爆发——这一点毫无疑問。事实也确乎使人相信：当德国的最高司令部准备扫蕩法、俄两国时，它是估計在这期間內英美一定守中立。不过即使1914年的大战危机得以和平解决，要想完全遏止一个早有准备的战争在此后数年中爆发的可能，其所需条件决不仅是英美两国的行动問題。此外还得具备如下种种条件：巴尔干問題的彻底解决，一切具有利害关系的国家同意柏林-巴格达鉄路的存在和共同管理，世界資源和殖民地市场的重新分配，德国海軍恢复俾士麦的海軍政策，以及相当範圍內的普遍裁軍——还不必說，几个强国的国内資本主义經濟的重大变革。事实上这些必要条件似乎毫无可能实现的形迹。

* * *

历史学家关于历史的想象上的重新构想常常具有的缺点之一就是把面向着未来的推想綫索拉得太远。他們不滿足于把既定情况的重新构想限于一段有限的期間之內，以便能比較清楚地看到可供选择的道路之繼續出現，而反把他們思索中的进程拖得无限地远。因而他們就忽略了以下这一点——即随着愈来愈多的因素在故事中的出現，那可供选择的各種道路出現的可能性也就愈来愈增多，愈来愈复杂。假如限于几年之內的历史重新构想具有冒險性的話，那末，拖长到百年期間的重新构想，其冒險性将不止大了十倍。下面列举的实例可以使得这点更加清楚。

假如在独立战争中，魁北克因美軍的攻击而淪陷，我們便能比較可靠地推測战事的結束会比事实更早，而本尼狄克特·亚諾尔

(Benedict Arnold) 或可避免成为叛徒的命运。这是一个比較可靠的預測，但并不因為我們假定了对于战事演变和个人(譬如亚諾尔)的行动所作的某些概括是正确的，这預測就有必然性。固然我們有权根据过去經驗中引申出来的各种规律来做这样的概括，但在邏輯上我們却不能担保这些概括一定会繼續有效。而且也难保某些新的而且完全料不到的情况不会露面致使战事拖长和亚諾尔成为叛徒。另一方面，我們也是在假設：随着魁北克的陷落而来的那一系列事变不会受到其他系列事变中发生的事件之干扰。但不同事变的各个系列确是有着交叉互扰的可能，那也就是我們的判断虽然有着几分可靠的根据，却不一定十分准确的理由。我們也还能預言：假如魁北克陷落，則那拥有大量法籍移民的加拿大各州(这些法籍移民只是最近才归入英籍)在战争結束时，也許不会对于与美国合并的問題提出了不可調和的反对意见。不过在这里，从其他系列的事变而来的干扰因素就会更多，可能受到其他事变影响的期間也会拖得更长。但如果有人想来推測：加拿大与美国的假想合并对于降至二十世紀的美国經濟和政治究竟会发生什么影响？那他的結論就将非常不可靠，纵然不一定完全是幻想。他是把可能发生互相影响的若干系列的事变看做相对孤立的，而單純設想出一条事变发展的路綫。但如果我們根据其他历史知識便不难看出事变的系列是互相交叉錯綜着的。往往我們假想的历史路綫会在許多点上被无数其他的事变系列所切斷。

假如沒有宗教改革，我們便可准确地来推測：历史上也就不会有后来种种反对宗教改革的举动。也就是說，十七世紀当中所发生的許多事变就不会再发生了。这是足够真实的。但假如沒有宗教改革的話，我們目前是否就会享受着一种世界宗教之下的寬容，这种世界宗教有着思想自由的教皇，把那神圣的聖經历史都解释做启发道德的故事——正如桑塔亚那(Santayana)显得相信的那样呢？这样，在这一类的文明教化能得到发展之前，历史上許多其他事情就得不曾发生过。但得要未曾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因而我們不妨把以

上的推想看做虛妄，而加以拋棄。

如果 1919 年凡爾賽會議當時，或者是克雷孟梭 (Clemenceau)，或者是威爾遜的政策能夠拚命堅持到底，而不是把雙方面的弱點合在一起，則後來世界各地所受希特勒恐怖的威脅也許不會那樣嚴重。我們這樣推測是妥當的，也就是提供了正確的根據，可以來作這樣的斷言。但如果蘇羅 (Soul) 仍然是蘇羅，或者如果他再生為保羅 (Paul) 以後沒有決定把那被釘在十字架上而又復活的彌賽亞的福音帶給異教徒，則羅馬帝國的命運又會怎樣？在阿拉瑞克 (Alaric) 以及其他野蠻酋長統治之下的歐洲又會怎樣？十八世紀的法國又會怎樣（假如還有一個法國的話）？是否現代科學與現代民主都會發展得更早些？還是根本就發展不起來？在這些問題上，只能用健全理性做出最粗略的回答。^①

當我們把未來事件可能演變的線索拉得遠離目前階段，我們的心智就會由於不可預料的因素愈來愈多而動搖不定。那也就是為什麼預言家會是那樣一種冒險的職業。“未來”的機會誠然使我們較為活躍，因為它們還在我們前面。不過“過去”也還是有關失卻的機會之一篇動人的故事，縱然它一去而不復返。“過去”把它的幕在我們身後默默地拉下來了，所余下來的僅僅是那已經神靈裁判的可怕的結局。但所謂結局的意思也不過是說歷史的不可逆轉，而不是說歷史上一切都是必然的。當然，更不是說一切都是好的。一個受了欺騙的回顧會把不可預料的事情錯當做事有前定。歷史上一切久已確定的事情以及不能改變的事情對於人們所發生的催眠作用往往會使天真的人錯認為這些東西有着一種隱藏着的目的；并使虔誠的人錯把歷史的裁判衰瀆地當做了上帝的裁判。

① 這是一切時間過長的歷史的重新構想都難辦的地方。例如，查理·勒奴維埃在《歷史中的虛構年代烏托邦》一書中在敘述二世紀到十七世紀的歐洲文化時，“不是作為事實經過，而是作為可能實現的假想來寫的”。這樣重新構想的歷史，其科學價值雖足令人懷疑，但可能具有重大的道德意義與教育意義。

如果我們讀历史的目的是为了从它得到理解而不是靠它来得救，那末就一定会承认过去确是存在着种种可能曾經是的事情。这种种可能曾經是的事情之中，有的竟会結果变成和未来的机会有关系，正如同一次認識到的失败会和随之而来的成功活动有关系一样。历史上的种种可能曾經是的事情并不是仅由人們的希望而生的鬼怪似的反响，却是錯失了的种种客观上的可能性——其所以錯失，有时由于缺少一位英雄，也有时由于缺少一匹馬或一只鞋，但大多数情况是由于缺少理智——特别是缺少那觉察客观上种种好的可能性所需要的理智。

我們可以把历史过程比做一株盘根錯节的古树，至今仍在茂盛地生长着。那树干就是人类，有着其形如弓，向各方分开生长的巨枝。由每根巨枝上又分出来大大小小的細枝。这里或那里还能找到那已經修剪掉的成对叉枒的痕迹，只留得一个分叉长得很大。另外的地方，也还能看出那修剪掉的单独巨枝遗留下来的瘤形痕迹。在那繁茂的树叶丛中也还能找到那枯萎的枝条。似乎当年曾有一位技术高明的园丁打算把它修剪成对称的形状（或者是令人欣賞的其他形状），不过目前这修剪工作已难着手。但由于每个季度都有新芽发生，因而这修剪工作也还得年年进行。这株古树或因雷电的打击而剎时毁灭，或因毒菌的蔓延而逐渐死亡。而人們对于它的果实的味道沒有共同的欣賞。

在这株古树上有着过去曾經长出巨枝而今已无存的处所，这是比較容易想象的；但在这条今已无存的巨枝上可能存在过的叉枒就不是那么容易想象的了。而对于这个虚拟的叉枒上曾經派生出来的細枝和树叶，則我們更加是只能做到最粗略的猜想。當我們看着这株活树时是比較容易看到的，比我們經驗着活的历史时还更容易，因为我們的眼睛追索着一个几何的模型，我們不难由此推知：如果任何一根现存的巨枝沒有得到順利的成长，或者中途夭折，那末，它上面已經长出来(和可能长出来)的一切东西都将无存。但絕不可由此推論：而說树干能够解释巨枝，巨枝能够解释叉枒，而又枒又能够解释

細枝和树叶。因为在这一系列关系上，前者只不过是后者的必要条件罢了。

树木的結構模型比較历史的因果联系要簡單得多。在那株历史的大树上，絕對沒有那“真实”、“必然”、“前定”或“固定”的形状。它上面也更加沒有那无数既无规律，又无模型，又无相互間的支持与联系的千变万化的枝枒。它并不是一块荆棘野草纏繞蔓生的荒野，其中沒有任何东西引向任何方向，而任何东西都可能在任何处所生长。

第八章 偶然和意外

事物的相对尺寸决定于配景。山谷中，鋸掉树干的橡树根和那参天矗立的枫树对比起来，尺寸相差悬殊。但如从高山頂上对之远眺，則二者似乎一般高。同样，当我们从远距离的年代来观察一个民族的命运时，許多重大事情都被忽視，而伟人和細民間的差別也就微乎其微了。

如果有人問：观察历史的时候，适当的配景法应该怎样？一年、十年、百年还是千年？我們必須这样回答：独立于某一具体問題的“适当的”配景法是沒有的。問題的提出就已經預先假定：把我們的探討限于一个固定的時間跨度之内。如果是为了比較分析，要对整个文化作一可理解的敘述，我們也可以把它加以縮写，而将杰出人物或其他偶然事件所发生的作为原因的影响完全加以忽略。但不得由此推論說：在这个文化以內的任何一定年代的历史都可以把这些因素加以忽略。

历史上的偶然事件相对于研究者的着眼点之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意义。对于一位想把百年历史的記錄加以鳥瞰的研究者來說，偶然事件的意义就显得极小；而对于一位敏感于种种可能事态和珍惜細节的研究者來說，它的意义就显得极大。如果对于某一个人的生平事迹，我們不是用一个传记作者的眼光来看，而是从一个探索整个儿人类历史，把它和地球史、海洋史、星座史等等来加以比較的研究者来看，那便不妨用简单公式把它加以描写。这些公式就如同中国的御史向他們年老的皇帝所說的話差不了多少，这位皇帝在登极初年，就派这些御史去探测人的“秘密”，而当皇帝臨終的时候，御史向他所报告的就是說人生下来、活着、受苦，然后死了。不管某一个人的

生活細節有什么变化，他淪为乞丐，还是做了皇帝，成为武士，还是成为圣徒，御史的报告总依旧是眞的。即使把这个人的生平加以改变，他的乡士，他的时代都改变了，但在一切变化之中，仍都可以追索到这相同的模式。这样的思考对人之为人的身份来说是适当的，因为在其中，每一个人都被当作和其他的任何人一样的。但如果我们是研究某一个特殊人物的历史，那末，这种方法便不值一錢了，除非所说的故事是要我们相信他不止是一个通常的人。

打个譬喻，如果我们为了替人类各族的社会史繪制图形，用弯脚规来測量以千年計的时间跨度而加以比較，那末，从这样的配景法上，我們除了說：它們之間也有着这共同模式或命运之外，还能再多說些什么呢？它們是产生了，长得多少更加壮实了，又衰微了和消失了。在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之下，它們延續的年代会长些。在一个明智的政府之下，它們的成員的生活会过得稍好些。在一个信仰宗教的政府之下，它們的成員大多数是在香烟繚繞之中終其一生，或者是作为异教徒而死在火刑柱上。但它們之間的发展过程都是大体相似的——不問它是希腊和波斯，羅馬和耶路撒冷，还是薩拉丁和理查一世的社會等等。如果这些就是我們能够从維科(Vico)、黑格尔、斯宾格勒以及湯因比(Toynbee)等人的循环論当中找到的智慧，那末，这些人的著作就不值一議，光靠传道书也就够了。

如果把各种文化当作一个“整体”，或是試圖在它們的整体上来加以解釋，这种門道对于我們研究历史是不会有什麼进一步的启示的。用直觉的方法把各个文化看作“意义的独特总体”，也絕不能夠了解关于文化的任何东西。我們要进一步地理解历史就得把各种文化各自的内部联系、或是异类文化之間的相互作用的特殊問題分离出来；就得对于一种文化之內所发现的各种制度，研究它們的結構上的互相关系和时间上的依賴关系；并且指示出来：一种文化的各个固定方面或各項变迁是怎样受到人类的非文化环境种种特征的限制和决定。如果有人要求把希腊文化当作一个整体来加以解釋，或者是要求解釋美国历史的全部发展过程，那末，他是否了解他的意

思，或者是：他是否正确地表达了他的意思，这都是很够令人怀疑的。为了要有历史的意义，对于各种文化所主张的齐一性必须超出那种不适当的比喻——即指生长、成熟、和消灭的循环——之外，而把它推广到：各种特殊的机械结构、各种控制性的条件，以及按关系的轻重深浅而排列起来的原因性影响——一句话，要照顾到那日新月异的经验之循环往复的各个方面。因为只有在这种经验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明智地作预测和行动。

但这时，我们上文所谈那些偶然的、独特的、个别的和新奇的等等事物又将如何呢？这些东西是否会从我们的理解之网的网眼中漏了出去呢？每当我们用一般关系、职能、原因等等〔概念〕来解释一桩特殊历史事件时，它的“历史性”是否便会消失呢？这些问题曾经引起人们的热烈争论，但部分困难是由于“偶然”这个辞语含义模糊。在某种意味上说，所谓偶然就是一种被给与的、或被发现的事物，它的存在在逻辑上不是必然的；而它的不存在，在逻辑上也不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任何存在于世间的东西没有不是偶然的，连那描述偶然事件怎样发生相互关系的规律也不能例外。而在另外一种意义上，则所谓偶然乃是不发生关系的意思。一旦我们在各组事物之间发现了一项互相联系的规律，那末，从这个规律的角度上来看，凡与此无关的现象都是偶然的。如果不是假定“其他事件与此无关”，我们也就不能发现任何描述某些事物的行为的规律。在第三种意义上（这是第二种意义的一种特殊情况），如果一个事件是作为两个事变系列的交叉点而发现的，而这两个事变系列又得分别由两种互不相关的规律来加以描述的话，那末，这个事件就是偶然的。^①

就这个辞语的主要意义来说，我们可以承认：每一个事件之中都存在着偶然性，但不能由此推论说：这个事件的任何方面都是偶然的

① 参阅珂痕：《理性与自然》，1932年纽约英文版，第151—152页。并参考霍尔诺：《关于现时代中观念与事件的进程的考虑》，第1卷法文版，第1—15页。

或新奇的。就这个辞語的次要意义來說，我們可以合理地做这样的預測：一个事件本来将会作为一系列若干前在事件的后果而发生的，但由于另一系列其他事件中途插足进来，因而所期望发生的结果竟然变了样子(这就是一个或好或坏的“意外”)。

历史学家，平时浸沉在历史事件的丰富細節之中，由于天天生活在那不可預料的偶然氛围之中，因而眼光短浅，往往会把偶然因素加以过分夸大，以致历史对于他們就好象只不过是一个純粹意外的故事而別无其他。無論是伟人，还是其他任何事物，都显得是偶然的，因此，他們对于伟人的估价和那极端的决定論者不相上下，两者都认为伟人在历史上发生不了什么作用。結果，在任何一定的时期，一个特殊的个人，究竟能够发生什么特殊的历史影响——这个問題，在他們看来，是几乎不能陈說的。历史上的一个偶然事件，是从另一个偶然事件产生的，誰又能說它向什么方向发展，以及为什么这样发展的理由呢？这样的历史学家沒有分清以下三件不同的事：(1)一个事件的絕對新奇的方面是不能理解也不能預測的这样一个同語反复；(2)事件之間的相互关系是那么复杂，人們对此无法加以可理解的說明和預測——这样一种见解；和(3)偶然事件仅只因为存在着其他的非偶然事件才能够发生历史影响——这样一种见解。一位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写了一本給人以深刻印象的历史著作，其中有一段頗为著名的話。这段話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在人类的历史发展中，一位实践的历史学家所能合法地認識到的齐一性，不过是“偶然与意外的作用”而已。

“可是，有一种理智上的刺激向我提出了抗議。比我更聰明和更有學問的人，在历史上看出来了一种計劃、一种节奏、一种前定的模式。这些和諧对于我是隱藏着的。我所能看到的只是：一个事变跟随着另一个事变，有如后浪催前浪。只有一桩大事，而既然那是独一无二的，我們就对它不能做任何的概括。对于历史学家來說，只有一条规律是有把握的：在人类命运的发展之中，所能認識到的只有那偶然和意外的作用。这并不是什么犬

儒主义或絕望的学說……”。^①

这段話里所表达出来的见解是那样广泛地为人所主张，因此值得更深一步地加以研究。如他所坚持的见解，其中頗有些曖昧含糊之处。如果这段話的意思是表明：斐歇尔先生不相信那种神学的決定論（如奧古斯丁和托尔斯泰的等等），或者那种目的性的理想主义（如黑格尔和辯証唯物主义的），那末，沒有哪一个关心科学的历史学的人会对此提出反对的。可是那所謂“后浪催前浪”的紧相跟随的事件，其間的确暗示着某种节奏的存在，而那是和所謂計劃的意义，或所謂前定模式的目的性怎样也是不同的。尽管一件东西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不二的，——例如我們的地球——但总还有許多的概括可以正确地适用在它身上。但作者的基本意思是清楚明白的——可是錯誤的。他所強調的那“一桩”大事——即偶然性，絕不比另外一桩大事更为重要或更为根本的——即偶然性在人間事务当中所受的限制。

因果的鏈环沒有严格的必然性，不过我們可以当它十有八九是靠得住的，而且它的可靠性往往还不只十有八九。例如，把技术引进一种文化之中，則一系列的后果会随之而来——由軍备工业的建立到政治的集中化——尽管这种文化对于和技术結合在一起的外来的种种价值怀着敌意。对于一个战败的敌国加以侮辱而不把它的重整軍备的潜力加以彻底的破坏，則另一次战争将会在下一个世代里发生。假如一个国家渐变富饒，并更加爱好和平，而邻国則仍旧淪于貧困饥寒，但拥有很好的軍备，則一旦有所借口时，这个繁荣的国家就会受后者的侵略。如果发动內战的一方，只打防御战，迟早是要失敗的。鼓动起来一次总罢工，而不予事先规定罢工的期限，那是一定要失敗的。假如一个民主的团体和一个紀律严格的集权的团体結成統一战綫，而那个集权的团体坚持鼓吹自己的政綱，那末，这个民主团体不是組織遭到破坏，就一定会受到对手方的愚弄，被利用去达到和它原来的民主性意图格格不入的目的。

① 斐歇尔：《欧洲史》第1卷，1935年伦敦英文版，第7頁。

当然，每一种情况之間，多多少少地总会有些个不同。我們常說的：能够对于两种情况加以区别，也就是指的这个意思。但我們不必停止在这个同語反复上，而还可以更进一步。我們可以承认：偶然和意外事件，从外插入到預期的模式中来的突然发生的事件，几乎不变地总是要露头的。不过，对于我們从自己以往的行为中能詳細准确地看出来的灾难，絕不能指望靠这种偶然或意外来加以防备。我們能够断定某些事情总会发生，但不一定是在适当的处所发生。关于偶然和意外的真正独特的特点就是：总能加以預測，但决不能指望它。

偶然事件的历史影响虽然是千变万化的，但却要受某种历史规律的制約，这是上举著者所承认而在那本书中到处都表达出来的。事实上，我很少遇到任何一种历史著作，象这本书那样处处布满了有关偶然和意外事件可能在其中发生的限制范围的种种“规律”和“概括”，这些规律和概括的正确性有的地方是頗成問題的。下文将把它加以引証，但不是因為我們承认这些规律和概括是真的，而是为了說明：斐歇尔先生，为了构成一篇可以理解的故事，不得不相信它們是真的；或者，与之相类的某些东西是真的。

关于早期希腊移民的定期侵略，著者告訴我們說：“借战争或劫掠的办法搜寻給养乃是这个社会的农业和牧畜业一个必要的补充措施。与其說那是犯罪，不如說那是国民經济的一部分。人为了活着必須吃飯。假如不幸收成歉短，他必得去偷盜、战斗、或者向外移民。”关于羅馬的扩张政策，著者写道：“羅馬連續地征服意大利，那是迫不得已，因为一个秩序良好的国家，受到强暴邻国的环伺，总得要在她的边界綫上来建立和平和确保安全——正如后来英国在印度取得的經驗。”关于这种扩张政策，后来对于羅馬人的性格所发生的影响，著者写道：“由于对非洲、亚洲、馬其頓和希腊广泛地进行掠夺所給予羅馬人性格恶劣的影响，那是突然获得财富对于本来无此心理准备的人心中总是会发生的恶劣影响。”

斐歇尔先生既不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也不是一个經濟决定

論者，但他對於政治經濟學上的種種規律却有着那樣堅強的信念，竟認為這些規律對於歷史偶然性的整個領域有着絕大的支配力。他的著作中這樣寫道：“歷史上最聰明的皇帝之一戴克里先（Diocletian）下了一道命令要把羅馬全國的物價加以規定，結果却发现（正如他以後歷史上許多人所发现的）：并非世界上的一切法律或懲罰都能禁止人們在市場上賤買貴賣。”在戴克里先那個時代是真的事情，過了一千一百多年之後，在黑死病發生過後的英國也是真的：“英國的議會要求全國勞動者和手工藝人擁護舊時的工資率，並且禁止他們隨便在鄉村之間遷徙。政治經濟學如同大自然一樣，儘管可以加以人為的驅迫，但遲早總是要回頭的。愛德華議會的立法要想遏止一個扎根於當時經濟必然性中的歷史過程是辦不到的。”^①

象“必要”、“迫不得已”、“總得要”、“必須”以及“不能”等等措辭，絕不是適用於偶然性的語言，更不必說下面那種馳騁文筆的辭藻了，在其中宣布了蘇拉對於羅馬元老院所提出的改革方案是注定要失敗的，因為“不論是蘇拉，還是其他什麼人絕不能干象抵擋天上星辰的運行那樣的事。”

偶然事件究竟會在什麼範圍內發生，固然受歷史關係之網所決定，但歷史關係之網也會遭到每一個偶然事件的破壞。這裡，我們所需辯明的不過是：網是常被破壞的，而偉人就可能是使它遭受破壞的偶然現象之一。

試來考察一下任何歷史學家的著作，只要是夸大了偶然性的作用，而犧牲了偶然性所受的種種限制，那末，這裡對於斐歇爾先生所論証的，也很容易適用在他們身上。

*

*

*

上文已然談過：歷史上的“如果”問題具有科學的意義。同樣，也能夠說明：這些“如果”問題指出了一件具有非常重大道德意義和

① 這些引証都采自斐歇爾《歐洲史》第1卷，第18,62,64,93,320各頁。所有重點均為本書作者所加。

社会意义的事实。历史上的必然性，正如同与之連續的自然界的必然性一样，二者都具有束縛力，只是不具有邏輯上的強制性。历史上的必然性所以區別于自然界必然性的地方就在于：它們部分地还具有目的性。它們包含着一种意义，牽連到人們所认为“有价值的”、或“可取的”东西。

当我们說：奴隶制度的废除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或者說：“打破私人垄断的限制以便解放生产力”——这一理想具有社会的必然性时，那至少包含着以下两点意义：第一，当“人”出现在社会关系当中的时候，我們对于他所具有的生物学上和心理学上的特性必須立定若干假設。人类行为的种种特性應該看做是个相对不变的因素，其一般的特征是相同的，但和自然科学上所研究的种种性能属于另外一个不同的专题范围。

第二，它还得参考那个时代的人間种种价值和种种偏爱之間的秩序，参考善恶之間的选择；并参考如何对待既定环境的策略。这些个秩序、选择和策略本身可能是习惯、教育和传统等等所发生的预料得到的結果。但他們既属自愿的，那就也可能是理智上反复思考的后果——亦即在这种意义上是一个自由的决定。这个自由的决定能够减少未来的冒险，但絕不能把它完全排除。如果象韓斯·萊辛巴哈(Hans Reichenbach)所暗示过的：我們的每一个行动都不啻是針對着可能的失望而押的賭注，那么，理智的方法也就不外是一种如何增加我方赢得的分数办法。

历史上的許多可能发生过的事情都是出乎人力控制之外的。在那决定性的事件最后宣判人們处于天堂地獄之間的不确定地位之前，为了实现这些可能发生过的事情，人們究竟能做些什么？——这是一个頗难逆睹的問題。我們为了1933年罗斯福总统的被刺未中而感到欣喜，同时，我們也悲叹1923年慕尼黑兵变中，希特勒遭到德国国防軍的連珠射击而竟得脫逃。以上两个例子当中，行刺命中的有根据的可能性，使得我們深切地感到一切历史过程的异常复杂，同时也使我們更强烈地感到人們对于它的无能为力。若能于适当时机

随时記得那出乎人力控制之外、但确有所根据的客观可能性，便有可能緩和那理論家的严格公式，并且遏止那实行家的自然而然的独断主义。对于这些可能性加以适当的考虑，可以增强我們的防御能力，以便避免那恶运和机会所加于人們身上的失敗痛苦。

不过正如我們所已經看到的，有些可能发生过的事情是人們所能够掌握的。它們乃是真正失掉了的机会，因為它們本身有着实现的可能。人們所以失掉时机是由于他們沒能更有理智些，更勇敢些，或更决断些——有时則因为每个因素多了一点。

理智和意志的取得胜利永远不会违反自然的和社会的必然性。它們的作用不过是刺激人們身心上本来具有的那些无可怀疑的潜力，使之能够更好地迎合这些必然性而已。理智和意志，由于本身的努力就能給人們提供若干有利条件，以便把可能变为现实。當我們說：“回顾起来，那不可能的事竟告完成了”——就是表达的这个意思。历史上最沉痛的悲劇，莫过于人們喊叫“不可能”喊得太早，并且由于眼光短淺，沒能及时充分發揮本身潜力。人們的美德和罪恶都不仅是触媒。这些美德和罪恶能够成为有力的历史力量（而且实际也曾經是如此）——但这一事实并不否定社会决定論的任何明智的想法。

历史的道德責任就在于恰当地理解当前种种的“如果”和“可能”的問題，以便在那可以預測的种种后果的光照下，選擇前进的道路。即使我們已經做了明智的選擇和勇敢的奋斗，有时还是会遭受失敗的。在这种场合，后悔总是白費的，比較聰明的办法还是暫時退却，同时，千万不要向敌人的理想妥协，以便等待新时机的到来。但理智和百折不撓的勇气总归比那動搖不定和时作时輟的努力更容易贏得胜利。假如有什么于一切历史时期都能适用有效的道德命令的話，那就是求知与行动。

以上的考虑对于现阶段的历史有着特殊的关系。每當我們环顾一下今天的世界局势，总能够看得出：由于以往失掉了的机会而招致的种种致命的后果。例如，1914年8月間，国际劳工和社会主义运

动沒有抓住时机来制止世界大战，而这一事实，正如当时所料，可能会引起更可怕的战争。克伦斯基和民主社会主义集团，失掉了实现他们党正式的但未公布的政綱的机会，正如切尔諾夫（Chernov）所揭露的，这个未公布的政綱内容是：号召停战，把土地分配給农民以及其他等等措施。而这些措施正是后来布尔什維克所鼓吹的做为强制实行少数独裁的准备步骤。魏瑪共和国失掉了破坏那保皇反动党团的机会，而沒有这些反动党团的帮助，希特勒是不会当政的。西欧各国政府和美国失掉了机会来援助那得到合法承认的西班牙国家，以反对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侵略，以致在和法西斯主义作不可避免的摊牌的时候，不能赢得大陆方面的一个积极同盟国，而仅仅得到一个敌对的中立。

失掉了机会的后果很少会完全杜塞起今后供选择的道路，但却能把选择的范围弄窄，而仅仅剩下来若干比起更早的那些可能性来相对地不利的道路。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在凡尔赛会议当中失掉了履行諾言的机会，但当今反法西斯战争的理由却不是由于威尔逊主义复苏的反响。其理由勿宁是：失敗于軸心国家之手会带来籠罩全世界的法西斯主义以及那不忍言說的野蛮和墮落，而胜利的获得則意味着得以残存，并可得到再一次的机会。得到再一次的机会来解决我們这个时代的基本問題——如何把那走向计划經濟的經濟趋势和那民主的价值及技术，加以融合。究竟是法西斯主义，还是民主的存活，以及另一个机会，——这就是我們这个时代的严酷的选择。

第九章 事变性人物和事变 創造性人物

以上各章我們使用“英雄”这个字眼儿是根据日常习惯采用了那比較广泛而曖昧的意义。而目前則有必要使它充分明确，以便对下文即将展开的論点能作某种考核。

但在进一步討論我們的主题所系的主要区别以前，这里先把上面几章暗示过的几个次要的区别引述一下，还是会对于討論的进行有些帮助的。首先須得把历史上行动方面的英雄人物和思想方面的英雄人物分开。但是一般对于“伟大”人物或“杰出”人物的通俗评价則很少作这个区别。例如，喀德尔(J. McKeen. Cattell)对于西洋历史上杰出人物所做的那个有名的考察，在一千位英雄的名单当中，居首的十位英雄是：拿破仑、莎士比亚、穆哈默得、伏尔泰、培根、亚里斯多德、歌德、恺撒、路德和柏拉图。^①但根据历史事变的实录来考虑的话，其中只有四位可以称得起历史上英雄人物的候选者。没有人能够强辞夺理地主张：莎士比亚对于决定性历史事变的出现或不出现有着任何影响。这样说并非否认：思想方面的英雄同时也能成为行动方面的伟人，也非否认：他們思想的后果（譬如說发明家、宗教領袖和社会哲学家等）可能对历史发生深刻的影响。但在我們品評他們的主张时，还得轉而面向历史事变的实录。就古代史來說，亚历山大的名字并未见于上引名单之上，但真正以历史英雄的面貌出现

① 見《通俗科学月刊》(Popular Science Monthly)第62卷(1903年)，第359頁。此項研究是以若干标准的传记辞典和百科全书对于一千个历史杰出人物所指定的相对地位为根据的。

的，与其說是亚里斯多德，不如說是亚历山大。而只有当我们能够証明：确是亚里斯多德的思想对于亚历山大的开創帝国有所鼓励和启发时，然后才能把亚里斯多德联系到英雄事业上来考虑。

第二，我們还得承认历史上的人物有这样的区别：一些是著名人物，是那些能够取得人們信仰的人，另一些个人虽然影响了历史事变，但没有贏得伟大著名的声望。而在历史意义和历史上的声望之間并没有什么靠得住的联系，历史意义是以某人的行动对于事变发生的影响来衡量，而声望則仅仅根据于人們的欢呼与贊頌。所以，当我们研究某个人物时，与其根据：人名簿、标准著作叙述此人事迹所占頁数，以及援引的頻度等等，还不如根据科学历史家对他的判断来得更为可靠些，因为科学的历史家是研究特殊的因果联系的，而前面几种根据則大大受到风格、形象生动性的要求，以及成见等等的影響，而很少根据真正的科学探索。尤其在今天，任何“头面”人物都有可能被塑造成“英雄”。1916—1933年之間，无疑地，兴登堡(Hindenburg)是德国最知名的人物，但我们却不难提出至少半打以上的人物，对于这时的德国历史(包括軍事史在內)有过更大的影响。

最后，我們还得把道德上值得重視的人物排除于英雄的概念之外，这并非因为道德判断不适用于历史，而是因为历史上許許多多事情都是坏人做出来的。这里，我們最关切的問題是历史的創造，而不問創造得或好或坏，是福是灾。

所謂历史上的英雄就是那样一个人：在决定某一問題或事件上，起着压倒一切的影响；而我們有充分理由把这样的影响归因于他，因为如果没有他的行动，或者，他的行动不象实际那样的話，則这一問題或事件的种种后果将会完全两样。有时，人們会提出这样的反对意見：即对于任何問題、事件或后果等等的“重要性”，并无普遍一致的看法。有的人认为：究竟印度是否保持自由，究竟战争是胜是败，或者，究竟将来世界局势是民主主义的还是法西斯主义的，对于他們來說都是不“重要”的。但所有这些意見，对这个問題都是无关实质的。不管你把什么东西看做重要的，这問題总是不可避免的。是否

不管什么人在这个事件当中起着领导作用，而你所认为重要的事件横竖总得发生？还是应该这样说：对于那个重要问题或事件的出现与不出现，某人负着主要责任——而这样说总会是真的？

这问题就引导到那个关键性的区别。那也就是：历史上，作为事变性人物(eventful man)^①看待的英雄和作为事变创造性人物(event-making man)看待的英雄，二者有所不同。所谓事变性人物就是：某一个人的行动影响了以后事变的发展；而如果没有他的这一行动，事变的发展进程将会因之而完全不同。所谓事变创造性人物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他的行动乃是智慧、意志和性格的种种卓越能力所发生的后果，而不是偶然的地位或情况所促成的。这个区别试图正确对待那个一般的信仰，即英雄的伟大不仅要凭他的所做所为如何，而且要凭他这个人本身如何。从这里开始，除非另有说明，我们所谓历史上的英雄或伟人仅指事变创造性人物而言。

历史上仅属事变性的人物所扮演的角色，可以比做那个以手指堵住溃堤孔隙而拯救了全城的荷兰儿童。我们几乎可以举出任何儿童在那种情况下都能做到同样事情——这样说，并不致于剥夺了这个故事的迷人魅力。所需全部条件不过是：一个儿童、一只手指和恰恰经过这里的幸运机会。不错，这个事件本身关乎全城人的生命，意义非常重大。正如一个住在珍珠港的荷兰儿童，假如及时报警也可能救出全部舰队一样。不过，为了应付当时局势而需要的种种性质则是颇为平常的类型。打个比方，这里的情况就是某人碰上了成为伟大的机会，正如同某人偶然碰上了可以用来赎回整个城池的宝藏一样。可是，所谓伟大却必须包含着某种非凡的才能，而不仅是某人适逢其会地降生，并置身于某一个恰好的地点和幸运的时刻。

按照英国历史家吉朋(Gibbon)所说，君士坦丁皇帝(Constantine)于313年，把他自己的身份由“护教者”一变而成为教会的“改宗

① 我的这个辞儿得自查理海尔先生(Charles Haer)，但本书论点完全由著者负责，与海尔先生无关。

者”。^① 前期羅馬对于基督教政策的轉变，以及羅馬帝国的官方首腦公开采用这种政策是西欧发展史上稀有的重大事件。但究竟君士坦丁的哪一种特殊的个性使他会有这个轉变，那还是个大有爭論的問題。而从他的任何一点特殊个性来说，至多也不过是个能抓住主要机会的政治家而已。不管他对宗教怎样虔誠，还是不足以阻止他自己借口莫須有的罪过而杀害了他的亲生儿子。不論几百年之后，基督教是否会轉变成为官方宗教，不論这种轉变是在什么不同的情况下发生，或者产生什么后果，也不論如果没有君士坦丁，羅馬帝国是否就不会取得神圣的称号，君士坦丁之为一个事变性人物，那是完全跟这些因素无关的。因此，虽然君士坦丁的行动，对于他那个时代带有决定性的作用，但他并非一个英雄。他所以贏得伟大的称号还得感謝那感恩的基督徒少数派对他的推崇。而他后来对于教会事务的干涉，則使得他們对于他的伟大不得不再加以斟酌。

虽然历史上沒有任何証据足以說明羅馬的其他帝王也会援助基督教而使它取得这个新的地位，但这件事的实现却是非常容易的。那就因为基督教的发展成熟，皇帝在羅馬社会中的地位，以及传统信仰的沒落（試看当时沒有任何人提出强烈的、狂热的反对意见就足以說明这一点）等等因素都会导致基督教的采用成为客观上的可能，但这既不是一个社会上的必然，也不是一个政治上的必然。而君士坦丁則根据种种帝国的理由而促成了改宗基督教的事业。^② 不过我們与其相信他是为了巩固国家政权而利用教会作为实现公共政策的一种手段，还不如相信他是打算唆使异教和基督教之間发生斗争以获得漁人之利有更多理由。在君士坦丁以及他的事业之后，并正因为他的事业，企图恢复异端宗教的任何努力都注定要失败了。如果有人說朱理安皇帝（Emperor Julian）可能在剝夺基督教的特权地位上

① 參看爱德华·吉朋：《羅馬帝国衰亡史》第1卷，现代丛书出版社英文版，第636頁。

② 參看科克兰：《基督教与古典文化》，1940年牛津英文版，第211頁。

获得成功，那是十分靠不住的，尽管他有卓异的才能和甚至正好遇上了一个成熟的时机。可是，朱理安在作为君士坦丁的一个继承人上——即在把基督教降格为和其他教派平等竞争的一个教派这件事上——虽然失败了，但〔假定他生在君士坦丁的同时〕，他还是很容易成为君士坦丁的替身的。因此，必得把君士坦丁看做一个事变性人物，而不是一个事变创造性的人物。

事变性人物和事变创造性人物都出现在历史的交叉点上。早先的事变方向已经给他们的活动准备下了可能的条件。他们之间的区别是：在事变性人物的场合，条件的准备是在一个很高的阶段。为了做到那决定性的选择，所需要的不过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行动——一道命令、一个法案、或一个常识上的决定。他也可能把他的任务“错失”，或者被别人中途篡夺了去。但即使他没有失败的话，那也不足以证明他是一个特异的天才。他的功过是根据他的行动后果究竟给人们带来幸福还是祸灾而断定的，而不是根据他在行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品质。

另一方面，那事变创造性人物，虽然也一样在历史路线上找到了一个交叉点，但他却还可以说帮助创造了这个交叉点。他不但具有种种非常的天才，而且在实现他所选择的历史路线上，发挥了他的特异的天才，增加了成功的机会。象愷撒、克伦威尔和拿破仑等等人物，至少至少也得从他们政敌的手中打开一条出路，而在这样做时，发挥了他们特异的领袖天才。正是那作为事变创造性人物看待的英雄把他们的个性积极的烙印加盖在历史上面——一直到他们从历史舞台上消逝以后，这个烙印还依然明显可见。至于那仅仅是事变性的人物（例如那以手指杜塞溃堤穴隙或发射引起战争的第一颗枪弹的人）则极少能够了解他所面临的历史选择路线是什么性质，或者他的行动所导致的一连串事变是什么性质。

在概念分析上，于事变性人物和事变创造性人物之间做分明的区别是容易的，但很少历史人物能够恰如其分地分别归入两类之中。究竟人类历史上某一特殊的英雄人物，就某些重大事变而言，是应该

算做事变創造性人物，还是仅属幸运的〔事变性人物〕——这种精細的工作必須让給历史学家去做。按照上文对于二者所作的区别来下定义的类别，不是不包含分子的空类，这就事变性人物而言，已表现得很清楚了，就事变創造性人物而言，則以下将来加以确証。至于这些类别究竟是否可以按两类共有的性质的各种組合或按程度来处理，那还是頗为可疑的。不过同一个历史人物，在第一方面應該归入事变性人物，在第二方面應該归入事变創造性人物，而第三方面則两类都归入不了——这却极有可能。

千万不要因此便认为以上方法就是品評个人在历史上重要意义可能采取的唯一办法。因为他們影响的性质可能以多种方式表现出来，而方式之多，不啻无数細流汇聚起来成为难以分辨的一个洪流，而同时影响的方式又是那么間接又間接，以致难于追索它們的来龙去脉。

湯姆士·杰斐逊和亚伯拉罕·林肯对于美国生活和美国人的思想与行为方式的影响是巨大的。但无论把他們归入事变性或事变創造性二者之中的任何一类都觉很难确定，而可能不恰当。杰斐逊的希望是当他逝世以后，人們把他紀念成为：“独立宣言的撰著者、維基尼阿宗教自由规章的起草人，和維基尼阿大学之父。”可是，不管分开也罢，合起来也罢，这些成就都不足以說明他是一个事变性人物，或是一个事变創造性人物。誠然，如果不是杰斐逊起草了独立宣言，則当代民主主义的辞藻也許会是完全两样的，但他的那种巧妙的措辞所表现出来的眼光和信仰却是和他同时代杰出人物所共同的（他只是其中之一）。至于宗教自由的规章，那不过是各州早已酝酿起来的宗教宽容运动的一种正式表现。而美国高等教育的前途，在杰斐逊以前老早就已有了一个突出的前兆了，当然很难說是他对此給予了深刻的影响。

这是頗为奇特的，从狭义的历史活动的观点来看，我們为了搜寻杰斐逊所以成为事变創造性人物的証据，却須到他自己不那么重視的事件上去找。这就指的是路易斯安那州的贖买事件，而他正是这

方面的鼓动物物，他是在人們的激烈反对声中来推进这个事业的。如果胆量稍小的人也許就被吓住了。而这块地方当时属于法国主权，如果不是从拿破仑手中把它取过来，那末，最晚到維也納會議时，英国也許就要取得这块領土的继承权。而如果没有路易斯安那州这块地方（連同靠它提供入口的西部各地），則美国可能至今还是局限在大西洋沿岸的一个国家。那时，她的政治史和經濟史就都会和现有的完全两样了。我們很难保証：除了杰斐逊而外，还能有其他任何在职总统能有那样的眼光与魄力来抓住这个大好时机把异国势力和潜在敌人从边疆上驅逐出去，同时把美国国旗下的領土增加了一倍以上。但不管我們在美国領土的扩张上怎样評价杰斐逊的功劳，而他作为一个人物和思想家，以及作为一个在美国文化上具有历史力量的角色，却都不决定于此。除了那些我們叫做一个民主社会中的历史“英雄”的人而外，別的人在这方面也有施展的余地。^②

那末，对于那些享有巨大政治权力而他們統治下的朝代尽管表面上显着平安无事，却以和平与繁荣著称的历史人物，我們又将怎样評价呢？这种类型的局势正是伍德所最为关心，而他又过于輕易将其归功于少数統治人物。究竟何时能够归功于这些統治人物，何时不能？而如果归功于他們的話，得在如何情況下才能把他們看做事变性或事变創造性人物？这里准备援引羅馬史上可以叫做黄金时代的一个时期作为例証来加以說明。

吉朋认为下面这个判断應該加以深思熟慮：即在奥古斯都王朝之后，所有欧洲各民族的幸福都“决定于某一个人的个性”——也就是說：决定于不論哪个碰巧做了羅馬皇帝的人。在一个农业社会里，人民能够在国民經濟的間隙中找到生活和避难之所，以上情况似乎很难发生。不过我們若是从羅馬皇帝所發揮的那种无限权力来着眼（不問它的結果好坏），便不难体会到在吉朋的夸张背后确有某些真理。可是，就历史而論，羅馬帝国史上最为平安无事的时期（是說从

② 參閱本書第十一章。

战争、宫廷革命、蛮族的侵入等等方面来判断的)要算是基督纪元第二世纪两代安东宁、即庇护(Pius)和马可(Marcus)当政时期的四十二年。吉朋用一种异乎英国人的热情与潇洒叙述了他们的联合统治。他说:“这可能算是历史上唯一的时期——那时政府是以增进一个伟大民族的幸福为其唯一目的。”而且那不仅是政府的目的,并且还是它治理的结果呢!他用了任何著名的历史学家没有用过的最最极端的笔调说:“假如有人要我来确定世界史上究竟哪一个时期可算是人民生活情况最为繁荣和幸福的时期,我将毫无疑问地指出:那是从杜密善(Domitian)逝世到康茂德(Commodus)即位为止的这个期间。”①

这确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和平安无事的——时期。乍一看,好象我们的范畴对于这一期间不能适用。当历史上平安无事,或者很少发生什么事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招致产生事变性或事变创造性人物的原因。可是只要吉朋(关于上举两代安东宁皇帝)所说的话有一点儿是真的,我们便不得不感觉到:这两个统治者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正不下于那扩大罗马疆土,制定罗马法典、和改变罗马宗教的各个皇帝。但如果我们的这种感觉确有道理的话,那一定得以吉朋所暗示的那种信念为根据:就是说,一个时代当中的秩序、平静、和繁荣是那个朝代的专制君主采取的种种政策的后果。也就是说,是他们阻挡了那否则就会发生的悲惨事件。假如象吉朋所做的那样,我们要让罗马皇帝对于他们朝代当中的罪恶、愚蠢和不幸负责的话,我们也待把当时的和平、明智和福利算在他们的帐上。尽管他们的生活传记读起来并不象尼禄(Nero)、加利古拉(Caligula)、康茂德等人的历史那样有趣。

① 参看《罗马帝国衰亡史》第1卷,第70页。他那著名的对于历史的评论即是与此有关的。他对于第一代安东宁评论道:“他的朝代的显著特点就是供给我们以极稀少的史料。而这也可说是这个朝代的特殊优越之点,因为所谓历史,不过是人类罪恶、愚蠢和不幸的纪录而已。”但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吉朋本人并不以这样一个悲观的历史概念当他躬行实践的标准。也就是说,他的历史所纪录的,远远超乎这些之外。

由于吉朋无意识地沉溺于英雄史观的缘故，究竟罗马皇帝是否象他想象的那样，对于当时国家的景况应该负责，那还是值得争论的。后来的历史学家大概都认为：罗马的历史和当时人民的幸福，与其用罗马皇帝的个性来解释，还不如用罗马农业的情况来解释或许更为合理些。但是这一问题不是这里所能解决的。关键之点乃是：一个期间的平安无事——亦即它的繁荣——或者是统治人物采取政策的后果；或者是社会经济条件（连同其他因素）导致的结果，而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未曾受到这种政策的值得重视的影响。而在第一个场合，对于当时的政策负责的人物，可以是一个事变性人物，或者是一个事变创造性人物，这决定于对当时情势的分析。而在第二个场合，用不着引进什么英雄人物（不问是上举哪一类）就能正确解释当时的历史现象。只要是政治活动可能对于一个时代的繁荣发生影响的话，那末，正如吉朋所说，那两位安东尼皇帝可能对罗马史上这一个幸福的插曲阶段负有很大的责任。但一个时代的繁荣，它本身并不足以作为充分证据来保证人们可以推论到当时的政治领导。没有任何历史学家能够合理地主张：战后时期美国的繁荣应该归功于哈定（Harding）和柯立芝（Coolidge）的领导。

我们说：事变性人物是种种事变的创造物——这意味着：由于若干幸运的或不幸的情况天缘凑巧的结果，这个人物立于这样一种地位，即他采取行动或者放弃行动对于某一重大问题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他自己不一定清楚：这是什么问题，以及他的行动或不行动对此究有什么影响。例如，法国革命期间，公安委员会的各个成员，作为一个集团来说，就是一些事变性人物。其中只有罗伯斯庇尔和圣鞠斯特（St. Just）可算是事变创造性人物。为什么？就因为他俩对于路易十六世废黜后存亡攸关的问题比别人知道得更透彻。连拿破仑自己也相信：如果罗伯斯庇尔仍然当权的话，法国的社会秩序将会安定下来，共和国政府将照常进行执政，而拿破仑就不可能篡夺政权。但罗伯斯庇尔的行为也为他自己掘了陷阱，而且尽管在政治上也曾动员一切力量来为他恢复名誉，结果还是促成了法兰西共和国

的崩潰。对于那超越了国防和公安上的利益所需范围而推行起来的恐怖政策，他和圣鞠斯特伙同一起是应该对之负责的。^①

虽然罗伯斯庇尔对于那不分青红皂白地判处罪状以及司法上的阴谋等等野蛮的过激行为也是不同意的，但正是他自己的政策为这些过激行为准备了条件。这种恐怖政策（在罗伯斯庇尔同意的范围内）并未能把法国从反革命的火焰中拯救出来，反而不啻火上浇油。正因为这种恐怖气氛笼罩了千百万真正反对专制主义的法国人，因而拿破仑才得轻易把政权篡夺到手。罗伯斯庇尔的一种附带的特异之点就是爱把罪状妄加于他的反对者，诬之为领受英国津贴的特务，连那绝非特务的丹敦(Danton)和克劳兹(Anarchisis Cloots)也不能幸免——他这举动为后来的俄国革命做了一个便于模仿的榜样。罗伯斯庇尔甚至荒谬地说：“共和国对于它的敌人什么也不欠，只欠债以一死。”当他开始把自己的敌人看成共和国的敌人时，那对于历史是会发生致命作用的。

事变性人物带到历史上来的那种平凡的能力和他们的行动所发生的非常影响——这其间是不成比例的。我们如举查士丁尼皇帝的个性和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做为说明，那是再恰当也没有了。在他的朝代当中，种种伟大的军事成就（那是由贝利撒留〔Belisarius〕赢得的），罗马法典的编纂，雅典各哲学学校的封闭，他对于神学事务的干涉，他的宏伟的建筑事业等等——所有这些都对于欧洲文化给予了深刻影响。但是查士丁尼本人在任何一点上也不会超过一个平庸的人物。尽管他的决定动员了许多比他更有能为的人为他效劳，但他对于自己行为的目的，或者自己的决定对正在进行的事业究竟影响如何，完全没有清楚认识。

① 在法国革命的恐怖当中，被处以断刑和枪毙的人，十分之七是工人、农民和下层中产阶级。据最近的研究说明：在大约 17,000 个牺牲者当中，亦即于审讯后判处的人之中，工人占 31½%，农民占 28%，下层中产阶级占 10½%。至于那当场格杀和遭受残酷的监禁待遇的 50 万政治犯中被杀的还不计算在上述 17,000 以内。参看格黎尔《法国革命期间恐怖政策的影响范围：统计说明》，1935 年剑桥英文版，第 166 页。

依照历史学家斐歇尔的意见，查士丁尼的最具事变性的活动就是六世纪中叶他消灭了意大利信奉异端阿里烏斯教的哥特人，其结果使得意大利半島整个儿变成荒无人烟的地区。哥特人的統治者們对于他們領土以內的正統基督教本来采取一种严格的信教宽容政策。当查士丁尼命令他手下的將軍們准备向哥特人进攻时，对方迭次乞求和平，并且情愿永远称臣納貢。但是固执的查士丁尼完全不为所动。至于他那位标致的、有影响的、比他更加聪明的爱妻，提奥都拉(Theodora)，照她平时的习惯，本有可能說服这位皇帝撤回那些將軍，但为了政治上的一些理由，她却宁愿保护其他的异端教派。于是哥特人就被彻底消灭，无有子遺了。斐歇尔說：“消灭哥特人是个极大錯誤。如果哥特人和平地保留在那里，可能就不会发生后来隆巴底人的人侵，不会有天主教的教皇国家和西方帝国的复兴，而意大利化了那样痛苦的代价才于維克多利亞女王朝代当中取得的政治統一，也許早在厄忒尔伯特(Ethelbert)朝代当中就已經达成了。”^①

当然，究竟这一事件是不是应该叫做“錯誤”，还要看发言者的宗教偏好如何。那些接受尼西亚會議(Council of Nicea)的神学观点的人也許把查士丁尼的十字軍称为幸福。但不管是錯誤也罢，幸福也罢，这一举动对于欧洲历史的确有着决定命运的作用。

*

*

*

这里須得考虑一下英雄和社会利益之間的关系。人們所以忽視这一問題，表面理由是他們指出了：英雄的活动不是为了迎合一个已当权階級的需要，便是为了迎合当他的事业成功之后即将当权階級的需要。却不知道，这样的分析，即使是真的，也排除不了事实上存在的这样一个可能：不管是已当权階級也好，还是即将当权的階級也好，其所以需要英雄人物是因为英雄具有盖世无双的种种品质能够為他們服务。但人們往往假定这一可能已被排除掉了，而事实上他們所能确立的全部論点不过是：英雄必須注意社会利益，而且从这些

① 參看斐歇尔《欧洲史》第1卷，第131頁。

利益当中取得支持。

历史上的事变創造性人物显然不能孤立无援地完成任何事业。他必得倚靠两个集团：一个是范围較狹的，属于副官或助理之类的集团，构成英雄的一个“机关”；另外一个范围較广的，以人民为其基础的，可以称为社会階級的集团。这两个集团都得借助于利益的紐帶和英雄系在一起，但利益的性质不同。人們往往把利益的作用設想得过于簡單，因而把事变創造性人物表现为社会利益的仆役，而认为社会所以选择他是因为他有能力促进社会利益；而当他不发生这种作用时，便可将他加以替換。于是，便把事变創造性人物完全化为达成历史目的，或階級目的的工具，也就是說，是达到別人目的的工具。至于他自己的目的，有何作用，則被看做无关重要的細节。誠然，許多（如果不是大多数）短期登上历史舞台的政治人物确属达到別人目的的工具——这一点是可以承认的。但絕不能认为我們叫做事变創造性的人物也属于这一类工具。下文我們將要考虑一下：(1)英雄和为他后盾的社会階級之間的关系；(2)英雄和他的“机关”之間的关系。

事变性人物必須倚靠一个社会階級的支持 这一事实，在这个人物还未掌握政权以前，要比他已掌握政权而能指揮国家的强制力量和教育力量之后，还要明显。一个强有力的社会階級，当它发觉自己的特权地位受到威胁，或是想利用政治力量来破坏其他階級的特权地位时，往往会做一种安排来使得那英雄人物的候选人能有發揮其所长的机会。但这位英雄也許不能把付托給他的事业完全实现。他的任务可能象是一位布吕宁(Bruening)，一位司莱赫(Schleicher)——一位丰·巴本(Von Papen)，一位胡佛，一位克伦斯基，或甚至一位莱昂·勃魯姆(Leon Blum)的任务。但当他已經發揮所长，并且假定他又具有足够才干的話，正是他的成功使他能够脫离原来負責选任他的那个階級。他也許还在为他們的利益服务，但他这样做，现在是出于他自己的决定，而不是由于他們的决定了。

事变創造性人物所以能脫离他原来服务的(实际上或推测上，因

为其服务而被选的)那个阶级而独立(超乎或反乎那个阶级而独立)，是用下面各种不同的方式达成的：第一，他能够背叛选任他的那个阶级而树立其他的社会利益。他这样做并不难，因为当他准备着取得政权而进行鼓吹活动时，除了那民族的替罪羊而外，还早已就对其他阶级给予了許多諾言。既然，他总是以民族或人民的名义而讲话，他当然就能够正好利用原来支持他的那个阶级帮助传播的神话，好来为脱离这个阶级而独立的行径作辩护。第二，这个事变创造性人物实际上控制了国家的武装力量。在他掌握政权以前，往往早已享有某些军事上的威望或权力了。第三，他借助于他的“机关”来攫得和管理种种社会职能，镇压反对派，并且巩固军事力量。这个机关势必尽量剪除一切潜在的反势力，并把一切独立的机关拉在自己周围。事实上，正是这个“机关”使他能够利用第一、二两种办法来使他自已得以摆脱对他原来从之获得选任机会的那个阶级的依赖关系。

为了揭露这位英雄的主要靠山，我们须得留意的正是这个机关，而不是那个社会阶级。不管它是一个政党也好，一个耶稣会的宗教团体也好，一个军事秘密顾问集团也好，这位英雄总得和它取得比钢索还坚固的联系。假如他要扮演应时人物的角色，而打算报答支持他的那个社会阶级，这个机关自然要算一个方便的工具。假如他决意脱离原来那个阶级而另辟途径，这机关的赤胆忠心更是比什么都需要的。不管是哪种情况，只有把那个机关变成从属于他自己的机关，然后他才能稳操胜算。那末，这是怎样办到的呢？主要就靠给予这机关的成员们以种种物质上或精神上的特权，使之能够取得十分特异的地位而成为一个独立的集团。作为一个集团，它的成员必须能够自信称得起是元老派，尤其是每当和其他社会团体建立政治同盟的时候。他们或者取代现有的官僚机构，或者与它融和而占据一切机要地位。

但历史英雄人物如果仅仅成为他的机关的工具，就不能长久享受威权地位。因为即使他不得不依靠这个机关，但必须经常保持他自己的主人地位。怎样保持呢？就是要把这种事态显示出来：这个

机关所享有的种种特权必须倚靠他本人的地位——他的垮台就是他們的垮台，但他們的垮台不等于他的垮台。他既利用这个机关来使其他社会集团循规蹈矩，也利用其他社会集团对于被这个机关夺去的特权既已驯服但又还心怀愤恨的情况来牵制这个机关。历史上的事变创造性人物就是这样巧妙地摆布他所倚靠的各个社会集团，使它們互相牵制，以便取得自由活动机会。那就是他所以能够超出于一个社会阶级的工具，并且超出于一个土匪头目的緣故。那也就是必要时他所以能够残酷地对待他口称代表其利益的社会阶级的緣故。并且也就是他所以能够使他那个机关如意地听从他的指揮，把它倒轉一个方向而不必征求他們的同意，也不怕他們背叛的緣故。因此，他总得努力保持这个机关的圓滑运用，免致发生背离现象的任何障碍，并且在手边保有大量人才，以便随时加以替换。

于是，我們的結論便是：这位英雄如果不去迎合某些社会利益和集团利益——包括經濟的、民族的、心理的等等——他就不能影响历史事变。但他在迎合它們的时候，总得时常設法保持相当程度的自由，好来选择哪些利益是要促进的，哪些利益是要压制和减弱的。大多数历史人物有关政治問題或社会問題的行動都能借助于他們为其代言的那些集团利益而加以解释。但历史上也有那样的人，对于各种社会利益的固有关系不仅要反唇相譏，而且还要采取激烈的反动行为以期彻底地改变这些固有关系。

任何历史人物所扮演的有关社会利益的特殊角色不是从他的自白中所能观察得出来的。他也許自命为某一阶级的利益服务，但实际上他的行动可能是完全另一回事。他也許把自己看作超越于一切社会压力之上，而实际上不过是某一特权阶级的仆役，甚至是一个卑鄙的工具。

因此，便引起了个人意識与历史行动的問題。

*

*

*

許多杰出的历史人物对于他們自己在历史上的事变性地位几乎意識不到，或者仅有一种謬誤的意識。他們总认为：自己的行动是迫

于当前局势的需要，是通过他们而导致的一种命定的结果，而不是出于志愿的行动和理智的安排，从而，就是没有他们的行动与安排，事变进程也不会受到什么影响。即使是真正事变创造性人物如象克伦威尔和列宁也都分别把他们自己看做天意的工具，或者辩证必然性的工具。

翻过来，也有那样的历史人物，他们是降生于事变的浪潮之中，而觉得他们自己是在控制着那浪潮的方向。或自命为对于某种范围以内的事变有所影响，而他们的真实影响其实是在另一个范围之内。关于这一点，有一个特别具有启发性的实例，那就是涅微尔·张伯伦，认为只有他自己才是决定本世纪命运的风云人物。

当1938年慕尼黑条约刚刚签订之后，尽管赞成张伯伦政策的，称颂他；反对张伯伦政策的，谴责他，但一般都是把张伯伦看做一位事变创造性人物。赞成他的人同意他本人的信念，——认为他确是从战神口中夺取了“我们时代的和平”。谴责他的人则相信：在慕尼黑之后，没有任何西方强国能够阻止或者愿意阻止希特勒向东方进军。至于能对当时局势做更冷静估计的，却是为数极少极少的。

尽管我们明知慕尼黑条约没有给我们这个时代带来和平，但它的真正历史意义却还隐藏在暧昧之中，那要决定于我们对以下问题怎样答复：如果张伯伦和达拉第——他是勉强追随于张伯伦之后的一——不是飞赴慕尼黑和希特勒讲和，而是向他送递最后通牒的话，事情将会是怎样的？在这种局面下，希特勒是否会向苏台德区进军，正如后来他向波兰进军一样，尽管当时俄国方面还未向他保证不开辟第二战线？假如他果真向苏台德区进军，那末，在紧跟着的战争中，英法两国是否能比战争迟一年爆发时的情况建立更好的防御？当时，捷克的军事力量是否会比经过一年所赢得的补充军备具有更大的价值？——甚至到1939年时，那补充军备也还是不怎么充分的。如果战争爆发在1938年，那末，在当时还广泛地主张和平的美国能加入战争以前，英国是否会遭到侵略？如果战争爆发的话，那末，英美两国的大多数的和平主义者集团和孤立主义者集团是否能够看穿

希特勒口称为那“可怜的苏台德人”(无疑,那里的德籍居民确是多于捷籍居民)的利益而着想的詭計?

由于我們手边沒有更多的資料,我們不能回答这些問題,但以下这个問題却是能够回答的:张伯伦的有条件投降是否仅仅迫于沒有准备和不可避免的摊牌而促成的一种延緩策略?这件事并不难弄清楚。假使正如张伯伦的拥护者所主张的:他的历史性决断果真是由此而促成的;那末,他的政治家地位便大大提高了。假如这是真的,并且假如軸心国家也因此而失敗了,历史学家便不难把张伯伦品評为那一世代中最伟大的事变創造性人物之一。但这并不是真的。正因张伯伦一再強調和平已得到挽救,他自己就已提供了証据,說明他的决断并非以企图获得喘息時間以求加强准备为其动机。即使由于慕尼黑事件而贏得的一年喘息時間为最后胜利所必需,张伯伦事先也沒有做这样的打算或准备。即使借助于有利的結局,他也决非好运道的設計者,而囿于他自己的恐惧心理,和为他的自以为是所遮蔽,他最多也不过是这个好运道当中的一个幸运的偶然因素而已。即使后来自由世界的历史学家目睹1938年获得的一年喘息時間使得英国幸免于遭受法国在1940年所遭的命运,而在他們的著作当中互相道賀这一幸运事件,张伯伦的判断也还是千錯万錯的。因此,我們最多只能把他看做一个事变性人物,而絕非事变創造性人物。

究竟张伯伦的意識上对于他自己的历史作用怎样陷于幻想的錯誤,可由1938年10月6日他向英国众議院所做的令人难忘的讲演中明白地看出来。他率直地宣称:当时,究竟是战是和完全决定于他,而且仅仅决定于他,并且強調是他的决断消灭了当时战争的阴影。

“任何人,只要他象我一样,一天天地和面对面地在头脑中反复寻思:作为最后手段,还得借助于我,而且仅仅借助于我来說出那足以影响我国同胞和他們眷属千百万人命运的‘是’和‘否’——任何人只要这样寻思,便难忘却……一个人达到我这样的年齡,处于我这样的地位,只要他的良心对于自己所做所为

問心无愧，他便会觉得任何加在他头上的謾罵都无妨置諸度外。回忆所有的那些事变，我颇为自信……任何人处于我的地位也只能这样做。我指的是：我的行动确曾防止了战争。”

一位民主国家的政治家竟能坚决自信并且公然宣称：他的祖国的命运决定于他的一句话，对此，我们只好说他是在冷静地思考吧！但比这更重要得多的是：张伯伦的政治上的天真，竟至认真地怀抱这样一种看法：那自从希特勒当权之日起就已在酝酿的战争，却竟能由他来一手遏止！

一旦法西斯主义业已巩固了它的国内地位，那一群爱好和平的政治家无论如何努力也将制止不了战争的爆发，因为这时战争是由：经济需要、盲信的意识形态和强烈的沙文主义三者交織在一起的一种奇特的组合物而产生出来的。希特勒在当政以前就已不再隐瞒他的各种意图，而在他当政以后，他的每一个步骤都在显示：德国正在准备走向全面战争的装备。这时和他谈判的唯一结果，最多不过仅能取得日历上的胜利——就是说迫使他改变时间表。这一点也可能十分重要，但是仅仅关系到战争爆发时各国武装力量的鲜明的对比。一位政治家，他幻想借助于一个条约、一件备忘录、或者任何除了全部投降之外的让步就能使那紧张到极点而正待爆发的压力得以松弛，那不过显露出一个小城市政治家的鼠目寸光而已。

世界上往往有种局势不是任何英雄人物所能掌握的。这种局势的来临有如排山倒海的怒潮，任何潜在的事变创造性人物，或者他的徒步的追随者都无法加以遏止，虽然他们可以乘着这波浪前进而使情况有所不同。这种局势一般是发现在那长期危难和压迫之后，譬如象大革命的天翻地复情况。但也发现在两个强国争雄之时。这时，两国的处境是这样的：主要的贸易通路，它们可以通达的市场，以及原料的资源与供应尽都操纵在一个国家之手，以致任何一面或双方面都有不能安全共处的感觉。历史上许多次战争爆发前夕的情况：由罗马与迦太基的对立一直到德意志帝国威胁英国海权和日本企图独霸整个太平洋为止，无不如此。总而言之，每当双方面的利害关系

在心理上达到绝对对立的情势，一方面的满足必得排除另一方面的生存，没有任何共同利益可以作为妥协、同情和参酌的根据。这时便已到了大难临头无可幸免的局面。这种灾难向社会冲击，有如自然现象中的洪水、大火、地震、山崩将会不分智愚、不分邪正地葬埋一切。

但也有另外一种情况，一个天才人物（不论善恶）遭逢其间，能够给人们和事变带来深厚的影响，这时，他便成为一个事变创造性人物。但这种情况和这种人物究竟是否存在是颇难加以证实的。在下一章里我们将要研究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作为上文业已概略论述的理论观点的重大检验。我们将要说明：在我们这个时代中，至少有一位事变创造性人物，确已重新决定了历史进程，而在这样做的时候，也已影响到了地球表面上大多数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的生活。

在我们进而证明：当今时代至少有一位事变创造性人物以前，应该稍稍谈一谈妇女在历史上的作用。到此为止，我们主要还是讨论历史上具有事变性或事变创造性的男子。那末，妇女的地位又怎样呢？历史上是否无可怀疑地有过任何事变性或事变创造性的女子呢？她们总是在我们周围的，但在决定世界大势上，她们究竟起着什么作用呢？

人们公认为最重要的四位女子是：克里奥佩特刺（Cleopatra）、提奥都拉（Theodora）、彭帕杜尔夫人、和俄国的叶卡特琳娜二世（Catherine II）。②

在历史上一切事变性的妇女之中，克里奥佩特刺要算是最带传奇式的，但她对于历史局势的影响却被大大夸张了，而她本人则成为浪漫神话的主题，而这些神话尽管不愧为伟大的诗篇，却是蹩脚的历史。自从巴斯噶（Pascal）在他所著的《思想录》（《Pensées》）上给她做了短短的评论之后，她便成为世界历史决定于鸡毛蒜皮等等琐碎细节的永久例证。“假如克里奥佩特刺的鼻子生得短了一点，世界的

② 我们在批评普列汉诺夫的时候，已经谈及彭帕杜尔夫人，这里不再赘述。

整个儿局面将会随着而完全不同。”不錯，巴斯噶的話曾經刺激人們對於历史的性质頻頻做了重要的思考，但他所采用的例子却是很不幸的。破坏一个动听的故事似乎是一件憾事，但真的故事也許正是同样有趣呢！

如果就我們所知有关克里奧佩特刺的事迹和时代做一个恰如其分的評价，那末，她的鼻子的长短，对于她在那更年輕的庞培、愷撒和安东尼等人身上的影响是不发生什么联系的。而更为重要的，是她对于他們的影响，就世界历史來說，是作用极小的。不錯，她确曾給予安东尼的生活以很大的影响，但她对于羅馬帝国的历史則作用很小。愷撒無論如何总会庞培取得胜利；屋大維(Octavian)和安东尼可能必須解决对于愷撒衣鉢的继承問題，可是即使安东尼能够避免克里奧佩特刺的誘惑，胜利的优势似乎还是操在屋大維手里。促使这几个羅馬人来到埃及的动机是由于紧急的政治斗争以及为了当时严重的农业衰落，有必要把这块天然享有尼罗河灌溉之利的地方保持作为意大利的谷仓。虽然在埃及自然地改进了他們的机会，但即使沒有克里奧佩特刺，羅馬的历史本质上还会是一样的。

正如历史上扮演过某些角色的大多数妇女一样，克里奧佩特刺对于历史的作用也是通过她对于男人的影响而达成的。而正如对于事变性男子曾經发生过影响的太多数妇女一样，克里奧佩特刺所以获得成功，与其說是由于面容生得俊秀，不如說是由于她所具有的聪明、毅力和个性，以及不决定于面容或形象的一些曖昧的吸引力。她似乎是生得娇小玲瓏、标致优雅，但据传记家普卢塔克(Plutarch)告訴我們說：安东尼的妻子奧克塔維亞(Octavia)在年龄和象貌的条件上都比她胜过一筹，但安东尼竟抛弃了奧克塔維亞而热恋着她。根据我們可以利用的史料，即使克里奧佩特刺的鼻子生得更短一些，那也不会减低她的迷人魅力，因为这个变化和她的敏捷任性的脾气是更相和諧些。^①因而，巴斯噶所提出的著名問題就她对男人的影响方面便得到了解答。可是，假如她是个丑八怪的話，世界的历史是否会因之而不同呢？恐怕未必！

克里奥佩特刺并非一个馳名的妓女，而是一个具有狂妄野心的狡猾政客，她为了保持她的帝国独立而打了败仗。如何保持帝国的势力乃是她一切政策的固定不移的原则，她对此有着至高无上的忠心，远胜于对他的任何恋人。任何能以拯救她的朝廷的人，她都情愿跟他讲恋爱。她曾抛弃了安东尼，并于阿克条姆(Actium)战役之后，哄骗得安东尼落到自杀的下场。她曾打算勾搭屋大维，如果不是他性情非常冷淡的话，也许勾搭上了。斐洛洛(Ferrero)以及其他历史家都曾暗示：她曾鼓励恺撒做那世界帝国的好梦，以便为她自己赢得寰球皇后的尊号，与恺撒并肩来治理天下。但这种说法，不见得合乎史实，因为恺撒早有政治野心，除了等待机会而外，一无所恃。克里奥佩特刺正是恺撒个人的弱点，而不是他的政治指导者。恺撒则是克里奥佩特刺的政治保护者而不是她的浪漫情人。无论如何，刺杀恺撒以及熟悉他的处境和他所受影响的人们，并无心来危害克里奥佩特刺——这是可以断言的。而当恺撒被刺身死时，她正和他同居在罗马，假如她对于恺撒登位罗马帝国皇帝的野心确曾有所鼓励的话，他们对于她绝不会全无举动。

正如有关克里奥佩特刺的情形一样，关于提奥都拉的事迹，我们也是得自对他怀有仇恨(或至少不予同情)的史料。不过，即使我们必须得把因她触犯正教而对她怀抱恶感的那些宗教狂信者所加于她的诋蔑打个折扣的话，关于她的早期生活的主要事实还是无可怀疑的。她生于一个以表演马戏为业的家庭，她本人是一个职业舞蹈家和演员。在拜占庭时代，那也就是另外一种职业的标志。由于她表演得下流无耻，和捧角者忒多，因而不到二十岁时，她就已成为台上台下的红人儿了。在各省巡回表演了一个期间以后，经过一度宗教信仰上的改

① “因为她的实际的美貌，本身并非那样显著，——即是说，她的美貌并不是倾城倾国，没有人见了她会不动心的，——而是说：如果你和她生活在一起，只要一接触到她，便会感觉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她的风度宜人，谈吐嫵媚动人，以及伴随着她的一切言行的那种个性，在在具有迷人魅力。”——引自普卢塔克原著。

变，她又回到君士坦丁堡，在那里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究竟她怎样遇到查士丁尼皇帝，我们不清楚，只知他俩相遇时，他已到了成熟年龄。并且知道：他对她的爱情是非常深厚而纯洁的。当纪元后527年，他不顾一切惯例，把她封为皇后。此后，她似乎曾和他过着一种值得作为模范的生活。她并且改邪归正，献身于善举。她所最为关心的就是贖救那些淪落风尘的妇女。据说，她曾把婚姻法和离婚法加以改革，使之有利于女方。她热心于替人做媒，并且鼓励和援助受虐待或婚姻不圆满的女子，使她们从别处寻求补救与安慰。整个儿来说，除了爱慕她的查士丁尼之外，她对于任何男性全无好感。就连查士丁尼，她也把他看做一个傻瓜。

提奥都拉所以具有历史意义，由于她握有无上威权。查士丁尼对她十分溺爱，几乎言听计从，百依百顺。在一个十分残忍的宗教狂热的时代，她竟能照顾严重的异端教派，并为他们热烈地辩护，为反教者的权利而斗争，罢免了一个教皇，使另一个教皇服从她的意旨——而所有这些举动都是不顾查士丁尼的面子而做的，因为他自称信奉正教。她有权颁布军事命令，干涉附庸国的内政，任免朝中高级官吏，并且平定叛乱，保卫了查士丁尼的皇位。一句话，她表现出她自己是拜占庭一系列统治者当中最为敏锐的政治家。作为一个女子，她具有迷人魅力，但据她同时代人的想法，都认为她是优雅胜过标致，而且她的胆量、聪明和敏捷给人以最深刻印象。但只有查士丁尼把她看做十全十美。“在十分重大的问题上，查士丁尼喜欢听从他这位爱妻的劝告。他赠予‘上帝配给他的这位最可敬爱的妻子’以‘最甜蜜的爱恋对象’的爱称。”①

尽管提奥都拉握有无上威权，但我们至多只能把她看做一位有可能成为事变创造性人物的女子。她所维护的异端教派，在她死后几乎没有什么发展。帝国的国库由于种种荒唐的挥霍而破产。假使她能有一位家庭主妇的节俭习惯用在皇家经济之上，她的影响可能

① 参看狄尔：《拜占庭画像记》，英译本，1927年纽约版，第6页。

更长远些。查士丁尼的帝国在西方崩溃，而且在东方的“蛮族”还未入侵以前，老早就一天天衰败下去了。以提奥多拉的地位而论，她无疑能够影响查士丁尼使他先推行重新征服西方国家的政策。如果她这样做的话，天主教教皇制度在西欧所发生的作用也许会完全两样。只是根据她本来能够做到、而事实上却没有做到的事情上，我们才把她看做一个事变创造性人物。所有她的积极成就对以后历史很少有什么影响。

在现代的事变性妇女当中，最为突出的也许要算叶卡特琳娜二世——这位“属于德国血统，而受有法国文化教养的俄国女皇”。由于她和其他事变性的君主（如象腓特烈二世）处于同一时代，而且资产阶级革命的风暴早已在西方发生，所以她的影响是很难估计的。不过不管怎样说吧，应由她主要负责的那种种业绩都足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由于她的努力，俄国才能在西欧政治史上留下了一个羽毛丰满而为时长久的影响。我们在考虑几个先进国家的历史时，是不能把她置之度外的。马克思曾说，俄国对于十九世纪期间西欧的革命发展有着最反动的政治影响——而这种影响就是叶卡特琳娜政策的继续。在叶卡特琳娜统治之下，俄国大大地扩展了她的国境。她替俄国增加的领土几达 250,000 平方英里。同时，尽管她具有开明的理想，却把农奴的枷锁牢牢地加在俄国人民的身上，而使得进步社会力量的发展停滞了好几世代。她以伟大的政治敏感把教会财产转为俗用，并使俄国的教会紧紧地依附皇室，而从此之后根本上成为朝廷统治的工具。

不管我们怎样评价吧，她的成功还是大有可观的。那末，她究竟凭借什么品质而取得这种成就呢？当然不是由于她的美貌以及女性的其他魅力。她的美丽并不足以系住她丈夫的心，结果，为了打开她自己的出路，而把他废黜并加以杀害了。她虽然也不否认她的多情的天性，需要男性的慰藉，但她决不允许她的任何宠幸来改变她的既定政策：即为了巩固一个强有力的民族国家，为了国家的利益而追求一个独立自主的道路。为了成功地实现这个政策，需要杰出的政治

才能，特別是就她的地位而論：原是一個異國國籍的婦女，來到俄國時，與皇族全無任何親故關係，而後竟能奪取皇位，並且須得繼續提防一系列自稱有權繼位而陰謀向她奪位的人。而叶卡特琳娜特富於這種政治才能。她並且選用了若干能人作為她的顧問和官吏，但他們都得完全順從她的意志。她雖然也是個多情女子，但卻沒有男性的幸臣侍從她的左右。她作為一個歷史人物而具有的事變性，是由於她具有無比聰明的政治天才。

但有一點須得注意的：即就她的國內統治的範圍而論，在任何一點上，她也沒敢違背那封建大地主的利益，在她的青年時期，沒有理由懷疑她也曾贊助過孟德斯鳩、貝嘉利亞(Beccaria)、以及法國百科全書派的理想。她之所以放棄這些進步的社會理想，那是由於她覺察到：在俄國並沒有任何強有力的社會階級來支持反對大地主利益的經濟改革。因為她不能改變現狀，於是轉而不惜犧牲農民的利益來強化現狀。如果沒有她的話，俄國農奴的解放也許會更早地實現。雖然她的活動自由受了局限，但她似乎還是一個事變性的女子，確是“身上每一寸都配稱一個‘政治人物’，為現代史上任何女性的傑出人物所不能匹敵的。”^①

① 霍溫：《劍橋現代史》第6卷，英文版，第701頁。

第十章 俄国革命：一件 用来检验的事例

本章的主题是：如果不是由于一个人的工作，我们今天就会生活在一个大不相同的世界里。

这个论点分四层来谈。第一、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紀中仅次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重大的事件。我們說它“最重大”，是因为这场革命对世界的政治、社会和經濟史的影响，比其他任何事件的影响都要大。第二、俄国革命不是不可避免的。第三、革命的胜利是由于列宁的直接领导，沒有他，革命就会失敗。第四、要是沒有俄国革命，全世界的文化、政治和一部份經濟生活就会大不相同。

一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消灭了沙皇制度，向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形式前进了一步。这次革命不是有计划的，但是在历史上却不是意外的。1917年的十月革命消灭了政治上的民主，代之以少数派的独裁。这次革命是有计划的，但是在历史上是意外的。

这种好象諛論的现象是容易解释的。日俄战争爆发之后，除了在宫廷中領年薪的人和一些反动份子以外，所有政治集团都随时期望通过一次“二月”革命，见到君主专制的垮台，可是直到十月革命实现前的十个月，也还没有人梦想到一次“十月”革命会有现实的可能性。对于那些后来反对十月革命的人，这固然不用說了。就連完成了革命，相信无产阶级专政是历史必然性的布尔什維克們，也沒有察觉出来，他們的时机来得那么快。他們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信念是一种理論上的和綱領性的任务，是学說的一部分，这种学說作为一种

国际运动(它的最后目标就是世界社会主义)的目标是被认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个伟大的政治战略,和策略不同,不但俄国要照着做,就是世界其他地方也同样要照着做。即使是党内最激进的理论家们,在他们取得政权的短短十个月以前,都还不认为在俄国取得政权是历史日程上的当务之急。

如果需要举出这一方面的证据,我们可以引用布尔什维克领导者所作的估计,他们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将会首先发生在西方高度工业化的国家里。他们至多希望,俄国的一次民主革命会在西方引起一次社会主义革命,这场社会主义革命到时候又会把俄国也带进同样的轨道。而更重要的是,列宁回国以前不久,还在对瑞士的一批青年的社会主义者发表的一篇演说中表明,他并不盼望在他这一辈子会发生一次“十月”革命。如果有什么人提出,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能够在俄国存在下去,就象资本主义世界中的一个孤岛一样,存在下去,这个想法是会被人当作一个笑谈的。

俄国革命的后果是什么呢?关于那些后果是否令人满意,我们不去评判,我们只限于揭出事件之间的客观联系。

第一个结果就是,由于德国的第二战场的消失,第一次大战的时间延长了。俄国革命的榜样和革命宣传的影响,虽然软化了德国国内战线,但是帝国最高司令部求和的决定仍是一个军事性的决定。1918年春天,德国从东线抽调了一些部队,举行了春季攻势,这一次进攻溃败之后,德国就不再有取得武装胜利的可能了。

影响不那么直接,但也许更为深远的是,占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地面从国际经济领域里抽了出去。由于布尔什维克立即实施的对于对外贸易的严格控制,自由竞争的市场被破坏了。不但商品的输入禁止了,而且政府的政策以及外国投资者因为先前的赖债,不愿意冒险投资(在当时的情况之下,这两种情况都是自然的),资本的输入也切断了。在列宁手里,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开始出现的这种倾向,到了斯大林手里,“在一个国家里建立社会主义”已经成为日程上的常务的时候,就更为加强了。俄国脱离世界市场的全部影响,在1929年

到1932年灾难性的危机期間里，是很明显的，那时，在主要資本主义国家中，大量的过剩商品和資本由于沒有出路，积压起来，同时失业和貧穷也相应增加了。大有潜力的俄国市场本来能够吸收大量商品和服务性劳动的，它的关门政策加重了危机的严重性。

布尔什維克取得政权的时候，他們沒有料到，能在西方不发生革命的情况之下保持住政权。而却认为：一旦西方发生了革命，由于俄国生产力处于原始状态，在社会主义的世界經濟里又会落后。为了促进“不可避免的”西方革命，共产国际建立起来了。它在当时和以后，跟苏維埃政权和布尔什維克党的区别，只不过是公文紙上的名銜有所不同而已。

然而，“不可避免的”革命並沒有发生。德国、匈牙利、芬兰和中国曾作了几次努力，强行革命，結果都慘遭失敗。布尔什維克們必須保住政权，或者自动放弃政权。事实証明：馬克思的学說所說的，沒有一个統治階級会自动放弃政权，——对于布尔什維党的专政也同樣适用。承继列宁衣鉢的斯大林，不顾列宁的政治遺教，发出了信号，改变了共产国际的政策。从那时起，“保卫苏联”这个口号（在联合干涉的年代里，曾以此团結过西方工人）一变而成为全世界共产党人进行活动的幕后指导原則。每一个国家的共产党历史都証明了这一点。例如，法国共产党原是极力反对当前这次战争的，后来，它不是在希特勒侵略他們祖国的时候，而是在俄国遭受侵略之后，才改变了它的路綫。同样的事情到处都有。

现在保卫苏联和稳定布尔什維克政权結为一体了。政权的稳定和跟其他国家維持正常关系有密切联系，特別是跟避免国际冲突有密切联系。如果革命运动（这些运动的一部份物质資源和全部精神鼓励都来自布尔什維克政权）要去夺取政权而遭受失敗的話，那些友好关系就容易受到危害。随之而来的斗争和反应也許会引起十分可怕的战争和干涉，那就会打断“社会主义”的建成。因此，苏維埃的統治者有鉴于国防的需要，和扩大国家經濟的需要，在保障和平方面，特感兴趣。另外，他們还以維持一切資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现状为己

任，因为破坏现状就会引起国际冲突。如果苏维埃政府认为某一个外国的干涉阴谋没有什么可怕的，或者认为可以用贸易或政治条约来把那些阴谋转移，它就一定急于和那个国家建立亲密关系，不管它是集权主义的意大利和土耳其，或者是民主的法国和英国。假如有什么差别的话，那不过由于早年的历史，它对英、法比对意、土更具戒心罢了。甚至在法西斯主义已在德国上台之后，尽管希特勒公开宣布了他对俄国的政策，布尔什维克政权在履行它的一切条约、协定和贸易协定上仍然是兢兢业业的。实际上，它跟希特勒续订了一些旧的条约，又签订了一些新的，并非它不怕希特勒的坏心眼，而是为了避免触怒希特勒，他的言行已经表明了他是不愿等人来触怒的。

布尔什维克政权除了习惯于维持外国的现状之外，同时又急于让各国共产党在那些国家中活跃起来。布尔什维克学说有一条原理：资本主义列强任何集团之间的分歧，比起苏联和所有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分歧来，算不得一回事。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和法西斯国家之间的明显差别被认为是表面现象。法西斯主义本身被描述为金融资本主义时代民主主义发展的最后的和正常的状态。因此，按照布尔什维克学说，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互相攻击，而是任何一个或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会进攻苏联，这是经常存在的一种危险。为了防止终于引起这种可怕的不测事件；为了一旦果真有事时，取得有力的、占有战略地位的同盟者，就必须加强各国共产党，作为基本的保证。象布尔什维克所设想的，这意味着它们必须在一切国家中取得社会主义和劳工运动的领导权和控制权，不是为了进行革命，而是根据苏联利益的需要，直接和间接影响那些国家的国策和外交政策。为了作到这一点，他们必须消灭或支配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的、劳工的、甚至民主自由派的团体。

布尔什维克在俄国以外所取得的最大胜利，不是推翻任何资本主义国家，而是破坏一切国家中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的团结，使属于共产国际的组织能取得立足点。他们有时候，用内部进攻和著

名的特洛伊木馬的策略，有時候用公開分裂和組織平行的政黨與工會的办法，來達到這個目的，有時候雙管齊下。實際結果就是削弱了抵抗國內反動派的力量，特別是抵抗受到日益得勢的法西斯影響、堅決和蘇聯為敵的大資本家、地主和失掉財產的中產階級的力量。

在這方面，意大利和德國的情況特別具有教育意義，因為它們反映出布爾什維克政權對西方工人階級影響的兩個階段。

列寧還活着的時候，布爾什維克們就希望強迫那個“不可避免的”無產階級專政在西方出世。但是要強迫，就必須取得領導權。因此，他們就放棄了那種在他們國內所行的策略的明顯靈活性，而在所有其他國家，根據他們自己的歷史經驗，另行規定了一套教條主義的行動方案。這就是說要打垮現有的、採取不同政策和方針的一切社會主義運動。在意大利，正當墨索里尼的信徒們（雖然他們的力量還很弱），準備向勞工和意大利的民主總攻的時候，強大的、富有戰鬥性的意大利社會黨，由於共產國際的活動，而解体了，分裂了。

列寧的策略，在俄國國內和國外，特別是在對付其他一些工人階級集團（比起它們來，布爾什維克是少數）的時候，都是從革命黨的性質這個概念出發的。他不可能拋棄這個概念，除非是放棄了布爾什維主義的主要原則，即：布爾什維克黨對無產階級的專政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先決條件。^①

西方的革命遭受了一連串失敗之後，布爾什維克轉過頭來在俄國建設社會主義，把共產國際變為實現這個目的的一個工具。現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發生的一次革命，即使是在非布爾什維黨的贊助之下，用和平方式完成的，也會成為一件麻煩的事，因為它會引起內戰、反革命和國際衝突的危險。在德國，從1928年起，布爾什維克用一種超級革命的路綫來打扮他們自己，但卻集中了他們大部精力打擊其他工人階級黨。他們宣稱，真正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主要敵人”

① 欲知其詳，請參看拙著《理性、社會神話和民主》，1940年紐約版，第7章和第8章。

是德国社会党。他們把德国社会党的領袖和成員叫做“社会——法西斯。”在重要关头，德国共产党和納粹共同行动，反对魏瑪共和国。甚至在希特勒上台、宣布共产党非法以后，共产国际还譴責德国社会党是工人階級的“主要敌人。”^①

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这个路綫改变了，当时希特勒的战争意图，甚至在克里姆林宫看来，也是十分清楚的了。新的转变开辟了人民陣綫的阶段。人民陣綫是一个和平陣綫，提倡集体安全，要求冻结现有的欧洲各国边界，号召制裁把军队派出国境的任何国家。人民陣綫打算包罗任何团体，不管它的社会綱領怎样，只要它接受这个綱領就行。在这一时期，在所有的人民陣綫里面，全世界的共产党都站在联合陣綫的最右面，反对任何足以危害民族團結的社会变革。在法国，他們跟保守的激进社会党站在一边，反对社会党。在英国，他們要求劳合·乔治(Lloyd George)的自由党和英国工党在政治上联合起来。在西班牙，他們站在共和党的右面，尽力反对社会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提出来的、会侵犯财产私有權的社会改革。过去是超級革命的共产党人，现在却害怕小小的社会改革也会引起国内的反对，造成混乱了。这就加强了希特勒的力量，把民主的英国和法国也推进希特勒的陣营。由于同样原因，这一时期，英、法帝国以內各殖民地的共产党爭取殖民解放的斗争也削弱了。

1939年，这个路綫又改变了一次，当时，由于斯大林和希特勒签订了协定，他认为希特勒会向西进，并且呆在那里。于是“金融寡头的西方民主国家”又成了主要敌人 and 应该一脚踢开的战争叛子。克里姆林宣称，法西斯主义只不过是一个政治趣味問題罢了。

1941年，斯大林不得不又一次倒轉过来，因为希特勒逼得他没有別的办法。布尔什維克的教条說一切資本主义国家——他們仍然认为德国是一个資本主义国家——彼此之間，比起任何一个資本主义国家跟俄国之間，有更多的共同之处，这种說法証明是破产了。可

① 1933年6月1日的宣言。

是付了多么大的代价啊！

必須記住，布尔什維克控制国际工人运动及其自由派联盟者的做法，不是列宁和斯大林玩的政治魔术。它是以列宁和斯大林分別闡述的世界革命和苏联的需要与利益为根据的。列宁和斯大林认为他們自己就是那些需要和利益的唯一的代言人。列宁认为，沒有必要的認識和領導（这种本領只有布尔什維克才有），革命是注定要失敗的。斯大林认为，如果属于共产国际的各个組織要有左右他們政府对苏政策的政治力量，布尔什維克对外国群众的領導权是很重要的。布尔什維克的領導在两个阶段中，在大多数国家里，都引起过爭論，部份是因为它采取的統治方法或破坏方法，主要是因为社会主义者、工联主义者、民主主义者拒絕在国内問題上接受外国代理人的命令——尽管这个外国具有社会主义的称号，实际上它却是不折不扣的少数党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布尔什維克虽然在爭取領導权方面沒有成功，但是在分散和削弱反法西斯主义的力量方面，却到处都获得輝煌的成就，只有在奥地利是例外，因为在那里，陶尔夫斯（Dollfuss）和許士尼格（Schüssnig）手下的天主教法西斯分子已經把那份任务承担过去了。

尽管布尔什維克为了保障和平，放弃了世界革命政策，西方国家中大部份保守的有产者集团仍然害怕苏維埃政权。早些年前俄国革命的記憶犹新。随着經濟危机的加深，他們看见本国一部份工人当中尤其是知識分子当中，对苏联的好感，逐步增加，而深感不安。几个五年計劃期間，大力宣传的生产潜力的增长，对于生活水准越来越低、觉得安全的諾言比自由更好的人們，起了示范性的影响。在国内，随着生产指标日益下降，騷动、示威、不断加剧的紧张局势和日益尖銳的冲突吓坏了銀行家、工业家、地主和他們的政客与論客。

在德国和意大利，把法西斯捧上台的就是这些集团。不論墨索里尼还是希特勒实际上都不是在公开斗争中贏得政权，这一点是要反复申述的。政权是那些有势力的保守集团奉送給他們的。那些“上流人”在法西斯主义身上看见了代替布尔什維主义的不二法門。这

种情緒是帶有普遍性的，并且說明了墨索里尼不仅在英国受到支持，甚至在美国也受到支持的原因。摩根家族的湯瑪斯·拉芒特在意大利法西斯政权搖搖欲墜時給了它一笔貸款，救了它的命。工业家們称贊这种行动是“雪中送炭！”美国教授会的領袖人物伊尔文·白璧德說：“总会有那么一天，我們會认为我們走运，如果我們能找到一个美国的墨索里尼，我們也許需要他来把我們从一个美国的列宁手里搭救出来。”^①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公开的有組織的法西斯分子以外，只有这些集团相信共产国际的宣传口号——“要么是共产主义，要么是法西斯主义”。

布尔什維克可能会侵入西方，这种可能性即使象神話，却是可怕的。但是，毫无疑問，比这个更有影响的則是資本主义的沒落，以及无法象从前那样，很快就从萧条的深渊中自拔出来。失业和貧困这种明显的事实迫使現存的政府采取措施，那些措施似乎威胁了有产階級保守集团的傳統地位、特权和收入。于是它們就准备让危机“正常地”自流下去，那就是說，拿那些最倒楣的人作牺牲。它們厌恶賦稅，厌恶社会福利的立法，也厌恶并不触动利潤制度的結構，只企图重新分配經濟負擔的、那种有节制的資本主义的一切折衷措施。

在魏瑪共和国时代就已經开始的、雷厉风行的整頓社会秩序的运动，也許会引导到某种类型的民主社会主义，但是由于工业家和容克貴族們的强烈反对，凡尔賽体系的束縛，社会党人的怯懦和目标的模糊不清以及布尔什維克在劳工运动中所进行的越来越剧烈的內部斗争，这条路被切断了。

就在經濟灾难和政治癱瘓交織在一起的形势之下，法西斯主义者，带着送給各阶层人民的礼物和諾言，出場了。喘息在公务和租稅重担之下，給罢工和所有大城市街头上演出的小型內战弄得焦头烂額的胡根堡們、蒂森們和兴登堡們欢迎法西斯主义者，希望他們能“一劳永逸地”恢复秩序。他們见过无数的总理上台下野，所以他們

① 參看《民主与領導》，1924年紐約英文版，第312頁。

心想，等到秩序恢复了之后，法西斯主义者或者会因为身負統治之責，或者因为怕被他們借以取得政权的同一个机构加以撤职而变得清醒一些。等到他們把国家“从布尔什維主义的手里”拯救了出来之后，军队无论如何总会使得他們就范的。可是法西斯分子一上了台，他們就打碎了使他們当政的那一套机构，把军队政治化了，把工业家和他们们的工厂也变为一种为总体战争而服务的经济了。

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和統治者以后，事情就朝着以武力解决欧洲经济和政治问题的方向飞快前进。正如希特勒的国内政策受到害怕布尔什維主义的保守派的支持一样，他的以消灭俄国为走向世界霸权第一步的国际政策，也受到全世界保守的和反动的集团的支持。互相冲突的民族利益当然起了作用。总的說来，西方保守派对罗马型的集权主义比对納粹型的集权主义更有好感。但是作为一个集团，他們竭力阻止反对希特勒的有力行动，終至放虎归山。

常常有人认为，法、英統治階級精心策划的政策，就是存心要牺牲波兰、巴尔干諸国，特别是俄国，鼓励德国东进。这种論調是給苏德协定打掩护的，1939年的苏德协定解除了希特勒的后顾之忧。它没有什么道理。德国军队在任何地方得胜都絕不会消除法国对德国的猜疑。而到了德国东进抵达俄国边境时，英法两国馬上就对德宣战，这就是个有力的反証。当然，它們宣战并不是为了救波兰和俄国，而是为了自救。为什么它們那么晚才醒悟过来，才懂得希特勒威胁它們，它們必須自救呢？它們对法西斯主义的錯誤估計，它們不愿意阻止希特勒的兴起和德国的重新武装，都可以用恐惧心理来解释。它們认为除了法西斯主义的褐色浪潮之外，就只有布尔什維主义的紅色浪潮，別无其他出路。尽管这种恐惧毫无根据，影响却不小。对布尔什維主义的恐惧，使它們在1933年1月，兴登堡出卖魏瑪共和国的那个不幸的日子以前和以后目瞪口呆，神志不清。直到希特勒操起刀来要去宰割波兰和波兰背后俄国的时候，它們才明白，那把刀子也是对着它們来的。

一旦希特勒把德国变成一个法西斯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就

只是時間早遲的問題了。象我們今天所看見的这个世界，在一个世代以前，好像是威爾斯式的幻想，现在却成了一种历史现实了。

那末，把論題的第一点總結一下：俄国革命引起三个系列的事件，这三个系列事件結集起来，促成希特勒的胜利：

(1) 俄国从世界經濟領域里抽了身，留下一块死地方，不能再从其他国家吸收貨物和勞務。这就加剧了經濟危机，这种經濟危机無論怎样都会发生的，但是也許不会采取那末猛烈的一种形式。它使得希特勒能够从那些遭受这种危机最严厉打击的人們当中組織他的群众。

(2) 勞工运动的遭受破坏，如果德国勞工运动象在保皇主义者卡普(Kapp)起事时代那么團結一致，它就能立时制止法西斯主义，或者至少进行坚决抵抗，把德国拖得象西班牙那样筋疲力尽。

(3) 害怕布尔什維主义，害怕把布尔什維克的方式强加于西方。这就使得德国的反动集团要求希特勒当政，并且說明其他資本主义国家的反动集团何以对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眼光短浅地漠不关心。即使沒有俄国革命，希特勒运动橫豎还是要出現的，不过它不会取得胜利。德国最坏的另一前途或許会有一个反动时期，类似历史上几次保守的退轉。但是，到了一个时候，資本主义特有的危机无法克服，一个保守政权可能就不得不为經過几次失敗而受到教訓、得到加强的德国社会民主主义开辟道路，不然的話，就得被迫去和公开反抗的德国占压倒优势的人民群众作斗争。

二 和 三

不管我們怎样估計俄国革命作为以后欧洲发展原因的意义，我們总得碰到这样的主张，即十月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关于这一点，“不可避免”这个詞儿的含义是模糊的。甚至使用这个詞儿的人們也不是指的它的本意。他們指的是：假定有了那些社会的和經濟的先决条件，十月革命在一切有关的历史可能性中是最有可能的。这是列宁主义派的正統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然而这种看法又是可以跟

他們的政治綱領分开，单独来加以堅持的，并且当然需要加以研究。

不承认俄国革命就俄国社会和经济发展情况来看是不可避免的，就蕴涵着相信另外一种因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这种因素，根据我們的假設，就是一个事变創造性的人物——列宁。贊成不可避免性的人們承认，列宁的出现，就十月革命的日历来說，也許是必要的，但是为了跟他們的一般历史哲学取得一致，他們断言，即使沒有他，“革命迟早是一定要来的。”我們既然根据以下的理由否认了俄国革命的不可避免性：即一个事变創造性的人物决定了問題，而且沒有他，事情就会大不相同，对世界会有深刻的不同影响；那末，我們就把我們論点的第二、第三方面合起来考虑。

俄国革命在历史上是不可避免的这个論点依靠两个主要方面的証据。第一方面是材料的累积，这些材料表明，俄国虽然主要是个落后的农业国，它也有高度发展的工业和一个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俄国农民对于土地的长远需要，战争造成的工业脱节、普遍存在的厌战情緒，政府机构的解体引起了一种革命形势，这种形势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前夕变得越来越尖銳。然而革命形势还不是革命。为了革命还要有一个政党。于是第二方面的証据就被提出来了。这方面的証据在于証明：布尔什維克党，而且只有布尔什維克党，具有适合俄国广大人民群众需要的正确綱領。革命形势和党加在一起，就使得十月革命成为唯一可能的历史出路。

即使以上的說明没有什么可以辯駁的地方，結論还是缺乏邏輯根据的。历史上另外的时期也有一些情况，給我們証明，一个革命形势和一个革命的党，再加上观点也“正确”的一个綱領，結果仍是一场失敗，例如，1923年的德国就是如此。要說只有布尔什維克党才有能适应形势的綱領，那也不尽然。布尔什維克的綱領实际上是按照那时社会革命党的正式綱領拟訂的。^①

① 作为参考材料，請看切尔諾夫：《俄国大革命》，耶鲁大学出版社1936年英譯本，特别是第19章第392—402頁。这里应该再說一下，这个党的左派在十月里加入了布尔什維克。

最大的不同之处是，社会革命党的綱領始終只是一紙決議，临时政府和苏維埃里的社会革命党的代表們一点都不重視它，而布尔什維克党却实行了他們的綱領。

以俄国的形势來說，應該认为十月革命是布尔什維克党的工作結果；布尔什維克党是以滿足俄国群众对和平、土地和面包的渴望为其主要政治目标的。当时的主要問題是列宁跟布尔什維克的关系問題——对党的綱領、战略、策略、行动意志的关系問題。在我們进行研究以前，我們應該看到，在以夺取政权为結局的全部事件中，布尔什維克党的領導作用，实际上是誰都不否认的。成問題的只是布尔什維克党对于俄国人民群众惶惶不安的情緒，究竟起了何种程度的影响。典型的右派历史学家米留珂夫(Miliukov)认为，布尔什維克加以巧妙利用的群众情緒主要是由他們的宣传鼓动造成的。典型的左派历史学家托洛茨基則认为布尔什維克始終落在工农情緒的后面。代表中間派說話的克伦斯基断言，那种“根本不相信当局的心理”主要是科尔尼洛夫在米留珂夫的朋友們贊助之下，企图发动的政变在群众当中搅起来的；其余的全是布尔什維克包办的^①。不过不管俄国群众的情緒是怎样激发起来的，它并没有成为革命。造成革命的是布尔什維克党的工作。

但是，如果没有尼古拉·列宁，从1917年四月到十月布尔什維克党的工作是不可想象的。凡是熟悉历史内幕的都会发现，那些目标、政策、口号、指导性的战略、每天的策略都是列宁规定的。有时候，他象一位教师教授一个生气勃勃而又慌张困惑的学生那样，煞费苦心地进行劝导。有时候，他发号施令，象一个沒有耐心的练兵的伍长，向新兵們大嚷大叫。但是从头至尾都是列宁。沒有他，就不会有十月革命。下面就是証据。

(1) 列宁是四月三日回到俄国的，四月四日他提出了他的四月提綱，在这以前，布尔什維克党和它的机关报一直是支持克伦斯基临

^① 參看克伦斯基：《布尔什維主义的序曲》，1919年紐約英文版，第277頁。

时政府的。列宁的四月提綱号召用武装起义推翻这个政府，一切权力归苏維埃，这个提綱就象投在他自己的党内的一颗炸弹。

1924年11月19日，斯大林讲到列宁到达以前，俄国布尔什維克党的立场时说过：

那种立场是完全錯誤的，因为它带来和平主义的幻想，在保守主义的磨盘上注水，妨碍对群众进行的革命教育。当时，我也和党内其他一些同志一样抱有那种錯誤立场，只是在四月中旬，我在列宁的提綱上签了名时，才彻底放弃了那种立场。^①

开头，列宁的地位是非常孤立的。他坚决要求立即停止对德战争，他号召“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内战”，这一来激怒了所有的政党。他给了敌人以可乘之机，他们拚命把捏造的“德国奸細”的标签贴在他身上。^② 尽管如此，四月还没过完，列宁就說服了党的执行委员会和党的积极分子。在他回来以前，当地的布尔什維克正在郑重其事地考虑跟孟什維克合并的問題。列宁改变了这一切。他在他自己的党和拒絕接受他的綱領的所有其他工人阶级政党之間划了一条清清楚楚的分界线。

列宁用一套新的目标来武装他的党这一工作的重要意义不难由以下事实来估計：即他的做法本身就含有放弃布尔什維克坚持了十年之久的学說的意味。直到二月革命为止，所有布尔什維克，包括列宁在内，都相信他們所謂的“工农民主专政”。这个政权的任务就是在俄国实现西方民主革命的成就。1917年，列宁改变了他的立场和党的立场。俄国革命一定要成为資本主义世界經济的第一个缺口。它

① 参看斯大林：《論十月革命》，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合作社1934年英文版，第76页。

② 加罪于他的主要根据就是說，魯登道夫毕竟让他在那著名的密閉火車中通过德国而从瑞士回到俄国了！凡有“信仰的意志”的地方，（而在政治上这永远是有的）对列宁的行动可以造出许许多多让人相信的事情，尽管他的行动是在全世界人們的眼前采取的。要是列宁在1938—1937年期间还活着的話，可能也会有足够的証据在那时的“莫斯科审判案”中判定他有叛国罪。

一定要成为一种“无产阶级专政”，这种专政会在西方引起同样性质的专政，共同促进向世界社会主义的过渡。

列宁的反对者预言列宁的纲领不会缓和俄国人民对和平、土地和面包的渴望；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会在欧洲无产阶级专政之后出现；内战和混乱会使俄国糜烂；代替沙皇的官僚地主专制制度的，将是一个更残暴的布尔什维克的官僚制度。列宁不顾党内外一切批评，排除困难前进，毫不让步。

(2) 一旦列宁说服了他的党采取了以内战和武装起义来反对临时政府的纲领，主要的任务就清楚了。那就是选择适当的动手时机。直到那时为止，为了进行推翻临时政府的宣传，为了储备武器，列宁在利用合法地位方面很是小心。从批判的合作突然变为针锋相对之后，要约束布尔什维克基本队伍、它的外围和同情者，不让他们过早下手，是不容易的。如果你向一个国王开枪，你就一定要命中。起义一发动起来，失败就是灭亡。所以列宁不得不严格制止他手下的那些比较浮躁的人，不得不严格制止因为没有及时满足工农的迫切需要而引起的周期性的群众骚动。在时机不利于夺取政权，或者不利于在取得政权之后，保持政权的时候，他必须预先阻止夺取政权的企图。

在六月的那些日子里，尤其是在七月初，极端主义的情绪，在彼得格勒工人阶级和驻军的重要部份中很流行。甚至布尔什维克的某些领导者也跃跃欲试，想向克伦斯基的政府发出一个全面进攻的信号。是列宁制止了他们。他警告说，他们不会完成他们所开始的事业，他们会被打垮，而且夺取政权的机会也许就永远失掉了。即使如此，还是有不少的工人，不受约束，手里拿着枪出现在大街上。虽然布尔什维克们力求取消这次示威（这主要是他们以前宣传鼓动的结果），在列宁指导之下的布尔什维克党还是领导了示威运动，借以防止它变为公开的武装起义。布尔什维克在这方面是成功的。但是因为党公开承担了武装示威的责任，党的机构被迫转入地下，在对群众的政治影响上，他们受了相当损失，只是在科尔尼洛夫企图从右的

方面对克伦斯基政府发动政变之后，他們才恢复了影响，部份地摆脱了非法状态。

(3) 在列宁掌握布尔什维克党的一生中，最具有决定意义的阶段就是十月革命的前夕。虽然在隐蔽期间，他跟深怀不满的农民和士兵保持了密切接触。他也非常了解首都内外军队部署的情况。接受过七月的經驗教訓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倾向于慢慢走。他們接到列宁的指示：“要么现在就动手，要么永远别动手”的时候，他們最想不到的是轉入公开的进攻。

最初，列宁是属于少数。他生气，大喊大叫。他威胁他們，要撇开他們，直接找基层党员干部去組織这些事情。他写信給有影响的黨員們，叫他們对落后的执行委员会施加压力。经过激烈而頑强的辯論，他說服了他們。从他在1917年11月21日写給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在以后的几天里組織武装起义的一封信里，就可以明白，列宁认为他們所处的那个时期，作为以全力夺取政权的时期，是如何紧急。信里說：“俄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成功就依靠这两三天的斗争。”^①等到他終于以十票对两票赢得了多数，事情才决定了下来。布尔什维克取得了政权。

(4) 在以后的几年中，他們保住了政权，这主要也得力于列宁的指导方針。中央委员会的一部分人想跟霍亨索伦德国繼續作战，同时号召德国工人支持布尔什维克。另一部分人提出了“不和不战”的政策。列宁坚决要求簽訂和約，让布尔什维克从外国敌人那里暂时取得一个喘息的机会，同时让他们获得足够時間，巩固自己，来对付内部敌人。这个时期，列宁最初还是属于沒有希望的少数，但是他埋头干下去，直到他們让了步。布勒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約簽訂了。

如果列宁沒有回到俄国，或者死在路上，很难假定，当时支配布尔什维克政策的加米涅夫、穆拉諾夫和斯大林会掉轉方向，会把反对临时政府的战争进行到底。如果在六七月里，列宁不在场，沒有在头

① 參看《列宁全集》第21卷，1932年紐約英文版，第99頁。

腦發熱的布爾什維克們和其他的 *enragés*^① 中間進行說服工作，制止起義，整個組織都會被消滅在血泊里。如果在十月革命前夕，布爾什維克不顧列寧的勸告，躊躇了，克倫斯基就能夠調動可靠的軍隊，守衛國會會場，從從容容地對付布爾什維克們。如果列寧沒有答應德國人的一切要求，使他們停止下來，他們的軍隊就會佔領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因為軍事抵抗早就無法進行了。列寧和他的同志們就要麼遭受到卡爾·李卜克內西和羅莎·魯森堡在德國遭受的命運，要麼被趕到廣大的俄國的各個角落里去。

當然列寧並不就等於布爾什維克黨。但是布爾什維克黨卻因為列寧，才成它所成為的那種工具。在他以前，有沒有人，在一個政黨里掌握過那麼大的權力，很難說；不過在一個自認為民主的或社會主義的組織中，肯定是沒有的。

如果列寧當時不在場，沒有哪一個革命領袖能夠代替他。斯大林不行，他自己承認了。列寧的最親密的信徒季諾維也夫不行，他在十月革命的時候跑開了。加米涅夫不行，列寧是在改變斯大林的思想的同時，改變了他的思想的，可是他和季諾維也夫一樣跑開了。托洛茨基也不行。雖然記錄證明，在1917年四月以前，俄國的傑出人物，只有托洛茨基的理論立場和實踐綱領跟列寧的相一致，但是在列寧成功的地方，他會失敗的。就舉一件事來說，他到俄國比列寧晚了一個月。那時列寧已經完成了整頓布爾什維克黨的工作。自然這種整頓工作，托洛茨基也會作的，不過他不是這個組織的成員。他自己的黨，人數不多，沒有什麼力量。八月里，他加入了布爾什維克黨，由於列寧贊賞他的才幹，經常保護他，不讓他受到黨內二流領袖們的猜忌和反對，他才在布爾什維克黨內建立了威信。托洛茨基單槍匹馬是註定要失敗的，因為儘管他在別的方面很有才幹，但他缺少組織天才，而這種天才，却是政治上成功的必要條件。他的高傲專橫態度刺激人們，他不善於以自己的長處感化人們。他能煽動聽眾，但是他

① 法文，意思也是頭腦發熱的人們。——譯者

能象列宁那样，爭取党内反对派。他公开鄙薄庸庸碌碌的人，这一点，在他这么一个新来者的身上，是不会得到諒解的。

四

要是十月革命沒有发生，或者，发生了，而沒有成功，历史的后果会怎样呢？要說明不会出現的事，比起以任何較大程度的确定性說明會出現什么事，是要容易些。这里，象闖进太阳系，打乱它的常态的彗星一样，另一系列的事件会涌进我們正在討論的这系列的事件里来，这种可能性总是有的。但是我們能够根据我們已經知道的，大致推算出可能会发生的事。如果这一点，象我們所见到的，在原則上也还有异議的話，那么，在人事和史事方面，一切有根据的論断的可能性就都得排除了。

要是布尔什維克失去了他們的最有利的时机；左派社会革命党和某些无政府主义集团，也許会有攫取政权的打算。但是他們能够取得的成就，充其量不过是一陣吵吵嚷嚷的騷乱。他們沒有組織紀律，也提不出一个統一的控制計劃，更不談执行了。即使出乎常情，取得胜利，他們的綱領也会在布尔什維克的綱領开头的地方，就是說把土地交到农民手里——停下来。

无论怎样，俄国的軍事战綫都会崩潰的。实际的情况是，到了1917年底，就根本没有什么軍事战綫了。德国人能够随时随意前进。不管誰来組織政府，都不能不跟德国休战。在第一次會議上就給布尔什維克用武力打垮了的立宪會議，俄国的議會民主制度，很可能效法英国和法国，把俄国变成为一个立宪共和国。占优势的社会主义的情緒会保証有一种先进的社会立法的制度。銀行，某些基本公共事业和工业大概会社会化，但是不会有工业的集体化。俄国市场会作为一个广大的領域，为欧洲的工业开放。从1928年就开始的灾难性的世界危机大概会推迟，而且即使果真发生了，它的后果无论如何不会那么严重。各种法西斯党派会作为政治团体存在下去，但是作为一种群众运动的法西斯主义，是不会在一个統一的欧洲工人阶级面

前有所發展的。

即使沒有十月革命，戰爭的危險也不會消除。因為在缺乏某種計劃經濟，來巩固世界政治合作的情況之下，為爭奪世界市場而引起的各國間的經濟衝突，仍然會繼續下去。在東方，特別就日本來說，事態的發展大致會跟過去一樣。但是在西方，在沒有法西斯主義的情況下，戰爭也許會避免，雖然它的危險不會消失。一開頭就加入國際聯盟的一個民主的俄國會成為魏瑪共和國的天然同盟者，凡爾賽體系的最壞局面就會避免。一個重新組成的社會主義和勞工國際，鑑於它在1914年錯過的機會，並且有着足夠的力量來防止用武力解決經濟問題，也許會從第一次大戰的屠殺中出現。

有些歷史學家承認十月革命的勝利，並不是命定的，也就是說：不是當時形勢之下的唯一的历史可能性。但是他們認為，如果沒有十月革命，或者如果十月革命失敗了，唯一的另一前途就是沙皇制度的復辟：“代替沙皇制度的不是立憲君主制或自由主義的共和制，而是布爾什維主義……代替布爾什維主義的（如果它經受不住內戰的考驗而失敗的話）……不會是按照最新式的同等投票權和比例代表制選舉出來的切爾諾夫，而是一個軍事獨裁者，一個高爾查克或者一個鄧尼金……”^① 這是很普遍的一種看法，但是我們認為這種看法是錯誤的。

科尼洛夫的反革命運動，在十月以前，就象烈日下的雪一樣融解了。使得高爾察克和鄧尼金能夠重整旗鼓的是什麼呢？外援——如果一個民主政權在俄國繼續存在下去的話，根本就不會有什麼外援。實際上，外國的干涉反而加強了布爾什維克的獨裁。有許多敵視布爾什維克的政治統治的人都跟布爾什維克們拌肩作戰，因為他們把這場內戰看成反侵略的民族戰爭。在俄國，保皇黨實際上得不到社會支持，支持他們的是大地主和依靠大地主的人們。農民們抓住了

^① 參看威廉·亨利·張伯倫：《俄國革命》第1卷，1935年紐約英文版，第371頁。關於那個時期，這本書從各方面看，是迄今寫得最客觀的一本。

土地不放手。当他們有了選擇的机会时，他們宁愿選擇布尔什維克，因为布尔什維克答应讓他們保持土地；而不会選擇反革命分子，因为反革命分子夺走他們的土地。如果立宪會議能行使它的合法职权，那么来自右面的新的暴动大概不会发生。即使竟然发生，也不过是曇花一现，因为它会面临实际上團結一致的人民。

为什么俄国在沙皇独裁制和布尔什維主义独裁制之間找不到一个民主的中間道路，通常舉出的理由也就是“証明”英法不可能革命的那些理由。

可是，我們所关心的，主要的并不是如果没有十月革命，历史将会呈现出怎样的特殊面貌。至于它是不是值得欢迎，在这里也跟我们毫不相干。我們所相信的是：不管世界会变得怎样，幸福一些或更为不幸，好些或坏些，无论如何，它会变得大不相同。相信未来的历史学家們会认为十月革命是一个轉折点，它在人类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幸福和不幸的时代，相信根据已有的証据，他們会把那次革命成就的主要作用归功于尼古拉·列宁的創造事变的性格。

关于列宁在俄国革命中具有的創造事变的重大意义，上面的分析仍不完全。如果不能把一个亲自参加过严酷的革命斗争、相信俄国革命有其必然性的重要人物的論点駁倒，就不能保証这个分析得到人們的承认。列昂·托洛茨基在他的出色的《俄国革命史》中，企图按照馬克思主义原則，証明在沙皇专制政体垮台之后，十月革命是俄国唯一的可能发展的道路。他的著作中有很多这样的句子：“十月革命以一种实际的必然性向前迈进。”它具有“一种深刻的自然的必然性。”它証明了“伟大革命的有力发展。”^① 尽管該书有其明显的傾向性（著者也絲毫也不想加以掩飾），他的研究是了解1917年二月到十月那个阶段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文件。那是布尔什維克們替他們自己所作的似乎最有道理的說明。

①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1卷，第460頁；第3卷，第260頁。

但是那种說明跟他的論点一致嗎？

在他的所有历史作品中，有两种精神在他的內心中交战：正統的馬克思主义者的精神，作为馬克思主义者，他得按照一元論的教条来解释历史；还有經驗主义研究者的精神，作为經驗主义的研究者，他得跟着証据走。事件絕不能駁倒历史唯物主义的信条：所以只須把它們解释得恰当就行了。而科学的历史学家却非向頑强的事实低头不可。我們要來說明，他的教条主义精神所提出的东西跟他的經驗研究所揭露的东西，是互相抵触的。

托洛茨基的經驗主义的分析是建立在証据确凿的基础上的，这个証据就是沙皇制度无力經受任何大规模的战争。即使沒有战争，它也腐朽了，到了崩潰的程度。再来一次內部騷动，大約就会垮台。到了战争头一年年底，甚至連貴族們都在用抽签的方法来決定由誰去杀死尼古拉二世和他的左右了。但是从沙皇制度的注定崩潰到十月革命的不可避免性（或者占压倒之势的可能性）还有一段长路要走。托洛茨基企图弥补这个缺口，他指出1917年的俄国，不管在什么政权之下，都不能繼續作战下去，还有，不解决土地問題，这个国家，不論是和是战，都避免不了混乱。在这里，論点也是得到証据的充分支持的。然而并不因此就可以认为布尔什維克党的胜利在历史上是必然的。

我們早就知道，早日取得和平和分配土地毕竟是社会革命党綱領的一部份。如果十月革命失败了，无力繼續战争和必須保卫国家，以免一方面遭受科尔尼洛夫党羽，另一方面遭受列宁可能发动的新的暴动的威胁，会迫使立宪會議跟德国妥协。至于滿足农民的要求，社会革命党可跟布尔什維克不同，在主张把土地分給农民时，它没有什么更深远的想法。社会革命党尽管它的社会成份复杂，主要是个农民党。因为它希望把分配土地正规化，不鼓励立时沒收土地。它等待立宪會議来作这件事。但是农民們等待分地，已經等得不耐煩了，士兵們等待和平，已經等得不耐煩了，工人們因为食物的缺乏和高漲的物价也感到不耐煩了。

用不着指摘他举的任何事实(而且有些事实是不难指摘的),我們可以說,托洛茨基所証明的一切,无非是客观历史形势使得布尔什維克的胜利成为可能。但是問題是:把可能性变成为现实性的是什么?那种可能性会失掉嗎?为什么那种可能性实际上沒有失掉?

当他是在討論問題,而不是为一种信仰作辯护的时候,带有关键性的每一頁上都有他作的答案。沒有失掉那种可能性是因为有列宁的领导。但是这个答案給了列宁这样一个作为事变創造性的历史人物的地位,它就嘲弄了托洛茨基心爱的馬克思主义的教条。結果,等到托洛茨基迫于他自己的叙述,不得不正视問題的时候,他的回答采取了閃爍其詞的形式。一个“是”接着一个“否”的一种模棱两可的腔調,甚至使得辯証法的神秘邏輯也落了空,結果只好无可奈何地采用了偷換論題的手段。主要章节的总的結論小心翼翼地承认如果沒有列宁,十月革命也許不会发生。但是在以后的章节里又馬上推翻那个結論,在这里,托洛茨基却又否定了他过去提出的并且試圖回答的那个問題的合法性。

还是要問:如果列宁沒有在 1917 年四月到达俄国,革命会怎样?这不是等閑的問題,虽然問起来比答复起来容易。如果我們的解释有所說明和証明的話,我們希望它証明列宁并不是革命过程的創造者,他只是(!)投身到一串客观历史力量中間而已。但是他是那一串里一个重要的环节。无产阶级专政是从整个局势推断出来的,但是仍然需要确立。沒有一个党就不能把它确立起来。党只有在認識它的使命之后,才能完成它的使命。因此,就需要有列宁。在列宁到达俄国以前,沒有一个布尔什維克领导人敢于給革命下个診斷……布尔什維克党的党内斗争是絕对无法避免的。列宁的到来只是(!)加速了斗争过程。他的个人影响縮短了危机。然而,能不能肯定地說,沒有他,党也会找到它的道路呢?我們絕不敢那么說。在这里,時間的因素是有决定作用的,而且在追溯时要把历史上的時間說清楚又很困难。辯証唯物主义无论如何跟宿命論沒有共同之

点。^①

如果一定要从这段迂迴曲折的文章中，探索出一点意思，它似乎也是支持我們先前所达到的那个結論的。但是这个印象馬上就給托洛茨基抹去了，他拒絕把列宁和列宁所处的那个局势分开。他告訴我們，把列宁“那个人、那个英雄、那个天才，”跟客观諸条件“群众、党”并列起来，是机械的、片面的。为了保持他的教条主义的虔誠，不受那說的沾染，他不知不觉地回到斯宾塞的立場上去了。斯宾塞輕輕推开杰出人物及其时代的关系問題，理由是一个人和他的时代必須合起来考虑，而且两者都是为先行的文化情况所决定的。

托洛茨基也不承认列宁和他的时代条件(包括群众和党在內)之間的比較，因为两者都是由其他事物來說明的。他向我們保證說，列宁并不是俄国历史发展中一个偶然因素，列宁和他的党都是“俄国过去全部历史的产物。”当然是囉！难道他們还能成为別的历史产物嗎？但是这个同語反复对子：“如果没有列宁，布尔什維克党会找到十月革命的道路嗎？”这个問題又有什么关系呢？从二月到十月，不管发生过什么历史事件，我們都可以說(而且跟托洛茨基同样有理)，那是俄国过去全部历史的产物。因为这个詞句既能够“解释”布尔什維克因为有了列宁而获得的胜利，又能够“解释”他們因为没有列宁而招致的失败，所以它跟这个問題毫不相干。只要托洛茨基再肯定一下1917年列宁在俄国的存在是由俄国过去全部历史保證了的，他就会陷入彻头彻尾的神秘主义。天道給我們派来上帝的儿子，而那魔鬼的辯証法，*der Geist der stets verneint*(那永远否定一切的精神)則給我們派来了“人民的儿子”。

可以給“俄国过去全部历史的产物”这个詞儿一个确定的意义。就这个意义來說，凡是根据已有的历史証据，事先就可以或者應該可以作为未来发展之唯一前途而加以預料的任何事件，都是俄国过去历史的“产物”。照这种用法，我們有理由来下結論，最好的証据，包括

① 参看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1卷，第329—330頁；第3卷，第154頁。

托洛茨基举出的证据在内，都证明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不象是俄国过去全部历史的产物，倒象是全部历史上一个最富于事变创造性的人物的产物。

* * *

在历史上，起了事变创造性作用的列宁，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呢？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們的好奇心是完全合理的，因为使得事变性人物和事变创造性人物截然不同的，毕竟是个人的性格。我們特别感到兴趣的就是要发现那一系列的特点，正是由于这些特点，才使得列宁在政治上特别突出，压倒了一大群人物，尽管他們作为思想家、作家、演說家，表现了比列宁更为伟大的才能。要作这方面的分析，就象去分析任何形式的天才一样，是困难的。特别是在政治方面（在政治这种溶液里，德性和罪恶、理智和愚昧，不象在人事关系和科学活动的清水中一样，那是有着一种完全不同的比重的），要估计天才的价值就更困难。光是列举各种性格特征并不能说明洞察力的问题，洞察力是在各种特征都在问题、危险和理想目标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共同发生作用的时候，才显出它的光芒来的。

政治洞察力的一个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把握时机的感觉。没有这种感觉，再聪明也无用。如果配上坚强的意志，它就能把一个庸才推上高峰。在二月革命以前就知道普列汉诺夫和斯大林的人，谁也料想不到，这一个会从历史舞台上消声匿迹得那么快，而另一个会逐渐成为最强大的党的有力人物。但是替布尔什维克赢得天下的，却是列宁的了不起的掌握政治时机的感觉，这种感觉是以比普列汉诺夫的智慧更实际的一种智慧，比斯大林的意志更百折不挠的一种意志培养起来的。

凡是对列宁，这个政治人物，作过适当分析的，都一定注意到他的坚强不屈的意志，和无比的自信心。如果他曾对事业的最后成功，策略的正确性，以人类的苦难和不幸换来的胜利的高昂代价，抱有什么疑虑，他从来不向任何人表示出来。他不受享乐思想的腐蚀，也不受不切实际的、浮夸思想的感染。他把他的满腔赤诚献给了某种单纯

的、理想的社会主义目标，那些目标尽管很模糊，由于他自觉绝对的真诚，他总是能够为自己证明他的作为（不管看起来如何）是正确的。

列宁只是在组织的体制之内，才能对人们发生影响。作为个人，他对群众是没有力量的。他不装腔作势，他缺少以闪闪发光的同情心来抓住群众的那种手腕；虽然他跟群众总有话谈，但是他不会发出火花，使他们燃烧起来，进入行动。

列宁是个党的人。对他来说，党的生活就是他的精神食粮和本质。正象某些人的性格受到教会的培养，另外一些人的性格因为苦难危险的磨炼和爱情、家庭、知识的种种问题而得到丰富，同样，列宁的性格则受到党的培养并在党内得到发展。他总是靠近他所参加的那个组织的中心。在他的思想里，他在哪里，党就在哪里。他的痛苦、问题、判断都反映他对党的高度专心致志，这种专心致志由于他在潜意识里就是党的化身，而更显得大公无私。不管他考虑的是国家大事，还是艺术、哲学问题，他总是全神贯注的。实际上，一切问题，就连听听音乐和下下棋，对他来说，都是政治问题。

列宁不仅仅是个党的人。他把党提高到一种政治原则的水平。他背离了马克思的本质上是民主的观点，其根源就在这里。对马克思来说，政党是介乎工人阶级国际机构和压力集团之间的一种东西；是可以时有时无，可以在历史事件的进程中重新组成的一种东西。但是对于列宁来说，政党是职业革命家的一支队伍。在夺取政权的时候，职业革命家的组织最为重要。对组织的铁甲般的控制是取得胜利的主要条件。这个理想的组织，一定要跟列宁本人一样，对于群众的情绪，十分敏感。它要有一种准确的时间感。尤其重要的，它要有那种不可动摇的信念，相信它知道群众的真正利益是什么，比群众自己知道得更清楚。由于这种认识，为了让他们行动起来，对他们许下任何诺言，还有巧妙地操纵他们，使他们有所行动，这些手段都是理所当然的了。即使他们注定要失败，也会教育他们，把他们的认识提高到布尔什维克的水平。职业革命家，按其定义来说，就是一个毫不自私，实际上，一点也不关心物质利益的人，所以他真心相信，

他是不会受绝对权力的引誘和腐蝕的。

按照馬克思的意见，“无产阶级专政”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狭隘的民主提出来的工人阶级的更广泛的民主。列宁是个馬克思主义者，他拿共产党对无产阶级的直接专政調換了“无产阶级专政”。列宁认为，人类的希望在于工人阶级为消灭资本主义，乃至一切经济上的阶级而进行的斗争。但是他更相信，这个斗争只有在他自己的党（不管它的名字叫什么）领导之下，才能成功。他毫不犹豫地得出这个不可动摇的結論：因此，任何个人或团体，凡反对这个党的，客观上都是“人类的敌人。”

这一来，所有其他工人阶级政党都被推到壁壘的另一面去了。列宁不但用这种“合并”的方法反对它們，而且深信不疑。这种合并的方法就是把一个为了爭取苏維埃的民主、反对党的专政而斗争的喀琅施塔得的水兵跟黑色百人团联系起来，把一个在革命以前監獄里呻吟了多年的批評了布尔什維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跟邓尼金和高尔察克的党羽等同起来。在列宁去世之前，任何一个要求苏維埃民主、反对党的专政的人，都立刻被宣布为反革命分子。这看来好象有諷刺意味，因为列宁反对克伦斯基的主要口号就是“一切政权归苏維埃。”但是在那种形势之下，列宁看不出有什么諷刺的意思。口号，和人民一样，必須以一种灵活的方式，或者用列宁自己的話來說，必須以一种“具体”的方式来运用，那就是說，要用来推进当时的政治任务。解决政治任务的目的是为了布尔什維克取得政权。因此，当为了党的胜利看来有必要的时候，列宁就宣布了“一切政权归苏維埃。”到了七月，看来布尔什維克是不能夺取苏維埃了，列宁就攻击那个口号，寻找别的可以贏得政权的办法。后来，形势一度又有利于布尔什維克夺取苏維埃了，列宁又回到老口号上来。可是等到十月，政权已經到手之后，苏維埃的民主就意味着布尔什維克有失去政权的可能。在列宁看来，再提那个口号就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了。

如果列宁是始終一致的，那末他也会得出結論，在他的党内，凡是反对他的政策的，客观上也就是人类的敌人。但是他并不跟着他

的理論邏輯走，而是跟着成功的組織工作的需要走，在這方面，他顯示了他的天才。為了達到他的目的，在利用和爭取自己隊伍中具有不同意見的人們這方面，他也表現了偉大的才能。他能够跟那些沒有他就彼此不能共事的人們合作。這個邏輯結論後來由斯大林作了，並且給任何問題上的任何反對者都定下人類公敵的罪名。不過那是以後的事情了，那時候列寧的黨已經不需要進行革命了。

從二月到十月，在這個時期里，列寧跟他的全部對手相反，他知道他需要的是什麼——政權。跟他們相反，他知道一支政治隊伍是多麼重要，以及如何有效地把它疏散開去，去獲得政權。跟他們相反，他敢於以他的綱領和他個人對付一切。象他那樣作為好的辯證唯物主義者，他的信念是毫不缺少那種包舉宇宙的性質的。列寧深信自己是歷史必然性的一個工具，跟列寧相比，那個內心里深怕靈魂不能得救的克倫威爾，就象是革命前俄國小說里的一個成天作內心反省的人物。

卡爾·考茨基有一次把列寧比作俄國的俾士麥。這個比較在引起人們注意列寧所表現的高明的革命現實政治手腕方面，是合適的。不過俾士麥是容克貴族，他的性格不是統一的。他的宗教信仰並不比拿破崙的多一點，他把他自己想象為古代挪威神話中的英雄，從陰險的命運女神那里搶奪帝國。列寧的性格是完整的。他創造了一個帝國，就好象那個帝國是寫在定貨單上似的。他老老實實地裝作他只不過按照他的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威、馬克思和恩格斯定下的方案行事罷了。列寧死后，布爾什維克們中間流傳過一個故事。這個故事會使得他的一片虔敬之心感到高興的。故事說，列寧到了聖彼得把守的天堂門口，敲門求進。“你是什麼人？”聖彼得問道。列寧答話的時候，沒有說出他的名字，却恭恭敬敬地說：“我是馬克思的‘資本’的利息。”^①

① 西方社會民主黨人中間也流傳過這個故事，不過有了一些改變。不管這些改變值得什麼，我也把它放在這裡。列寧回答聖彼得說：“我是馬克思的‘資本’的利息。馬克思就在下面，並且當著我的面把地獄的大門關上了。”

列宁的历史使命感，使他在修訂他的路綫，或者通过曲曲折折的道路，从这个立场轉变到另一个立场的时候，不感到慚愧、窘迫和懊悔。他承担实践上的責任，但是在他的思想里，历史解除了他的一切道德上的責任。在一个沒有多大信仰的人心中，会显得完全是伪善的事情，在他身上，都成为危急关头用以輔助高度原則性的灵活智慧了。那些在革命斗争中，跟他斗得最厉害、拳打脚踢，无所不来的的人，全都承认他的絕對真誠和攝人的道义力量。尽管他們非常憎恶他，他們却給他迷住。他除了为人类决定命运以外，一点也不为自己着想。他的判断是不能用女人、朋友或者享受来动摇的，也不能用仁慈或怜悯来軟化的。柏克曼(Berkman)和高尔德曼(Goldman)請求他释放几个批評过布尔什維克的无政府主义者，他率直地說：“真正的、有头脑的无政府主义者是同意我們的意見的：只有那些冒充无政府主义者的土匪，才被关在監獄里。”^①这当然是荒唐无稽之談，但是毫無疑問，列宁是信以为真的。当他劝告外国的共产党人，隱瞞他們的信仰和組織关系，打入各种民主組織的时候，他坚决相信，这就是忠实于“更高一級的”真理。当奧托·鮑威尔(Otto Bauer)把列宁提出的新經濟政策解释作部份的向資本主义退却的时候，列宁真生气了，他憤憤然地說：“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在宣传这种事情，当我们說，我們要枪毙那些說这种話的人他們才大吃一惊。”^②在这里，正如在別的地方，值得重視的是列宁的态度，他认为在他不当权的时候，他有权利提出反对的意見，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当他当权时，別人提出来，那就完全不对了。

直到目前为止，描繪列宁形象的书或传记，写得好的，并不多见。我們看到的，主要的都是在列宁去世之后，为了激烈的党爭而写的东西。要想了解他給同事們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要找一点这一方面的可靠材料，我們就得請教列宁还在世时，人們写下的少数特写。所以，列宁的同事，一个銳敏的观察家，卢那察尔斯基(Lunacharsky)写

① 参看爱瑪·高尔德曼：《我的生活》，1931年紐約英文版，第764頁。

② 《列宁选集》第9卷，英文版，第342頁。

的如下的几句话是非常有力的。“列宁拼命作他的工作，并不是因为他觉得权力可爱，而是因为他确信他的正确。他不能允许别人糟蹋他的工作。他对权力的爱是出于他的坚持原则和正确性，如果你愿意这么说的话，也由于一种不能从对方的观点来观察事物（这一点对于一个政治领袖是很有用的）的〔性格〕。”①

一个具有这样“伟大信念”、坚强的意志和魄力、组织天才、对群众心理的敏锐感觉的人，把这样的一个人放在久战疲惫之后、民气沮丧的大好时机里，究竟谁会统治谁的问题是不需要很久的时间就可以见出分晓的。

* * *

法国的大物理学家昂利·彭加勒，谈到机会和历史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最大的机会就是一个伟人的诞生。”这从两种意义上来说都是正确的。一个英雄的生物学上的潜在可能性从社会行为法则里推究不出来。从遗传法则里也推究不出来，因为遗传法则只是一种一般化的、统计学上的形式，而能够给我们产生个别英雄人物的则是细胞的特殊结构。但是一旦这个潜在的伟人诞生下来，而且只要他还在这场，他对事物的影响就不是一个机会问题了。在一定的情况之下，这种影响是可以广泛地估计的（虽然没有必要去估计），正象我们能够预料军事领导、工业领导和政治领导上英明或愚蠢的效果一样。一旦英雄上了台，我们应该控制他到什么程度，又能够控制他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对于明智的民主主义者特别有关系。

① 参看《革命的侧影》，1923年莫斯科版。麦克司·伊恩特曼给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英译本作的序言里（第1卷，第15页）也引用过这一段。

第十一章 英雄和民主

假如我們給英雄下这样一个定义：英雄就是具有事变創造性并且能够重新决定历史进程的某些人，那末，紧跟着下一步的推論應該是：一个民主社会对于英雄人物必須永远加以提防。

这个简单的，但对于某些人來說是不受欢迎的結論，正好包含在民主社会这个概念本身之中。因为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領袖人物不能自己冒称具有英雄的能力。根据法律上规定的一定期限，政府必須取得被統治者的核准，而这种核准系采取自由給予同意的方式。既然，同意是自由給予的，也就是說，是在听取了反对者意见之后才同意的，因而，大家一致同意的政策或措施就体现着社会全体对之負責的意义，尽管它是由領袖人物倡議出来的。^①

民主社会之中的領袖問題是个高度复杂的問題。正由于它的重要性，我們有充分理由来把它进一步地加以澄清。本章中，我們所要考慮的問題和其他各章不同，它是帶有规范性的。其中包括着有关民主和民主的优点之若干价值判断。

中国的一句諺語告訴我們：“一将功成万骨枯”。^②这句諺語中含有的情感适切地道出了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的经验与智慧。如果那些为了英雄的光荣而受害的牺牲者们情愿表达意见的話，他們一定会带着悲叹、哀泣和咒罵来摹拟这句朴实的言語，不仅中国是这

① 关于“自由給予同意”的意义的詳細說明，可參看拙著《理性、社会神話与民主》，1941年紐約版，第18章；并參考1942年4月号《倫理學杂志》所載論文《民主哲学前提》。

② 按照原文直譯应为：“偉大人物是公众的灾难。”——譯者

样，而是世界到处如此。因为，总的来说，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所以能赢得伟大的尊号，无不是凭着战争、征服、革命和神圣的十字军而杀出一条血路来的。

可是这句中国谚语仅仅是描写过去的历史，而且并不是过去历史的全部。一个伟人有时也能够为大众造福。而伟人的缺少也决不意味着大不幸就可因此而避免。其实，面临着巨大的灾难，人们往往还祈祷救星的降临。在他们所祈求免除的灾难之中，有时可能也包括着那早期的救星所遗留下来的统治。如果我们根据某些伟人所做的坏事，就来断定他们的伟大正是他们的罪行的泉源，那末，我们就只有把一切的天才和能力都得加以贬低了，因为天才和能力时常会被滥用的。

那末，伟人也可能是个好人吧。可是，一个民主社会还得猜疑他们！因为民主的精义就是被统治者要求参预有关自己福利的决定事项。而这种参预是和以下的希望相符合的：就是说：被统治者必须明智地来选择和选举自己的统治者。——而其目标是为了达到：在当前条件允许的范围之内，要尽量满足人们的欲望和需要。但还有比这个希望更加重要的，那就是以下这个信念：宁可要人们各自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不要让自己的命运掌握在别人之手——但不幸的是这个信念往往和事实相左。

民主社会的英雄（即指潜在的事变创造性人物）可能真挚地相信自己能够接受民主社会据以为根据的那种哲学。但迟早他会觉得民主方式的两个特征是他所难以忍受的。第一，就是多数决原理，特别是当他坚信在某种重大问题上，多数是错误的时候。第二，纵然他相信多数是正确时，他也会认为它的作用过于迟缓。

没有人会相信多数决的原理也能合理地适用于幼儿园、罪犯监狱，或者专为精神病者而设立的机构。我们所以承认多数决为民主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因为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整个儿地说，人们并不都是幼儿、白痴或罪犯。可是尽管人们能够服从理性，但人间事务当中的道理，大多数跟利益的衡量有关，而人们之间的利害关系又往

往是互有分歧的，因而，多数人认为合理的事也许会成为少数人的不幸。这就足以证明：对于民主来说，光靠多数决是不够的，但并非不必要的。而上述情况也绝非证明某些权利是不可放弃的和绝对的，因为没有绝对不受限制的权利，而在某种情况之下，为了其他权利的缘故，总得把某种权利加以限制。

除了多数决之外，民主社会还必须加上另外一个条件：即只要某一团体承认把自由探讨和民主表决当做调解利益冲突的原则，那末，任何其他团体都得承认这一团体主张本团体的利益是合法的。尽管如此，多数还可能是错误和不公正的，正如同那服从证据指导的人有时也还会发生错误，而那盲目行动的人反而会正确的。但是，多数为少数提供了可能性，使少数通过公开提出反面意见以教育公民，而能有变成多数的机会；这种作法实际上甚至已达到在政治上容许听取合法控诉的程度。在这样条件下，享有宣传鼓动自由的民主主义者必须遵守大多数的决议，尽管他相信这个决议是错误的。

但是，如果有一派少数，他们的实际纲领是要用武力推翻民主政治制度，那末，他们绝不能援用上述论点作为在原则上应受宽容的根据。可是，任何特殊的少数也可能由于审慎和方便的理由而受到宽容，例如，在某一小数派反对在当时具有更大危险性的另一少数派的场合，或者是，在压制这一少数派会成为一个不利于民主的先例，而这个先例的适用范围可能会扩大到其他真正愿为民主服务的少数派身上的场合，就可能如此。

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有这种“潜在的英雄”，他能够看到别人所未看到的東西。他的行动意志比别人更坚强。他对于如何实现他的看法具有比别人更准确的認識。就由于这些理由，他多半会发现自己置身于少数之中。而他的责任感迫使他必须为他自己的見識而奋斗。他对于民主理想的忠誠又迫使他要把这种見識变成多数人的共同信仰。假如多数人一味頑强固执己見，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他只有丧失了英雄活动的机会。这英雄就作为一个“乡村隱士”而湮沒于历史

之中了。

但是，卓絕的才能和堅定的識見一定會要求表現。只要這位英雄不拒絕把政治作為他的一個活動範圍，他的任務便是如何取得多數的承認。因為，作為一個民主主義者，他絕不會冒失地承認自己願意離開多數，或者讓別人知道他有這樣打算。而為了追求多數的承認，廣泛地說他可能會利用一種耐心的教育方法來說服他們，並且倚仗着他自己的識見本來的合理性來打開一條出路。

只要他的活動到此為止，而且僅僅到此為止的話，英雄對於民主社會是無害的。這意味着：他得甘心自願招致失敗。但這位英雄也可以學會煽動技術，而利用民主政治的工具本身來敗壞民主的品質。不過只要民主政治上的種種控制性措施還沒消除的話，英雄即使利用煽動手段也得倚靠多數，引誘多數和迎合多數。而由於他也往往利用種種手段來腐化他所領導的集團，他就會給他們帶來一種輕蔑心理。在這過程中，如果他自己的意志也為之動搖，而見識也變得模糊的話，他將僅僅成為另外一個政客而已。他成了一個喪失機會的英雄。但是，如果他的意志和見識仍然是堅強和清楚的，他為了贏得多數的承認，必得利用煽動手段來“愚弄”他的附和者。他還得開辟一個公開的鼓吹讲坛，以此為基礎而取得人們的信任，並且利用贏得的信任來醞釀一個秘密的政綱。這時，他便成為民主政治的一種威脅了。他的自信越強，他的企圖越是大公無私，他的英雄理想越是迫使他堅持要達到目的，那末，對於民主的整個理論基礎來說，就越會成為一種暗害性的威脅。特別如果這位英雄或潛在的事變創造性人物相信他自己是他的識見的不可缺少工具時，就更是如此。

不過到此為止，我們都是在假定：這位英雄的見解不能借助於自由討論和明智的研究來向各方面推薦它自己；並且假定即使他的見解被採納的話，也得僅僅借助於狡猾手段和煽惑的詭計。現在我們再來假定多數被這位英雄的見解正確地說服了，相信他是對的。這時，這位英雄還是會覺得民主政治的種種程序是束縛他的手脚的枷鎖。因為這些程序未免研磨得過於緩慢了，而許多事情是來不及等

待的。如果他自信他充分認識到社会的真正福利，并且相信那是正在悬而未决的状态，那末，英雄便很容易造成既成事实来对付它。一切足以牵制和阻碍他的见解的善意反面意见，他都会把它看做客观上的背离，而很容易把它作为这种背离来当众加以嘲笑譴責。并且，他知道如果他日后成功的话，他的举动是会大大受到各方原諒的。

但是，民主政治是否必得行动迟緩呢？絕不，因为它也可以利用一种把权力委派于領袖或英雄的办法来加速它的步調。不过，即使在最有利的环境下，这也只能減輕迟滯的危險，而不能把它完全排除。因为一种民主政治絕不可能把一切权力于事先尽行委派出去，而仍不失其为民主政治。而紧要关头的形势永远是和那尚未委派出去的权力有关的。既然，在一个民主社会里，不能把权力永久地委派出去，所以，每当权力的委派到了一个新旧交替的当儿，便会发生严重情形。此外，权力委派的需要，永远是发生在那危机或非常事变迫切燃眉的时候。可是，这个时机何时到来，又該由誰来决定呢？

英雄永远急于攫取更大的权力。就他的天职來說，这样做也是很自然的。他急于获取新的权力，正如他不情愿放弃那已經得到手的权力一样。而在一个扰攘不宁的世界里，除非它把种种大权委派在領袖人物的手里，沒有哪个民主社会能够长期存在下去的。同时，社会不情愿給予的权力，在收回时，也必然显得十分急切的。全部問題就在于如何抓住时机，——至于究竟什么时候才恰合时机，英雄和社会对此很难有一致的意见。

一个領袖，是否会濫用委派給他的权力，来达成他的英雄的事变創造性的事业，那是沒有任何保證的。不过，一个民主社会，每当时机紧迫，必須立即采取决定性的行动时，如果为了担心以上的情况而拒絕把权力委派出去，那是十分愚蠢的。另一方面，委派出去的权力也可能并无被濫用的危險，但由于它永远会成为濫用和篡夺的誘惑，所以，每当非常时期业已渡过之后，民主社会就应该准备着随时把权力收回，不这样做也是愚蠢的。

一个民主社会不仅会受到它的英雄人物的危害（尽管为了社会

的生存，这些英雄人物有时是非常必要的），而且也会受到任何公民集团的危害，只要这些公民集团对于它们所已经享受到（或是希望能够享受）的利益和特权是更加热衷，而对于取得这些利益和特权的民主程序却不那么关心的話。这就因为这些集团宁可更加珍惜那既得的和平、繁荣或社会状况，而不那么重视足以维护（或改变）这些事物的民主方法，这样一些集团就会觉得为了爱护这些既得福利而不得不招来英雄人物，即使牺牲民主也是理所当然的。試看那西欧的各个保守阶级，因为相信民主的立法机关无理地剥夺了私有财产权，而竟致不惜替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扫清了道路——就是一个生动的教训。誠然，他们也口口声声自称效忠于民主，但那不过是为了打开局面的口头禅而已。至于那构成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基础的大多数中产阶级或甚至一般劳动者，就不是那样。对于他们，安全、物价稳定和就业机会比民主来得更有重大意义。他们应该学着懂得：如果一旦失掉民主，那末，为之而牺牲了民主的那些福利，不是更加把稳了，而是会更加降低的。

* * *

如果我们把历史上一切事变创造性人物列入英雄的队伍，那末，我们就会发觉：在所有民主社会的历史上，这种英雄人物是非常稀少的。这种现象颇为符合民主社会的精神。事情应该是如此的。

民主社会往往非到英雄人物已经逝世以后，不会轻易给他们以赞颂的。这似乎可以说是民主社会政治上的忘恩负义，但这种恶名昭著的现象确乎包含着一种很大的明智。在民主社会里，尊敬这些领袖人物的最强有力的理由就是他们不受权力的诱惑，也就是说：即使他们明知自己是正确的，而大多数是错误的，他们也随时准备着放弃他们既得的威权地位。

伟人的降生并不期待别人的允许。当然，也不会期待民主社会来接受他们的领导。他们只是为了完成自己认为应该完成的任务而自寻出路的，除非是被一种敌对的环境压得粉碎，或是由于事变的波折而受到孤立。因此，当民主社会需要领袖人物时，用不着专去寻访

这些英雄。因为只要他們存在世間，自然会自求表现的。一个民主社会，即使是在利用这些英雄人物时，也得时常加以提防，免得受害，不可信賴他們的意图，尽管这种意图一般是可敬的，而其中也往往含有救世主的成份。民主社会所應該信賴的乃是：自己的民主制度的結構，权力和利益中心由大多数來掌握的原則，教育和道义精神等等。

民主社会中教育所树立的英雄的理想目标，必須跟事变創造性的个人有所不同。他所需要的英雄，應該是供养在思想的万神庙中的伟大人物，是具有崇高思想、社会眼光、科学成就与艺术才能的人物。因为正是得由这些人物來負責塑造公民的种种明智的理想与社会态度，而一般公民要是沒有學問，缺乏敏銳感觉，和教育素养，就不能实现民主的諾言。假如我們对于民主果然有真挚的信仰，便必得承认：正是那些受着基本政策影响的人，必須直接間接地对此（指基本政策）加以批評。而他們如果要能够作到明智的批評，要知道何时委派权力，何时收回权力，并且要亲自参預政治，以便提高政治生活的质量，他們就必須：培养一种分別事情輕重的敏感，对于雄辯的大話要不為所动，而对于隱藏在这些大話背后的东西則有着一種强烈的兴趣，对于互有联系的問題，要具有分析能力，并且能够慎重考虑可以利用的証据。

民主社会中的政治家就是凭着政策的建議來行使他們的領袖职权的。至于这些政策是否被采用以及采用与否的理由如何則决定于民主社会的代表。这些代表是由一些本身也可能当代表的个人选举出来的。所以，一个成功的民主社会可能会尊敬他們的政治家；但对于那些导师則必然是更加尊重——不管他們是牧师、科学家、詩人、法学家或哲学家等等。因而，真正称得起民主社会的英雄人物，不是那些武人和政治領袖，而是象杰斐逊、霍尔姆斯、杜威、惠特曼等等导师人物，以及其他一切給予人民以见解、方法和知識的人。

现代語言学上的习惯所反映出来的有关英雄与群众或平常人的那种强分畛域而不公平的区别是應該坚决打破的——这是民主社会的一項任务。要达成这个任务，須得把“英雄”这个辞兒的意义重新

加以解釋；并且應該知道：“英雄人物”是能够創造出來的，只要我們把社會機會巧為安排，使之更適合于有專門才能的人的發展。我們叫作“平常人”的並不是一種生物學的现象，而是一種社會现象。人們之間的種種能力上的歧異是比我們的社會安排所能注意得到的遠為複雜得多。

如果我們把社會機會加以限制，只承認少數典型的杰出人物，那末，與此比較起來，那廣大的群眾縱然千差萬別，却都顯得是遲鈍的凡愚了。反之，如果我們把社會機會加以擴大，好讓每一個有着才干的人都能得到發展和表現的刺激，那末，具有獨特意義的工作的可能性範圍便為之增加了。從這個觀點來看，任何人只要他能把工作做好，對於公眾的福利有着獨特的貢獻，他便是一位英雄。如果認為跟英雄的生活聯系在一起的崇高和榮譽只能到那不顧人的流血和苦難的事業中去找，那便是十足的偏見了。任何階層的日常工作，都有它自己的奮鬥、勝利和安靜的死亡等等機會。一個民主社會應該那樣來設計它的事業，即絕不是只讓少數人有機會取得英雄的地位，而寧可把那句“人人皆可為英雄”的口號作為規範的理想。所以稱之為“規範的理想”，因為如果認為它永遠能夠照字面意義確實得到體現，那便是一種空想。作為一種規範的理想，它替各種政策指示了方向，以便使得社會能够最好地發揮人們可以利用的任何力量。

人們可以利用的任何力量究竟是指的什麼呢？理論上那是有限制的，而實際上那是無限制的。如果沒有一個對於這些力量的表現予以鼓勵的環境，就沒有一個人能够獨斷地說出這些力量的性質和具體形式到底是什麼。同時，也沒有人能够確實說出這種力量的明確限制，而必得承認：人類意志不斷的向上努力能够冲破任何迄今未能冲破的藩籬。

一個民主社會應該鼓勵人們懷抱以下這種信念：即所有的人都會受到召喚，和所有的人都有可能被挑選上。其所以所有的人都有可能被挑選上，是因為通過人們所具有的能力和潛力的自發性的變化，自然界本身呈現了豐富多采的發展的可能性，而一個設計得很明智

的社会当可把它尽量发挥，以便作为挑选的出发点。这种千差万别的变化乃是人格和价值发生新的萌芽的泉源和希望。在一个合作互助的环境里，把这种信念（即指所有的人都有可能被挑选的信念）奉行起来，便能鼓励人们继续不断地努力，而其结果往往会把希望变为成就。

* * *

意大利的一派著名的理论家莫斯卡(Mosca)、帕雷塔(Pareto)和米雪尔斯(Michels)等，对于民主给予了一种貌似有理而根本上错误的批评，^① 我们这里的不具备事变创造性人物的民主概念和他们的看法刚刚相反。以上诸人都以不同方式试图证实民主政治的不可能。而他们的主要论证是：一切政治统治都包含着组织，而一切组织，不管它的神话说得如何如何民主，迟早总会落在少数中坚人物的实力控制之下。各种社会的历史，虽然表面上代表不同的政治形式之继续，实质上无非是不同的政治中坚人物的继续。民主是这样一种政治形式，其中隐藏着以下两点事实：（1）统治的中坚人物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2）这些矛盾解决的方式总是不符合民主精神，而有利于统治者一方的。就这些中坚人物也在创造历史的范围内来说，甚至在一个民主社会里，他们的杰出的领袖人物也都是英雄，或者也可以称之为事变创造性人物。

这种论证的全部力量是以：不理解各种理想（包括政治理想）的特质为其基础的。同时，以上评论还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政治权力问题永远是特殊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容许在不同的行为过程之间能有选择的余地，这些行为过程有的足以加强或扩充，有的足以减弱或缩小特殊的政治理想。最后，它还低估了各种社会之间的重大差异（尽管这些社会都或多或少地没能达到一定民主理想的标准），以及在那为了实现种种理想而永无休止的过程之中，各种制度所具有的极端重要性。

由于事物和人的性质，没有哪种理想是能够十足地体现出来的。

① 以前我曾对这派理论从另外一个不同的角度上来加以详细说明和批判，参看《理性、社会神话与民主》，1940年纽约版，第119以下各页。

世間並沒有什麼絕對的健康，絕對的聰明，絕對的民主，一個絕對誠實的人，——或一個絕對的胖子。可是，我們如果能明智地利用這些理想，便不難把一系列有血有肉的人，按照他們的強弱、智愚、胖瘦的不同程度而加以排列。對於國家也是一樣。絕沒有絕對的民主國家，但我們却不難說出哪些國家民主更多些，哪些國家民主更少些。一句話，理想都是隨情況而變的。也就是說，乃是建立組織或改進組織的各種原則，而不能等同於任何時間和地點的任何特殊的組織。

我們如果替民主社會下這樣一個定義：民主社會的政府建基於被統治者的自由同意之上，^① 那末，顯然沒有哪個社會是一個十足的民主社會，即使這個社會的成員人數極少，甚至至少到不必把權力委派給代表就能在一個地方開會碰頭的話。因為我們永遠無法担保這種同意是自由給予的——也就是說：是一點兒也不受無知、雄辯、或感情的束縛。而且由於社會分工的關係，各種決議總得交給各個個人去執行，而不能交給全體大會去執行。因此，也就不能担保這些決議以及它們所賦予的裁奪權一定會按照決議當時的精神來執行。

那末，結果怎樣呢？是否民主就是不可能的呢？決不，正如不能因為一個人不可能享受十足的健康，就斷定他不是健康的一樣。當我們承認了缺點之後，問題就變成：怎樣糾正這些缺點——亦即怎樣利用行動、制度、抑制或拘束的辦法來糾正它。而這些行動、制度、抑制或拘束辦法等等本身都是由民主原則或民主理想當中引申出來的。當然，所有這些糾正辦法也都不夠完美，可能會失敗，而且難以保證的。但我們決不因此就來否認它。假如我們是民主主義者，我們一定要繼續來改進它。我們還要用這個過程的各種結果來檢驗那沒有得到實現的民主原則（那是我們作為隨情況而變的指導方針的東西）是否正確。

萊斯加、帕雷塔和米雪爾斯都強調以下這個事實——即每當一個民主國家把權力委派出去，而政治組織已經建立起來的時候（在一

① 關於這個定義的詳細分析，可參看同上書第 285 頁。

个充分复杂的社会里，必得这样做），则政府的种种决策将会是更多地反映统治者的利益，而更少地反映被统治者的利益。这一点是千真万确，无可怀疑的。

那末，结果怎样呢？决不能因此就说民主是不可能的，只能说它是困难的。在某种社会条件和历史条件之下，民主是会有比在其他条件下更多的困难。但只要我们坚持民主的种种原则，那末，纠正办法还是会有。这些纠正办法就是要：想出种种特殊的机构、措施和抑制办法以便：（1）增加被统治者参预政府的机会；（2）减少各项权力——包括教育权、宗教权、经济权、政治权等等——在统治者手中集中的程度；（3）给被统治者以重新委派或收回委派权力的命令发布权。这里也一样，种种纠正办法还会有缺点的，但只要我们相信：凡是其利益能够受到政策影响的人们都应该享有发言权（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地控制政策的决定），那末，方向总是很清楚的——这里所谓方向即指那永无休止地把社会程序加以民主化的方向。究竟是否朝着这个方向走，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我们自己。

诚然，我们总得有一个统治中枢来管理政府，——这是真的。正如我们总得有一个医务中枢来管理卫生一样。而且，不论是好是坏，一个统治中枢总得比那医务中枢掌握更多的权力。但是，统治中枢并不一定要比那医务中枢更长久；或者甚至不一定须得一样的长久。只要那统治中枢的作用不超出民主范围的话，我们便能对于这个中枢有所选择。当这个中枢里面的人物须得和外面的优秀人物展开竞争的时候，那优胜者为了取得优胜地位必须向被统治者付出一定代价。至于这笔代价究竟多高，则至少部分地决定于被统治者所提出的要求。^①

① “对于工人群众来说，他们的胜利的领袖们所宣布的每一次‘最后的胜利’，即使是真正向前跨了一步的话，也不过是他们那个为了更多的〔收获〕和总是为了更多的〔收获〕的永无止境的奋斗当中的另外一个起点而已。”参看卡尔·温顿（V. F. Calverton）主编的《社会底创造》，第892页，麦克司·诺麻德（Max Nomad）所作的《主人們——老的和新的》。

莫斯加、帕雷塔和米雪尔斯等人的思想，其巨大的局限性乃由于他们没有重视：在一个民主社会里面有着种种可以利用的特殊制度能够使我们对于中枢里面的人物来加以选择和牵制——而各种特殊制度各具特异的优长之点。他们忽视了被统治者能够通过种种具体办法（包括：压力集团、罢工、公开辩论、审讯委员会、广播讨论会、向新闻机关及其代表投书和通电话、请愿、群众大会、预选会和选举等等）来实际干预一个民主社会里的政府基本政策的制定和决定大政方针。^①

有人提出这样的难题，说民主是不可能的，因为权力必得由一个有组织的少数集团来操纵——为了对付这个难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提出以下几个问题：一个民主社会能否罢免它的统治中枢？一个民主社会在罢免它的统治中枢这一点上是否比非民主社会来得更容易？或所出代价更少？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几乎毫无怀疑余地的。政治上和历史上的证据，在在证明：民主社会能够罢免它的统治中枢，而且一般地要比非民主社会来得更容易。结果，政治中枢的不断更换正是一个复杂社会政治程序上应有的特征，而这点决不应看作对于民主的控诉罪状，或者是民主不可能的证明。今日了却今日事就够了，不必管明日的問題！

在莫斯加、帕雷塔、米雪尔斯等人著作表面的邏輯論証背后有着以下两个重要假设：第一，人性是固定而不可移的，因此，我们也就能够据此预料：民主在实践上一定要失败的。而其失败并不是指那种天真的意义；即十足的民主是不可能实现的；而是含有这样的意义：即一种在实行的民主制度由它原有理想的角度上来说，就是不可能搞得更好的。第二，一个社会里面，自由和民主总量的多少，决定于一个已知的规律。这两个假设都是谬误的。

既然这几位社会哲学家的主张是以人性的恒常不变为其根据，

^① 可参看1942年4月号《伦理学杂志》第299页以下：格林·毛珞（Glenn Morrow）所写的簡短而出色的評論。并参考阿塞爾·本特来（Arthur Bentley）的重要而被人忽視的著作：《政府程序》，1902年芝加哥英文版。

他們的全部政治智慧就不过是替人們擬出这样一种單純的選擇：要么是統治別人，要么是被別人統治。但我們却不妨主張：人性當中絕沒有任何東西把我們局限在这样一个單純的選擇之上，而我們这样主張絕非空想。就因为在以上的單純選擇之外，必須配合以其他的選擇。誰是統治者？對誰來統治？統治多久？在什么样的条件和限制下來統治？而這些問題正是理智、實驗、批判的适应、以及政治上的发现等等的用武之地。

一个社会里面，自由与民主的数量多少，质量如何，决定于很多的条件——經濟組織、教育、宗教、传统等等——这里不过略举一二。但这一問題也决定于我們愿为它而奋斗的决心，而这一因素的决定作用絲毫也不弱于其他因素。民主本来就是困难的，而正由于許多自称为民主主义者的人，实际上乃是极权主义者的假冒，就弄得民主更加困难。道义所在應該是加强斗争，而决不是放弃斗争。

第十二章 规律、自由和人类行为

对于历史的理解，如同人类评价的其他形式一样，也是具有种种风格的。这里有着一系列不同的看法，从那把人看作环境或局势的产物这一极端，到那把人看作无所不能的另一极端。这两种极端看法都不能靠证据来证实。事实上，这些看法的本身结构就使我们难以知道它们究竟以什么为证据。尽管这样，对于特殊问题的如何处理，它们却有着重大的关系。

认为人类的前途早已决定，事物的未来形式，如今就已确定而不可变异——这种态度自然会对于那到处都遇到的可加选择的具体问题怀着一种藐视的心情。反过来，认为在任何历史时期，人们都能够翻天覆地，而他所需要的只不过是一种善良的或坚强的意志——这种态度自然会导致对于理智活动的限制条件加以忽视。今天，在西方世界的舆论界里，第一种态度是颇为占居上风的。未来的波动被他们描绘成一种注定的命运，那不仅会改变我们的经济制度，而且也会破坏民主文化的任何最后逃避所^①。他们把走向极权主义政治统治的趋势，看作经济发展的一个自然后果，和总体战争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而承认下来或加以悲叹。那些在资本主义全盛时期对于经济决定论加以轻蔑的人们，如今却改信了这种理论的主要教条，即认为一定的经济制度能够决定一种、而且仅只一种政治和文化形式。尽

① “我们被那不可预见的和不可抗拒的社会——文化潮流所驱使，正如同尼加拉瀑布边上的一块大木头，无可奈何地从一次危机和灾难向另一次危机和灾难漂流。”参看索罗金(Sorokin):《我们这个时代的危机》，1941年纽约英文版，第130页。并参考他的《文化与社会动力学》第4卷，第768页。在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影响更大的著作中也表现出社会宿命论的一种同样神秘的看法。

管他們能够設想資本主义会有許多不同的政治变形，但却把社会主义简单地看作只能象希特勒或斯大林一手造成的那样。这一类广泛传布的态度和信仰植根于这个时代的种种客观条件里。不过我們这里所要討論的問題并不是这些关于历史的思想究竟起因于什么，而是它們是否站得住，以及它們包含什么样的假設和这些假設是否真实。

首先，我們得注意一下：那些相信人类社会前途决定于已知的规律的人，十分重视我們对于这些规律的認識。他們強調：究竟我們是認識这些规律还是对它們完全无知，其后果是十分不同的。为什么？因為我們如果認識这些规律，就能有力量引导我們的前途。但承认这一点就意味着：社会历史上的一个相当范围（即那受人类認識或无知的影响的范围）并不是决定于原来的那一套规律，而是决定于另一套规律——那是作为人类的認識、评价和活动的后果而发生作用的。而只要我們相信：人类的認識开辟了另外一个世界，我們便不能再相信：前途是如此固定不移，以致不容許任何选择余地。

那末，我們究竟怎样理解那些被假定为具有鉄一般的威力，能够决定我們的前途的历史规律呢？粗略地說，历史上的规律就是存在于各組事件之間的一种决定性关系，我們发现了这种关系，就能倚靠它来解决问题、克服障碍、和預測将来。可是，这其中也包括着物理规律和生物规律。而历史规律的特异之点乃是：它們所关涉到的各組事件是特指：人們的行为模式（behavior patterns）而言，而这些人們是作为有組織的社会团体的成員来看待的。作为社会团体的成員来看，人們的行为是以理想、习惯、传统以及与“文化”这个人类学名詞相联系的其他行为方式作为标志的。

从而，历史规律的主题总是包含着：有关作为社会成員的人們的协同的和相互的行为或文化的東西。甚至當我們打算参考那些本身受物理规律控制的环境或事变来解释历史活动时，这一点还会是真的。所說的受物理规律控制的東西，就如同土壤中有无貴金属和石

油的矿藏，或者象旱灾、水灾、地震的出现等等。这些物理条件和事变在历史和社会事务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但并非作为物理因素来看待的。它们之取得这种意义，仅只当它们和人的行为或利益发生关系时为限。因而，美洲大陆蕴藏着煤矿、铁矿、和石油矿等等事实并不足以解释美洲印地安人的历史和社会生活，而对于外来的美洲移民的历史和社会生活来说，则很多可以此来解释。正如本特来所说：“当我们对于地下的金矿没有什么作为，或者不打算有什么作为的时候，它对于社会研究毫无作用。可是，当我们喧嚷着要探勘金矿的时候，地下有无金矿就成为一个重大因素了。”①

既然历史规律的主题牵涉到人们组成的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那就意味着须得参考那些常常可以用心理规律来描述的人类行为。可是，光靠这些心理规律永远不能解释历史事件或社会事件。因为历史事件或社会事件决定于人类和环境的物理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每当我们来认识历史和社会之前，必须先对自然有个认识。当我们说刺杀恺撒的是勃鲁吐斯(Brutus)，在这之前先得了解一些死亡的生物学意义和杀人工具的物理学意义。尽管是受同样心理学规律支配的人们，他们的历史活动和社会行为却会有着千差万别的变化，这就说明心理规律不能解释人们的历史和社会行为。这些心理规律，只有当其和物理环境和文化环境联系到一起的时候，才和历史发生关系。“任凭人们的欲望、技巧、目的、信仰是怎样的，事情的发生还得是物理条件(如同土壤、海洋、山岳、气候、工具、机器等等千差万别的东西)和人的因素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②

当我们有把握将社会规律和历史规律看作具有相对的自发性以后，还须进而追问究竟在什么程度上，它们是人类行为的条件，以及在什么程度上，它们会被人类行为所改变。让我们考虑几个典型情况。我们介绍这些情况，纯粹是为了作为例证说明以下即将展开的

① 本特来：《政府程序》，第193页。

② 杜威：《逻辑：探求的理论》，1939年纽约英文版，第492页。

論点：

1. 假使有人向某一政治团体提出这样一个建議案，要推荐某一天主教徒或犹太人充任美国总统的候选人。这建議遭到了反对，理由是：纵然宪法上沒有任何条文阻拦他們的被选，但美国历史上却表现出来美国人政治活动的一种规律，根据这种规律，这个候选人是“注定”要失败的，尽管事实上，他在任何其他方面都是一个理想的候选人。这个规律就是：“在美国的最高級官吏的竞选中，天主教徒或犹太人絕无获胜的可能。”这规律是由經驗当中归納出来的，而为美国公民的其他方面的行为通則所証实，——这些行为通則是指社会学上或心理学上的一些概括，例如宗教传统和社会成见等。

那末，这样一种“规律”，它的特征究竟怎样呢？須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点：第一，它并非把选举一个天主教徒或犹太人做为切切实实的“不可能”而加以排除。它所断定的不是这样选举的不可能，而是“靠不住”。第二，这个规律并非断定：每个新教徒都会对这个候选人投反对票，或者是，每个非新教徒都会投贊成票；也不是說：任何特殊的个人将会这样投票而不是那样投票。它仅仅是說明：相当数目的新教徒将会光是根据这位候选人的宗教信仰就投反对票，以致能断定他的竞选一定失败。第三，这个规律告訴我們：在一系列人們的选择和决定之中，有着某种的分配的模式。而我們是知道的：人們的选择和决定是能够以某种方式加以“影响”的；而只要我們改变了它們在其中发展的那些条件，就能改变或变革它們。第四，这个规律的有效性限于某些历史領域。*我們如果将它适用到其他一些象英国那样的国家的总统或內閣总理的选举上，那就是錯誤的；尽管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民也是信奉新教的。

我們这里所談的规律是任何现实主义的政治实践家都得加以考虑的。尽管如此，如果某些負責选举提名的人竟把这个规律看作是具有拘束力的，或者看做帶有决定性的任何场合的行动指南，那就未免太愚蠢了。这位候选人可能是一位軍事方面的民族英雄。他的提名也許由于另外一个规律的强制作用，即：美国人民对于成功的軍

事英雄人物总是怀着感激的心情，而他們所以选举他做官就是为了向他表示谢意。在这种情况下，我們可以相信，发生作用的是后面这个规律，而不是前面那个规律。不管是哪个规律吧，如果我們的决定单纯以它为根据，那我們就是在假設：选举的前途决定于过去曾經发生作用的某些固定的行为模式。同时，也是在假設：我們的决定和随之而来的行动对于选举結果不会有什么值得重視的影响。前途是单纯地决定于过去，而不是决定于过去再加上插进来的如今。当然，在我們所考虑的情况当中，这些假設都显然是錯誤的。所說的，“天主教徒或犹太人不能当选国家的最高官吏”这个规律也許会由于我們积极要求选举这样一个人的結果，而不再发生实际效力。我們越是熟悉养成人民种种态度的条件，我們越能够明智地改变这些条件。假如，某个国家为了爭取維護民主信仰的生存而卷入战争之中，这时，我們便能够去到这个国家而向該国人民要求他們表示对于他們所信仰的种种原則的忠誠。我們这样做是倚靠其他的各种规律。但給予这些规律以发生作用的机会的，仍然是我們。因为我們的行动改变了当时当地的物理的、心理的和社会的背景。

假如这时我們的努力很好地組織起来，而我們的政治运动是为了坚决发动一次具有真正教育意义的民主十字軍，那末，我們便会发现：所謂“天主教徒或犹太人不能选任美国总统”这个规律的作用，并不会超过以前被人們看做同样公平和同样正确的另一规律：“任何連选連任的总统不得超过两任。”我們并没有废除这个规律，但由于我們行动的结果改变了条件，以致使得这个规律失效了。目前我們的干涉行动，对于前途的结果究竟能够給予多少影响，如果单纯作为从过去經驗上归納出来的一条规律，那将是一个程度問題。在某些事务上，前途是能够准确預測的，很少牵涉到我們的努力究竟达到怎样。在其他一些事务上，我們的努力或不努力比起其他的已知因素来都可能更有决定性意义。

2. 試来考虑另外一个不同的情况：假定我們打算預測羅馬教廷下一任教皇是誰。我們應該多少注意以下几条“规律”：(a)任何新教

徒或犹太人不能充任教皇；(b) 任何信奉天主教的妇女不能充任教皇；(c) 不问是誰充任教皇，他总会是一个意大利的紅衣主教。所有这几条規律都不是必然性的，不过，当我们作以上預測时，第一条規律的束縛力大于第二条規律，而第二条規律的束縛力又大于第三条規律。这意味着：一个非意大利籍的天主教男教徒当选的机会多于一个天主教女教徒；而后者当选的机会又多于一个新教徒或犹太教徒。理由是很显然的。因为第一条規律的被违反或失去作用，实际上須得把教廷組織的性质完全改变，并且須得放弃基本的神学教义。而实际上这将等于解散教廷。可是，事实上目前教廷組織的威权正在日益增加。过去它須得与之斗争的各种压力逐日在减低，而它自己对于公共事业的影响却逐日在增高。其次，只要沒有任何怀有敌意的压力或反对力量，那些控制了一种成功的組織而有效地为它們各自的利益服务的人，决不会来消灭这个組織，或甚至也不会深刻地来改变过去有利于它的教义。

第二条規律的束縛力所以小于第一条是因为：如果第二条規律失去效力，其結果至多不过是初步改变了神学教义，而用不着根本改变教廷組織。关于妇女是神圣秩序的一个消极因素的教义，今天已經不再是能接受的了。而正如教廷史上所雄辯地显示出来的，神学教义上的改革总比組織上的革命要容易些。但至少就可以預測的将来情况而論，第一、二两条規律对于我們的預測还是有着束縛力的。以目前所能做到的事情而言，这两条規律的废除，可能性还是极少的。

仅以改革的可能性而論，第三条規律情况略有不同。以前也曾有过非意大利籍的教皇。而过去几百年当中历任教皇所以太都是意大利籍，主要由于意大利神职人員的压力。由于教皇对意大利內政有干涉的实权，設想一个异邦人，或一个在国外有着私人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外籍公民如果占居教皇地位，其結果将会引起何等糾紛？这是很容易看到的。尽管这样，如果天主教徒的义憤感情被組織起来以反对意大利現存的法西斯主义；或者是法西斯主义失敗以后，繼之而

起的是一种进步的 and 民主的制度，則下一任教皇也很可能是非意大利国籍。

意大利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可能出于明智的自利动机，并且由于受了他们本国政府的鼓动，而对红衣主教团发生影响。另外，再加以意大利反法西斯主义的天主教徒对于该国红衣主教们施加的压力，汇合一起，其结果也可能是竟然选出一位非意大利籍的教皇。即使向这个方向活动的结果如何，还十分可疑，但也不应把成功的机会完全抹煞。

以下一种情况是更加复杂的。

3. 当世界上的杀人机器越来越变为毁灭性的时候，为了保卫现代文明，不让它沦为人类的屠宰场，我们必须解决如何防止战争问题。很少有人会公然宣称喜欢战争，而每一个人都会悲叹战争的代价之大。纵令战争的双方损失不必一样，但任何持久性的战争对于任何人会不会在经济上有利，这一点是极为可疑的。那末，为什么大家不来一致承认象托尔斯泰那样的绝对和平主义作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手段呢？让我们姑且假定：如果每一个人、或者几乎每一个人事实上采纳了托尔斯泰或甘地的主张，则战争将会成为不可能发生的。我们将仅从这种主张对于带来有利结果其效力究竟如何这一方面来考虑这个建议。

将来很可能有相当数目的人们转变为和平主义者，好来防止战争的发生，这在逻辑上并非不可设想的。但为了传播和平主义的学说，有许多关于社会行动方面的“规律”都得暂时被搁置起来才行。因此，人们才把采纳和平主义的远景看做一种空想而加以抛弃。有些人也许为了一种理想的内在价值，或者为了某一种学说含有真理而不惜冒生命的危险。但绝大多数的人（不问是过去，还是现在），其所以肯为理想而奋斗还是为了增进比较具体的利益：譬如安全、长寿、或者物质上较好的生活。托尔斯泰的主张，——做神圣的人比仅仅活着好，宽恕敌人比惩罚敌人好——到了一个相当时期，可能会赢得绝大多数人的首肯：这一点是不能绝对加以排除的。但在相当的

人数会得转变成为这种态度以前，局势总是有利于那些非和平主义者，他们利用那些身体力行绝对和平主义的人们的不抵抗行为而增进他们自己的现有利益。绝对和平主义者不肯为他们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而战斗。同时，也不肯为他们的朋友、子女和同胞的生命、财产而战斗。在这种场合，就会有其他的人（可能是来自那些国家或地区，在那里，和平主义的理想是会受人嘲弄的）发现到：成为一个侵略性的好战分子来打倒和奴役那些和平主义者，确是对于己方有利的。这时，和平主义者所抱的防止战争对于人人有利的主张就会遇到一个与此相反的事实：在一个其他的人都是主张和平主义的世界里，某些人利用这种局势向和平主义进攻竟会是有利的。结果，为了使得和平主义者的主张能够确实发生效力，绝大多数的人们应该立即采纳和平主义，以便实现和平主义的普遍利益。因为，在每个人都成为和平主义者以前，那些非和平主义者还是可以用反对和平主义为手段来达到自利的目的。唯一的经常有利可图的战争就是反对和平主义者的战争。

那末，要使每个人，或几乎每个人都立刻采纳和平主义的主张，其可能实现的机会如何呢？机会未免太少了。我们若是专靠它来防止战争，那不免是个大傻瓜了。世界上贫困的人越多，讨厌的事越多，恐怖的心理越大，则这种机会也就越少。因此，我们必须宣布：除非今天社会里人们的种种特性来一个奇迹式的变化，要想把绝对和平主义当做防止战争的实际手段是注定要失败的。每一个绝对和平主义者，纵然希望着和平主义哲学的宣扬可以防止战争，但即使事实证明他的这个希望没有成功可能，他也决不放弃他的和平主义哲学，这是很有意义的。换句话说，他坚持和平主义哲学的最后根据是跟把它当做防止战争的手段的功效如何完全无关的。

那末，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必得承认一个规律：即世界上，国与国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总得互相砍杀呢？如果我们把种种重要制度，不管是经济方面的、教育方面的、还是伦理方面的、政治方面的，一切迄今存在于历史上的制度作为社会背景的永恒不变的特征而接

受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肯定的。如果我们相信:我们能够利用关于人类行为的其他规律来改变这些制度,实验和设计新的制度,并按照其实践的结果来矫正这些制度,则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否定的。世界上,战争的频率与强度确是可以减少的,只要人们通过各种和平的社会程序就确实能够以更低的代价来取得他们认为(这个认为往往是错误的)战争能替他们赢得的东西。人与人之间的战争并非命定而不可移的。但如果基本利益上的冲突不能通过战争以外的方法来取得互相满意的解决,人们还是逃脱不了战争的命运。

4. 现代民主主义的哲学与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是随着资本主义的生长而发展起来的。自从资本主义经济通过工业资本阶段到金融资本和垄断资本阶段而达成熟的境地,许多伴随着民主哲学而来的自由越来越受到限制了。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的限制来自资本主义之下的大规模工业组织发展的结果。政治方面的限制则由于国家出面积极干涉工业,并且有时是和种种垄断措施合作,有时则加以遏止。机会均等——这个民主哲学的理论与实践的中心——在杰斐逊的农业经济时代,是比在巨大的公司、托辣斯、加迭尔和种种垄断组织的二十世纪时代更为明显得多的。

许多忠实于杰斐逊的民主哲学的人相信这种民主哲学在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里已到垂死的关头,并且相信到了明天的集体主义世界上,那就是它寿终正寝的时刻了。由于他们不能自信自己的哲学能够加以改变,以重整现代工业主义世界的旗鼓和重新来引导它的方向,他们就急于要返回到早期的农业经济去,返回到昨天的那种更为简单的资本主义方式去,把它来作为民主生活的哲学得到捍卫与恢复的唯一物质基础!

对于这种建议的唯一答复只有:在经济上走回头路是不可能的。所谓经济上的不可能包含着一个与经济上的必然性相反的概念。那末,所谓经济上的必然性在这里究竟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这个答复对于农业上的民主主义者来说是个有效的答复?所有各种的早期经济制度,它们的理想和价值,我们都将保存下来作为我们自己的民主

哲學的完整而不可缺少的因素；但若是作為一種行動綱領而提出來建議我們走回頭路，那末，我們這裡所說的話都可以作為反駁他們的充分理由。

那末，我們為什麼不能回到一種早期經濟去呢？一種經濟制度畢竟是用來規範人們行為的一套社會關係。那是出於人們的計劃安排，而不是什麼上帝給予的，或自然賦予的事實，而是歷史上人們的行動所產生的結果。誠然，作為一種邏輯上的可能性，我們不妨設想在任何時期實行任何的經濟制度，但恰好因為一種經濟制度既是一種人類的經濟，也是一種歷史的經濟，它的基本關係是不能隨意更改的。

除非是破壞了我們的大都市，解散了我們的大規模工業生產，改變了我們的銀行和運輸制度，並且不怕產生災難性的失業，把巨大的工廠和種種技術漸漸歸於廢棄，使現有的農業人口失去他們的市場——這裡僅略舉幾件事情——我們是無法回到農業經濟去的。設使這一變動是可能的話，則全國任何一個集團的既得權益都會馬上受到損害，而僅以一種農業烏托邦的空虛諾言來安慰自己。即使這種空虛諾言具有一種催眠作用，任何打算實現這樣一個綱領的努力必然伴隨著種種不可避免的災難，使得暫時被催眠的群眾從出神狀態中回醒過來。因此，為得實現這個綱領，必得把人類現有的種種動機、評價態度、生活水平和嗜好等等加以最徹底的改變，——而所有這些動機等等都是歷史上習得的，而現已堅牢地深深扎根在人們的習慣或第二天性中了。人們的習慣是可能改變的，但一下子要改變这么多的習慣卻是不可能的。只要人類還沒有喪失他們的記憶力的話，是否一次地震或者一次戰爭所造成的破壞會使他們倒退到過去的經濟社會去，那还是非常可疑的。他們勢必在廢墟上把地震前或戰爭前的社會狀況重新建設起來，因為這樣做，對他們來說是要容易些，而且要更加“自然”一些。他們將會選擇他們認為發生地震危險較少的地方，或者把他們的城市加以堅固可靠的防空設備。

在這個回到早期經濟去的計劃當中，由於各種各樣不象會有的事情未免太多了，因此，我們把它叫做“經濟上的不可能性”。

但即使这个經濟上“不可能”的事情竟然发生了，这种农业經濟又怎样能够稳定下来呢？自由市场势必还是存在的。小型的商业企业也势必还是有的。人类的創造精神势必不会老是睡觉的。种种新的需求势必由现有的手工业中逐渐涌现出来，而且促成制造业的逐渐扩大。工資劳动者势必还会有，而且在法律上也还是自由的。对于工資劳动者的需求也会自然觉察得出来，因为这些劳动者挣的錢会多于农业劳动者。对于工业制品的买卖势必建立起来一个逐渐扩大的市场。工业革命势必从头来起。小城市逐渐会发展成为大城市。一句話，农业經濟势必仍然蓬蓬勃勃地兴旺起来而重新走向工业資本主义。

任其自然，則人間的社會关系将会重新取得原来的特征，和开始号召回到农业經濟去的时候差不多（纵然不是完全一样）。这也就是我們所謂“历史的——經濟的必然性”的一个說明。

但制度不会总是任其自然的！我們不是承认过嗎？——一种历史的——經濟的必然性并非絕对的。誠然如此，可是在那个场合，对于农业經濟当中的光荣的自由所加上的各种控制和限制都得是出于强制的。过去在資本主义成熟时期深深恐惧他們的种种自由会被国家加以侵犯的那些人們，这时，为了防止农业經濟仍然走历史的老路，便也得对于农业社会当中存在的自由加以同样严重的侵犯。人們牺牲了民主主义的哲学与实践，其結果不过是取得了比现有的生活水平更低一級的生活水平，而且如果跟还没有丧失民主主义的工业文明可能发展到的生活水平比較起来，那就更加不知道要低了多少。

5. 現在我們就要把話題轉到当前形势上来。处于当前形势之下，問題就是：在一种走向集体主义的工业經濟当中，如何才能保持我們的民主主义生活方式（所謂民主主义生活方式的意义已见前章）。这一例証更多地具有当前的話題的味道。假如象现代几个极权主义国家所实行那样的文化上和政治上的种种恐怖乃是集体主义不可避免的伴随物，那末，我們返回到农业經濟社会去的那种无效的企图也还比这好些。因为这个努力的結果，最多不过是一死，而还不

致于陷于半死不活的惨状。

重要的事是要确定集体主义这个辞儿到底是什么意思。集体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定义可能是这样下的，以致从这定义逻辑上推论下来就非得有一套关于文化统治和政治统治的极权主义的技术不可。但我们却认为集体主义的定义不一定非这样下不可。这会变成一个经验上的问题，即：事实上，为了使得社会主义制度顺利地发生作用，是否非得这一套极权主义的技术不可？

要打算在很少的篇幅之内解决这样一个大问题，无论就问题来说，还是就作者来说，都是不适当的。但我们既然把它纯然当做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关于规律、自由和人类行为的见解，希望我们的评论表面上带有的独断色彩能够得到读者的原谅。

我们所谓集体主义制度意味着：一切基本的生产工具——大工业、矿山、铁路、公用事业等等——都归社会所有，用于公众的福利，而不是为了私人谋利。这样的集体主义制度势必要采取一种作了计划并继续不断地作计划的社会的形式，以便保证：充分就业，受教育的机会均等、和逐渐提高的生活水平。事实上，国家或社会既然成了屋主，它对于一般公民的生活便操有很大的权力，因为它能够拒绝他们使用生产工具。可是国家并非一个抽象体，而是一群人们，包括：官吏、政治家、政客、职员、哲学家等等，——不管你把他们叫做什么。如果政治、经济、教育各方面的权力统统集中在他们手里，那又怎能防止他们不变成社会的独裁者呢？如果这种集中果然成为事实，那是毫无办法的。事实上，任何一群人，只要他们握有这种权力，势必会成为独裁者，不管他们是怎样的仁人君子。

有一些人说：一旦我们引进了这样意义的一种集体主义，那就不再是什么真正的“如果”问题，而是一个无可逃避的结论了。为了避免这个结论，我们就势必要放弃集体主义。但我们的意见和这相反。我们认为：工业的集体管理确是无可逃避的结论，——也就是说，尽管我们朝着相反的方向努力，它的“或然性还是极高”的。而那个“如果”问题，——即把全部权力集中垄断在经济计划者手里，——

則几乎完全决定于我們对民主主义的信仰，以及愿为它而战斗与牺牲的决心如何。这里所謂战斗，不仅是在战争中，而且也是在和平环境中的战斗。

世界各国资本主义經濟的走向集体主义乃是不断追求利潤的結果，而不断追求利潤正是资本主义經濟的基础。追求利潤的結果是巨量資本的积累，而資本的积累就增加了社会生产力。同时，由于与生产过程相联系的各个阶级之間，收入的高低有着极端的不平等，使得群众对于消費品的购买力大大地为之縮减。而这种不均衡现象愈来愈严重，其結果，一方面是有利可图的投資范围越来越窄，另一方面是失业现象越来越扩大。于是，国家越来越插足进来，作为工业的合营者，有时也作为独立的生产者，以便保持生产的进行，引入新的投資，并解除失业的越来越重的負担和政治危机。如果听任资本主义經濟的各种程序自发地进行，就无法保証：利潤的获得、充分就业的实现、以及相应于现代工业的种种技术上潜在能力的生活水平。不仅如此，周期性的震蕩还要轉变成經濟危机，而这种危机要支付日益增加的社会代价才能取得部分的解决。

走向集体主义的趋势以及国家对經濟的干涉都是“不可避免”的。呼吁回到自由企业时代去，正如呼吁回到农业經濟去是一样地徒劳无益，不过其为絕望掙扎的程度不如那么严重而已。尽管我們不妨試做这种努力，但压倒一切的可能性是会遭到惨敗的。我們的明智的选擇并不在于和那似乎不可抗拒的社会趋势相搏斗，而在于决定：国家由誰来負責？国家怎样进行干涉？以及生产的集体化究竟要做到如何程度？我們的自由就在这里。究竟在那集体主义經濟之中，是否还得保留一些自由企业的范围，那是将由国家来决定的。假如負責管理国家的人們对于保持民主主义的傳統自由不感兴趣，則在自由企业范围内工作的公民沒有任何不受迫害的保証，正和在集体企业范围内工作的公民一样。这就如同在一个法西斯主义制度之下，私立大学教授也沒有任何研究自由，正和公立大学的教授不相上下。另一方面，在一个民主的集体主义社会里，也能够在它的“权利

法案”当中规定下：每个公民享有就业的权利，而工会、合作社、法院、报馆、教堂、以及某些高等教育机关的组织，永远不受国家的干涉，有了这样规定之后，也便能防止异端分子在经济上的不法行为。^①但宪法上所规定的条文是否具有强制作用，那还得决定于我们自己。没有任何自发性的保证可言。那也就是为什么自由永远不会是安全的理由，而我们的理智永远不要睡觉才行！

* * *

上文考虑的几个例证说明了我們对于社会事务和历史事务当中的规律跟人类自由之间的相互作用抱什么看法。在任何时期里，对于某些发展途径永远没有任何现实的选择，就因为有许多“规律”以及这些“规律”的越来越大的力量拦在我們面前，阻挡我們为了走向新的方向而筹思新的计划。理论上，尽管我們能够开辟出对这条途径来说是另外的一条理想的途径，但〔实际上〕不得不感叹：除非冒着毁灭性的危险就不能朝着这理想的途径走。但是，在一个我們选择继续活下去的世界里，试图就在这条途径上开辟出一些可供选择的途径，还是一个比较聪明的办法，因为正是在这些途径的面前，我們才不仅有能力来希望，而且有能力来行动。不管我們选择的是什么途径，到时候我們总还会发现其他的许多途径。这些途径也许不如我們以前放弃不走的那样宽广和野心勃勃，但也不一定是更不痛快，或意义更小的。不用说私人生活，就连历史和政治也同样是天天会遭遇到种种可供选择的途径，而我們自己的一部分命运就靠在这些途径中来铸造，因此，我們也得对此负起一部分责任。每个人都明知自己是要死的；可是人們活过这一生的方式会有多么不同啊！

人們在創造历史当中可能犯的錯誤是千差万別的，要想替它开个齐全的目录是办不到的。但在历史的光照之下，我們也能够把这些錯誤当中最常见的枚举出来。这些錯誤就是：(1)尽管可供选择的

^① 在《理性、社会神話与民主》一书，第125頁以下，我曾扼要地討論了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可能采用的防止办法。



2 020 8080 8

道路已在面前，但人們竟會視而不見；(2)事實上可供選擇的道路本在兩條以上，但人們却定要把它簡化而當做只有非此即彼的兩條；(3)對於這些道路的相對可靠性做了錯誤的估價；(4)最後，做為(3)項的特殊情況，忽視了我們自己的行動也會影響到道路的選擇。所有這些錯誤加在一起不過是：對於人們控制自己前途的力量有系統地加以低估而已。

不問是不同的社會，還是不同的個人，其所以循一定的路綫向前發展，有時是由于宇宙的或地球的偶然事件之結果。即如一次旱災，或者一次水災可能把幾百年間的計劃勞作一掃而光；瘋狂的病態可能象烏雲遮日一般，遮蔽了那深受教養的心灵，而阻礙它達于成熟的境地，以獲取黃金般的丰收。社會控制和理智能夠沖淡這些偶然事件的種種作用，而防止其中許多作用的发生，但這些偶然事件是不能全部鏟除的。這就因為人是有限的，而他所不能控制的世界範圍永遠大於他所能控制的範圍。我們這樣說並非勸導人們採取消極隱退的辦法；那顯然也就因為這些事變都是偶然的。只有面對那定而不可移的事件時，消極隱退才是聰明的辦法。而依據定義，這些事件都不是定而不可移的。

一切真正可加以選擇的機會都是特殊的。而每一個選擇的決心都包含着要達到一定程度的自我的、社會的和世界的改造。任何一種明智的改造都是一種實驗，是要以已知的規律為指導，而以達到能掌握具體問題為目標的。我們既然斷然委身于民主主義哲學，便不能再把現存於我們面前的政治方面和社會方面的種種道路的選擇完全付托給一位事變創造性人物，或者付托給一個不受控制的政治中樞。作為一個民主主義者，不管是什麼計劃都得以自由社會〔的締造〕為計劃的總目標。而在這個自由社會當中，每個公民都能參與集體政策的決定，以導向解放各種各樣的有才能的人物為目標的明智的計劃政策，同時，也能够捍衛私生活領域，而使它得以持續保存下來，在這個私生活領域之中，人人都有自做決定的自由。